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新史学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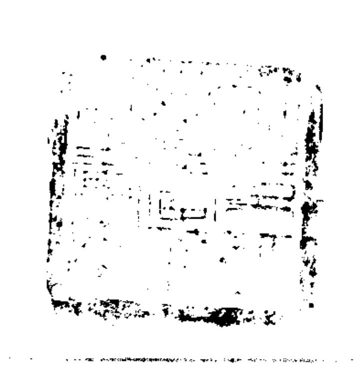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新 史 学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 著
齐思和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9 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新 史 学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 著
齐 思 和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47-3/K·97

1964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61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6 5/8 插页 4
定价：3.65 元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eal Outlook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22

本书译者：第一章的第二部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为林幼琪，附录部分为陈芳芝，其余各章均为齐思和；全书校订者和注解的作者为齐思和。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至 1986 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 年 2 月

出 版 说 明

“新史学派”是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之一。鲁滨孙的《新史学》一书则是阐述这个学派史学主张的基本著作。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1863—1936)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他1863年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布鲁明顿市。父亲是当地银行的创办人,家境富裕。他1884年入哈佛大学,1888年获文学硕士,同年进德国弗赖堡大学,在德国教授的研究班中,接受研究方法的训练。他的研究范围是欧洲中古和近代初期史。回国后,1891—1895年间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执教。1895年被聘任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到1919年为止,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二十五年。

他的主要著作《西欧史》(1903年初版)、《近代欧洲的发展》(与比尔德合编,1907年初版)、《欧洲通史》(与布累斯提德合编,上下两册,1916年初版)和《欧洲近代史资料集》(两册,1908年初版)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编写的;他的新史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因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意见不合,又因继承了大笔遗产,便退出该大学,与比尔德一起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自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后因该校发起人之间意见分歧,遂辞职。1929年他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1936年去世。

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出版于1911年。书中汇编了他历年发表的论文和演说,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鲁滨孙对历史学的

基本主张有以下几点：一、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二、用综合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三、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为一个"继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四、研究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状和推测未来。五、利用历史知识来为社会造福。鲁滨孙的这些观点，风行一时，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很大。

新史学派之所以在美国能发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一、他长期在美国学生最多的大学担任欧洲史的主讲教师，培养出上万的学生，在美国各地大学、中学教授历史，他的同事和学生，如比尔德、绍特威尔、海士、史来生格尔、蒙恩、巴恩斯、桑戴克、福克斯、沙皮罗等后来都成了美国史学界的名人。学生替老师鼓吹，扩大了他的影响。二、他写的许多历史教本，风行美国，有的多次重版，印数多达八十余万册。这些教本大都经过多次增订再版，广泛发行，使教师和学生都熟悉他的名字。三、鲁滨孙提倡的历史学说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使他的著作受到资产阶级的赏识，被广泛采用，历久不衰。这样就使新史学成为美国一个有势力的史学流派。

此书我馆解放前曾出版过何炳松先生的译本。1963年经齐思和教授据原书 1922 年版本重译。附录的巴恩斯的《论新史学》是陈芳芝同志译的。这次再版是用 1963 年版纸型重印的。

1988 年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新史学

一

从广义来說，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內。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慣和感情。比如瑟利地方的石斧和今天早晨的报紙，都是史料来源。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門极其广泛的学問。无論解释亚述泥板书上的契約，估計金鋼石項圈的价值[①]，或叙述查理五世[②]的御膳都是历史范围以內。伊丽[③]的儿媳当她知道了她所統治的伊本塞人民的困苦，因而产生一种悲伤的感想，这是历史。英国大宪章[④]的条文，变质原理[⑤]的来历，圣地亚哥城[⑥]的失陷，黑衣僧同白衣僧的区别[⑦]，以及今年2月1日紐約《世界报》銷售数目，也是历史。每件事情都有

①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1754—1793年)在位时代，巴黎珠宝商某有金鋼石項圈一，以金鋼石五百顆綴成，价値八万金鎊。一个名叫莫特的妇女，假装替他介紹給王后瑪丽·安东奈特，实际上她偸着携往英京伦敦，拆开出售。以后珠宝商向王后索价，王后矢口否认，始知被騙。此后迁延了九个月，莫特夫妇均受重刑，王后的声誉也因之大减。——譯者

② 德国皇帝，在位年代(1519—1556年)。——譯者

③ 古代以色列的法官和祭司，见《旧約》。——譯者

④ 1215年英王約翰被貴族所迫而签署的文件，为英国宪法史中的重要文件。——譯者

⑤ 基督教之变质原理，由来甚古。1545—1563年在特伦特宗教大会上始有明文规定，其意义如下：凡行圣餐礼时所用之面包与葡萄酒，一經教士奉献，即变为耶稣的肉和血。把它飲食之后，可以入圣。——譯者

⑥ 古巴的重要城市，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时，被美国占領。——譯者

⑦ 十三世紀的托鉢僧，多米尼克派称黑衣僧，卡梅立特派称白衣僧。两派服装顏色不同。——譯者

它的关系和重要性，都被明白地記載下来。

当一个著作家着手翻閱那些书厚字密的过去記載，預备写出一份綱要，为那些无暇閱讀原始資料的人們閱讀，那时候他立刻要問他自己，究竟应該选择哪一种材料去引起讀者注意。他一定觉得过去人們所遺留下来的史料，是非常杂乱的。因为这是那些时代不同和思想不同的人們，如希罗多德①、馬基雅弗利②、尤西比阿斯③、圣西蒙④、佛莱辛的俄图⑤、皮普斯⑥、圣路加⑦、阿普兰提斯女公爵⑧、撒路斯提烏斯⑨、卡吞·瑪塞⑩等人所写出来的。有的非常謹严，有的好像漫談。有的对于一个放纵的宮庭官吏詳詳細細說了一大章，而对于民族的灭亡，反而置之不理。照此看来，要写一部历史，以供普通人閱讀，如何选择材料和支配材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看看所有普通历史的著作，对于反复研究如何选择材料的必要性，似乎沒有予以足够的注意。他們

① 紀元前五世紀时期希腊历史家，西方称他为“史学之父”。——譯者

② 意大利佛罗伦薩著名政治家兼历史家(1469—1530年)。著有《君主論》、《佛罗伦薩史》等书。——譯者

③ 有名之基督教著作家，約264年生于犹太，340年卒。著有《世界史》，叙至紀元后328年止。——譯者

④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之廷臣兼外交家(1676—1755年)。著有記載当时事迹的笔記。——譯者

⑤ 佛莱辛主教，是十二世紀的著名历史家。著有《世界史》。——譯者

⑥ 英国人(1633—1703年)。著有自1660—1669年間的日記。——譯者

⑦ 古代基督教創立人之一，希腊人，于紀元后一世的中叶，著《路加福音》是《新約》中的一部分。——譯者

⑧ 法国名将阿普兰提公乔諾之妻(1784—1838年)。著有自1831—1835年間的笔記。——譯者

⑨ 古罗馬历史家(公元前86—35年)。著有《卡提里那阴謀》、《优古尔塔战記》是《新約》中的一部份等书。——譯者

⑩ 美国教士(1663—1728年)。深信巫术，主张杀害被指控行巫的老妇，造成新英伦大残杀案。——譯者

显然是被传統束縛住了。他們似乎不知道有大量可备采择的材料。因而对于选择材料，不知不觉地向那条老路上走去。假使我們想到人类兴趣范围的广大，我們的普通历史著作对于过去事迹的叙述，实在太不完备，而且把讀者引入了歧途。我們便感觉好像史学家合在一种阴謀里面，故意地把史学的范围和目的，弄成非常狹隘，非常肤浅。这种情形非常明显，試取任何一种普通人所讀的旧式历史著作来审察一下，就知道了。

下面的一段文章，是从最近各专門学校通用的一本历史綱要中摘录出来的。

“继查理二世为那不勒斯国王者为罗安茹族的智者罗伯特(1309—1343 年)。他属于归于夫党，因而不得逞志于西西里。当时西西里王为阿拉崗的彼得的儿子費迪南二世(1296—1337 年)。罗伯特的孙女姚安一世度过了艰苦和罪恶的一生，終于被意大利安茹王室的最后男嗣查理·杜拉佐(1414—1435 年)絞死在獄中，而杜拉佐遂取得政权。杜拉佐的后人姚安二世先把阿拉崗族的阿尔芳梭五世作为继子，后来又把路易三世作为嗣子，最后又把路易三世的弟弟雷內作为嗣子。阿尔芳梭继承西西里王位后，于 1453 年，战胜雷內和米兰的君主，遂統一两国。”

上面这段文章，并不是仅是作为一种参考材料，以备偶然检閱之用，而不希望我們作一部“对数表”去讀的。这段文章是从一个名著作家专述但丁①、培特拉克②和光輝的路伦梭③时代的意大利史中六頁书里面抄出来的。据作者自叙，他这本书的目的，是提供

① 意大利著名詩人(1265—1321 年)。著有《神曲》。为文艺复兴先驅人物。——譯者

② 意大利詩人 (1304—1374 年)。为文艺复兴时代著名詩人与古代典籍的研究者。——譯者

③ 佛罗伦薩的統治者(1448—1492 年)。奖励学术，提倡文化。——譯者

高級学員和普通讀者的一种指导。他自己写道："本书企图将重要史事写得有条有理，并且說明一个时代和其他时代，或某一件事和其他事之間相互的关系。并且由于从历史的連貫性和那些簡单的事例所激起的兴趣，可能免除使讀者感到干燥无味的毛病。"

在这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著作中，著书的人仅仅提了"佛朗西斯科·培特拉克"的名字，却把十二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写南部意大利继續不断的朝代紛事。照这样看起来，我們可以假定这就是他所說的"将重要史事写得有条有理"的观念。但是，就上面摘出的那段看来，实在很难做到他所說的免除"干燥无味的毛病"。

我翻开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叙述十八世紀法兰西大革命前夕的欧洲。著书的人应該知道用批評的方法去选择材料和分配材料的必要性，把启蒙时期的新精神和时代背景明白地叙述下来以便讀者易于理解。但是他首先插入下面几句話："辛仁道夫死于1742年；斯塔伦堡死于1745年；金斯基死于1745年。烏尔菲德继辛仁道夫而为有名无实的內閣总理。巴登斯坦自1740年至1753年任外交部长，他在秘密国务会議席上极占势力"。这些事实一点也不錯。但是在这个不易明白的世紀中难道沒有比奥地利內閣大臣的生死年代較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叙說么？

有一个研究法兰西革命的历史专家，他在书中并沒有向我們交代革命因何发生，偏喜欢把下面的一类事情津津乐道地写了好几段。

"奥尼斯封邑自称并不属于散通日，而尼韦尔內皇室領邑力爭其領土应包有公国采邑；因此上奥佛尼与下奥佛尼之爭端又起。瑞芒与克勒蒙菲朗两城，因爭为下奥佛尼之首都，也起爭端。克勒蒙·恩阿尔貢及瓦仑尼也然。沙托尼夫·恩·迪米来斯揚言非沙尔特之属土，乃皇家属邑"。

历史学家专門罗列人名和地名的趋向实在太普通。其实这种名字与讀者毫无关系，为篇幅的經济起见，簡直可以把他們当作未解决的方程式里的“未知数”来看。既然普通都是这样，不由得我們要問，为什么一般历史学家定要把那种毫无关系的瑣碎事件写在里面？有时只是由于他們沒有深加考虑。有时作者认为人名和地名是重要的，有了这些就可以說明一切了。或者他們以为写名詞可以增加文章的气势；或者是想用人名和地名做中心，为将来知識附丽的根据。其实名字只用一回，很难增加历史的趣味，恐怕反要使它模糊。我认为，只提杜拉佐、克勒蒙菲朗、金斯基、瑞尼等名字，不见得会引起人們要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恐怕反要增加混乱。

但是，常常有人說：就是极草率、极干燥的重大事件，在世界史里面，也可以算是好东西——因为我們至少可以有一个編年的大綱，作为我們的指导，为我們将来的历史知識提供一个輪廓。我們知道了重要的年代，将来便能够了解事实。这些事实，我們在学校中只见到一些名称。我們准备把我們在文学史上的、哲学史上的、制度上的和美术上的知識，安排在一个“历史背景”之中。但是，现在我們有許多人怀疑这編年大綱，觉得它并沒有多大的价値。不过大家喜欢使用这种东西也非偶然，因为它不需要思想，只要求記忆。这是一种最容易教授的东西。我有一回遇到一位博学的教授，他在东方住过几年。我問他伊斯兰教教祖出亡的日期①，这个日期和馬拉松之战②、克勒西之战③的日期一样，一般人认为凡属讀书的人都应該知道的。不料他和我一样的不記得，所以我們就

---

① 公元622年，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由麦加逃到麦地那，史称此次逃亡为希志来，为回历紀元。——譯者

② 公元前490年，希腊人大败波斯人于此。——譯者

③ 1346年，英法百年战爭中，英王爱德华三世大敗法国精銳軍队于此。——譯者

去查詞典。倘使我們破口說出，实在可以省掉一、二分钟，但是我們从来沒有因此而觉得缺乏什么。

一个聪明的木匠总不常随身带着斧鋸；修水管的人也不常揹着鉛管，以备“不时之需”，到了要用的时候，他尽可回店去取他的器械和材料。在现在，参考书价賤而且易买的时代，当然无需多記些历史事实作为进行研究的預备。当然所有一切学問，包括被忘掉的在內，可以培养产生准确的习慣，和权衡輕重的观念；但是必須和数学教科书一样，先有知識，后有公式；而在普通史学讲授里面，我們却往往先給人公式。

所以急于要教讀者注意阿拉崗王彼得的儿子和辛仁道夫以及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沙托尼夫·恩·迪米萊斯的根本理由，就是自古相传，如今还存在的那种偏重政治事件和人物的习慣。卡萊尔[①]曾經提出警告：离开議会、战場和王宫远远的地方，“那种强有力的思想和行为的巨流，仍是滚滚向前奔流”。但是这句名言因为历史学家听不进去，很久以来，就有人想出許多理由来辯护这种对政治和軍事史的偏向。傅利門[②]簡直說：“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兰克[③]认为历史学的目的，在于使我們对于国家的起源和性质具有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另外有一个德国学者說：数千年来，国家这种东西——政治的組織，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問題，他还說这是永远应該如此的。

我們不能在此处討論国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个复杂問題，而且也沒有討論的必要；因为沒有人不认为国家的重要性，也沒有人

① 英国著作家(1795—1881年)。著有《法兰西革命》、《英雄与英雄崇拜》、《奥立佛·克伦威尔的信札及讲演集》、《普魯士王夫累德烈二世传》等书。——譯者

② 英国历史家(1823—1892年)。著有《諾曼人征服英国史》。——譯者

③ 十九世紀德国著名历史家(1795—1886年)。著有《罗馬教皇史》、《宗教改革时代德国史》等书。——譯者

主张历史书中可以不讲到国家。我們此地应該研究的問題，就是我們对政治史的偏心引导着我們专去叙述那些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軍事史中的瑣碎事实。它們所占的宝貴地位，是不是应該拿来叙述那些向来被人輕視的重大問題？什么一个路易或者一个弗里德烈[1]得失了一块土地；什么慘淡經营集合了的一个小公国，在开薩·包吉亚[2]战敗后就加快瓦解；什么两个王族間的战爭，少年国王的王叔們的野心；一千年前敌人左右翼的回轉。这些事情，难道是应該大书特书，占着不应得的重要地位么？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在中世紀时期，人类組織了一个教会，无論从哪一方面观察它，比起政治机关更加具有永久性，拥有更大的势力，就是罗馬帝国也远不及它。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設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著书、繪画，并且还发明了許多东西。我們在历史里面应該包括这些人类活动，大家漸漸承认了；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內容。

还有一种趋向，好像和上文所說偏重政治事件和伟大人物的习慣相矛盾的，那就是普通历史书里面往往好写动人听聞的事实。有种历史书并不記載人类过去的正常状态和重要事业，而是像刺激性的戏剧一样，故意选择那些情节离奇的事情。一位现代著作家曾对我們說：法国史总能常常激起我們的注意，因为"近世沒有一个国家比法国經过更多的，更激烈的，更突然的，流血更多的，更加富于戏剧性的大变革"，"沒有一个地方比法国出现过更伟大的，

---

① 法国国王常用路易为名；德国国王常用弗里德烈为名，两国常彼此交战。——譯者

②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第四子，于1507年卒。——譯者

更勇敢的，更坏的人物。沒有哪一个民族比法国人得过更大的胜利，受过更大的失敗”。簡言之，就是“法国提供了一篇近代史中的叙事詩”。这位先生是要我們相信愈讲得离奇愈是好的历史。有位著名的化学家曾很平心地对我說：历史的正确性同我們的历史知識适成反比例。我以为还可以加上一句，就是历史有时好像警察公报一样，它的趣味和它的案情离奇适成正比例。

假如沒有純粹的小說可以滿足好奇的欲望，或者把历史看作戏剧的人不給我們一种极不全面而且错誤的观念，那么主张以叙述英雄人物、浪漫事迹为史学的正軌，我們也許可以不必加以反对。但是除了历史以外，沒有另外一种学問是以奇聞怪事为研究的对象的。教化学的教师决不是只限于奇怪的实驗，一定要精心地选择那些最典型的、最富于教育意义的东西。鉀素和液体空气这类东西在实驗上当然沒有水、石灰、硫酸等那样普通。假使有位医学教师，因为恐怕学生厌听疹子、腸热等这类病症，就专門去讲演麻疯和腺鼠疫，你对他的意见怎么样？除了历史学家以外，各种科学家都是尽心竭力地弄清楚那些重要而普通的事情。所有一切力量都用在这一点上面。他們的目的是研究公例，而不是研究例外。

假使記載现在的状况，只叙述一些駭人听聞的事情，我們都知道这是不对的。浪漫的婚姻与惨死；对人下毒药的事实；犯私通罪行者与疯人；以及吞下了針过了几年忽然无意之中出来，或者誤飲鴉片酊当作止痛药水，或者被啤酒大車压坏了等案情，即使一絲不漏地記載下来也不过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上面提过的那本法国史对封建制度的叙述，只是述說了一些牢獄——“呵！如何潮湿、黑暗、凄凉呀！”——和脚鐐手銬。它似乎要我們可以推想出，中古时代的教会，不过是一些恶人的詭計，来滿足他們自己

的貪婪和淫欲，里面充满了“欺騙、詐伪和假造的神迹”。說些眞人眞事并不等于讲眞实。我們可以像“黃色报刊”新聞記者那样在叙述事实时，一味要聳动讀者的听聞，而不管事实的背景，讀这种历史反不如去讀未加修飾的小說好。又有一个著作家，不說明教堂的內部如何宏伟，而只說：“圣油是丰富的，眞正的十字架[①]残余的部分是很多的，圣安尼的木梳和圣瑪利的裙子这类东西，虔誠的人們皆能看到”。虽然事实不誤，但实在是并未給讀者一个正确的印象。

我們不能因为普通历史学家偏重某类历史事实，就可以証明我們不必使讀者去注意其他有关的事情。他們叙述一件事实，或者因为它有趣，或者因为它离奇，或者认为一个受教育的人应該知道。1180年斐利·奥古斯都[②]即位，1690年有保恩[③]战事。但是历史学家如果抱着这种目的去选择材料，結果他的书一定包括一些著名的軼聞和动人的趣事，另外掺杂着一些干燥无味、传統相沿的历史事实。

普通历史学家又以为人类社会經常是处在混乱的状况之中。历史学家故意抹杀人类和平时代的重要性，但是人类大部分的进展是发生于和平时期。他們叙述了这一次騷乱，就跳过去叙述那一次騷乱。譬如讲到法国大革命这件事实时，他們沒有工夫去說明旧制度，而其实只有研究旧制度，才可能了解革命。他們都随便引了拉·布魯叶尔[④]所說的“那些太阳晒黑的野兽”和重复了“吾

① 相传当年耶穌基督被釘死于此十字架上。——譯者

② 法国国王(1165—1223年)。——譯者

③ 爱尔兰河名。英王威廉三世曾击敗拥护詹姆士二世的軍队于此。——譯者

④ 法国著作家(1645—1696年)。——譯者

輩之后必有洪水"[1] 这句話，馬上就去叙述那个恐怖时代[2]，好像这就是法国革命的全部。他們把这个法国和全欧規模最大、最和平的变革看作了第二个圣·巴梭罗繆节日[3]，其实一个革命的眞正意义在于它能不能改变一般的状况，能不能使新的事物去代替旧的事物。因此必須把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都要研究清楚，而对于旧的事物尤其要特別注意，因为我們的同情往往偏于新的方面；而且我們对于近时的知識总比古时丰富，所以我們必須用心去研究何以当时的法国施行非法逮捕、又有行会、卖官鬻爵等旧制，而且竟有許多有思想的和怀着好心腸的人們为这些制度去进行辯护。这要比空費时間任意去謾罵这种制度，好得多了。

我知道，关于这一点一定有人要反对說，制度和历史的逐漸发展，虽然应当是研究历史的正当目的，但是唯有大学生或具有耐心的普通讀者才有研究它們的能力，至于普通的人就不行了。普通人认为，唯有奇特的事件和动人的危机，才能引起人們的自然兴趣。他們又认为，历史上个人的影响必須故意夸大一些，因为一般的发展和进步的趋势，过于抽象，不是普通讀者所易領会的。因此我們用人为的連續性来代替历史的继續性，把事实系在君主的系統上，如瑪格納六世（1263—1281 年）[4] 之后，就是埃利克二世（1281—1299 年），接下去就是哈克洪五世（1299—1320 年），再下去就是瑪格納七世（1320—1365 年）。但是即使是最著名的朝代

---

① 相传为法国革命前夕，法王路易十五及其佞臣之言，述法国革命史者，多引用之。——譯者

② 在法国革命中，自 1793 年 9 月至 1794 年 7 月，革命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鎮压，故名。——譯者

③ 法国宗教战争中，1572 年圣·巴梭罗繆节日（8 月 24 日），巴黎旧教党残杀新敎徒，全国各地旧教党亦多响应，被残杀达万人。——譯者

④ 挪威国王名。——譯者

名字，始終只是一些名字而已。即使我們不知道皇帝克魯夫[1]是个博学之士，是一个天文学家；和他同时的法王亨利四世[2]是一个貪好酒色的懦夫。这种知識也断不能帮助我們去領会历史所能敎导我們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眞理。这个眞理就是历史的連續性。

倘使我們想出一种方法，能够把社会的状况和制度写得津津有味而且易于了解，并用眞正的联系来替代君主世系的联系，如果我們能写出这样的历史，那么那些反对从根本上改变现在流行作史方法的人們，也許就会取消他們的反对态度。现在我深信："制度"（它不过是一种民族习慣）能够使人发生兴趣。我所說的"制度"，是就极广义而說的，它包括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尙。历史上的事实，无非就是这些制度的表现。假使我們将历史事实选择适当，就可以使"制度"明白异常。

以前的著述家还有一种习慣，这就是为事实而去記載事实；我們仔細考虑一下，就知道应該删除例外的和偶然的变故，而詳述那种可以闡明历史眞理的事情。有一种极簡单的原理可以决定哪种事实是有关系的，有用的，应該記載的；哪种是沒有关系，应該删除的。我們首先应該考虑：这件事实是否能够帮助讀者領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么？假使能够的話，我們就应該把这种事实作为一个达到目的的工具，愈詳尽愈好。它的本身具有的趣味一定可以便利我們的工作，而不会妨碍我們的工作。假使那件事情是一件偶然的、孤立的和异常的事情，如利恩西

① 德意志皇帝（在位年代 1575—1612 年）。——譯者

② 法王亨利四世（在位年代 1574—1589 年）。——譯者

的故事[1]、九月屠杀[2]或瑪拉特被刺[3]等等，我們就应該考慮一下，是否要包括在一部簡明历史綱要之中，因为无論这些事迹的本身怎么样有趣或可怕，他們会把讀者引入歧途，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对于人类一般的利害、成见、同永久的事业以外去了。

假如我們上面所述的对于目前史学界的通病，沒有不公平的地方，我們将它的特点綜合为以下几点：

（1）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讀者毫无意义，它不但不能激起讀者的思想和兴趣，反而使他沒有精神。

（2）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記載。

（3）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可以說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时代的情况；而只是因为它們在編年史中很突出。这种做法的結果是失去了历史的眼光，把一个疯狂的新聞記者像瑪拉特这种人，說得比最有影响的著作家伊拉斯謨斯[4]还要重要。

二

下面我要就欧洲史学史来作一个梗概的叙述，特别要对从前历史观念的变迁来做一个比較充分的說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学观念是常常在变化的，因而将来会有一种新的观念发生，这是十分可能的。历史无疑的是“一个果园，这个园子里面种着不

① 利恩西（約1313—1354年），罗馬政治家。于1347年推翻罗馬城中貴族統治，任罗馬保民官，后被反对派所杀。——譯者

② 1792年9月，法国革命人民武装把被监禁在巴黎各修道院的反革命分子处死一批，因而巩固了巴黎的后方。——譯者

③ 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領袖之一，于1793年被刺。——譯者

④ 荷兰学者，著名人文主义者（1467—1536年）。著《愚頌》等书，諷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同的树木，而且結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

历史可以滿足我們的幻想，可以滿足我們急切的或閑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驗我們的記忆力，用布林勃劳克① 的話来說，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种“可信的无知”。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我們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問題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們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

的确，长期以来，人們一直认为：人們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汲取教訓，如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先例，道德的指导以及使一般人得到安慰的那种天道的干与。但是，现在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日益怀疑这些功用，认为这純粹是一种幻想。我本人就很不願意被认为是主张历史研究是具有这些功用的人。这些功用的价值，其所依据的假設是：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的情况是始終一致不变的，因而它就能提供永久先例的价值。事实上，人类的情况，至少在我們现代，是变化得如此迅速，以致人們如果要想利用过去的經驗来解决现代問題，那是极其危险的。再說我們对于我們所假定的相同的过去情况很难能得到十分可靠的材料，以供我們滿足当前的需要。由此看来，所謂“历史教导我們”这句廉价的夸张語句就是这种假定的类比，实际上它是經不起我們仔細研究的。当我說历史可以使我們懂得我們自己和人类的問題与前景时，我含有另一种意义，我的用意是要叫讀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于他們自己历史的应用上面来。

我們若要理解我們自己所处的某一个时期的情况，我們几乎完全依靠我們对我們自己过去的思想和經驗的記忆。举一个最近

① 英国政治家兼著作家(1678—1751年)。——譯者

便的例子来說吧。一个讀者如果要明白他现在为什么要讀这一頁书时,他就得要回忆一下他自己的历史。假使他睡得很熟,忽然惊醒起来,那时,他的記忆力就会暂时失去效用,他会惊奇地环顾四周,弄不清他的处境。那时,尽管平日常用的器具都一一在他的眼前,但是在他的記忆力还沒有給他提供帮助,使他想起一部分过去的往事之前,他就不会有处身于家的感觉。当記忆力暂时停頓时,如当人們在昏倒初醒时,或如麻药刚退,記忆力暂时失去效用时,有时会难受得几乎成为一种智力上的痛苦。我們的头脑若在正常的情况下,記忆力就会自动地从我們許多記忆里面择取一些东西,来帮助我們理解自己所处的现在。記忆力的这种作用十分迅速,十分有效,以致我們并不感到它在发生作用,以及我們对它的依賴关系。由于記忆力能够如此迅速,如此正确通过我們的过去来提供我們所需要的东西,帮助我們明白现状,因而我們就把"现在"誤解为是可以不解自明的东西,而把"过去"看成是死的、沒有关系的东西,除非我們故意要去記住某些易忘的事件。

我們所說的"历史"和我們个人的"記忆",初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实际上它們是差不多的。因为我們头脑里所記的許多东西,并不純粹是我們个人的經驗,它还包括許多听来的东西或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們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假使讀这頁书的讀者停下来想一想,他就会想起許多前事,一直想到他现在在这間房子里坐着,能够閱讀英文,能够百忙之中抽閑来讀这本书,能够集中注意力来关心历史的功用和价值的討論。假使他忘了这些前事,他就会迷惑不解。帮助他解除迷惑的一部分的記忆确实是他自己的經驗,但是他許多的記忆却是来自历史領域,那就是听来的东西,或者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

假使讀者只是把自己局限于当时的直接印象或个人的經驗上

面，那么我上面所說的話就对他一点也不发生影响了。使人們感到惊奇的是，我們头脑中所有的指导信念眞正同我們自己个人經驗相联系的实在是很少的。我們自己的生日其实同阿塔佛尼斯[①]的生日或英諾森三世[②]的生日都是純粹的历史事实；但是我們对于后面两个历史人物的生日的知識却依靠别人的記載。

由此看来，我們自己的記忆便不知不覺地同平常所謂的历史融为一体了。从这个观点看来，历史就是記忆力的人为的扩大，它可以被用来解除对于各种生疏不明情况的迷惑。假使我們能够賦有像上帝那样对全部人类历史的完备的知識，具有比自古以来所有历史著作远为完备的知識，那么我們就会像上帝那样理解我們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們就会像上帝那样洞悉人类的痛苦，洞悉摆脫这些痛苦的种种有效方法。这并不是因为我們的过去会給我們提供行动的先例，而是因为我們充分理解了过去，便可以充分理解现状，我們的行动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当我們探討过去时，还不能像我們解决个人問題那样，把闡明关于社会的、政治的、經济的、宗教的和教育的重大問題的解决方法作为我們的目的，例如：我們該不該訪問某些人，該不該进行某种投資，該不該讀某一本书，无意識地依靠我們記忆的帮助来判断现状。历史学家們到目前为止，还沒有給我們提供一些改良人类现状的原則当作自己的任务。以前的历史家对于他們自己任务都抱有别种见解。假使有一个关心现代問題的人請他們来解答现在的种种問題，他們就会一致提出种种理由来推托。有的认为历史学家的职务是在于专門研究君王、議会、宪法、战争、条約和領土的变

① 古代波斯将軍，公元前490年率波斯軍队侵略希腊，无功而还。——譯者

② 中世紀时期著名罗馬教皇（在位年代，1198—1216年），在他任教皇时期，罗馬教廷达到了极盛时代。——譯者

动;有的认为无法写一部完备的现代史,因而我們决不能希望把过去同现在联系起来;他們认为在历史同现状中間必須留有一个适当的空間。第三人认为假使抱着一个目的去研究历史,那就违背客观态度的原則,而一切科学的,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工作,都必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我們现在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好像是一个記忆力很差的头脑,它所記得的事实都不足以滿足我們的需要。因此,历史的实用价值迄今未曾弄清。

为了說明我們理解现状有賴于明了过去的这个道理,讀者就得記住:我們现在的制度大部分都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而且也唯有过去才能够說明它們的来历。过去的罗馬教会①、陪审官制度②、內閣制③、法学博士的学位、«普通祈祷书»④和七艺⑤的产生背景,都是同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的。现代人們所有的宗教的、教育的和法律的思想并不是现代环境的直接产物,而是从过去发展起来的,当时人們的知識比现在少得多。最奇怪的事情是,我們思想习惯的变化要比我們环境的变化慢得多,而且往往差得很远。我們对于某种礼俗的尊重也往往完全出于守旧的习慣,并不是因为它

---

① 在基督教会初期,有五个中心,即罗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俄克、耶路撒冷。以后罗馬漸成为教会的主要中心。——譯者

② 陪审制始于中世紀时期的英国。当英王亨利二世时期(在位年代1154—1189年),已开始出现,至今为英美法系之特点。——譯者

③ 英国的內閣制淵源甚早,至十八世紀初年,乔治一世自德入英,充任国王,因不諳英語,乃指定大臣一人,主持重臣会議。1721年罗勃特·华波尔任首相,責任內閣制逐漸成立。——譯者

④ 英美所用的祈祷书,系1549年国王爱德华六世任命大主教克兰麦根据罗馬旧教的祈祷书編訂而成。——譯者

⑤ 欧洲中古大学,称文法、邏輯、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等学科为七艺,以区别于法科、医科。当时統治阶級輕視劳动,认为实用技术,乃是下等人的事;而高尙人士(自由人)应研究純学术,遂称文学、哲学等科目为自由学科,即自由人应具有的知識。——譯者

对现状具有多大的价值。我們常常不免用陈旧过时的眼光来观察新問題，或是用陈旧过时的推理来解决新問題，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始終不能适应我們的环境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們对于教会以及其在社会上的作用、資本家、自由教育、納税、遵守礼拜日、貧困、战爭等問題的观念，很少是同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决定的。比如我所接受的关于礼拜日的信念，即上帝在西奈山[①]上的云中规定了这种制度，这决不是十九世紀的美国自发产生的；但是这个信念现在还在影响着許多人的行为。当我們交納税款时，显出十分不願意，好像我們在忍受封建諸侯或专制君主的勒索，而忘記了这是由我們自己的代表所规定下来提供共同开支的經費。許多人还是更多地把战爭同个人的勇敢威武联在一起，而很少把战爭同鋼鉄公司的关系联在一起。保守的大学校长們觉得有为学校里設置"自由艺术"和"人文学科"进行辯护，但他們却不明白为什么他們竟負有这个責任。至于要对那些保守的經济学和法律的陈腐理論进行辯护，那就要用一巨大篇幅才能說清。

现在的社会正在用空前巨大的力量在多方面地进行它自身的改良，人們对于世界的和人类的知識从来沒有像现在这样丰富，人类的善良願望和社会活动也从来沒有像现在这样多。我們每个人在促进改良社会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取决于我們对于现状和輿論的理解，而我們要理解现状和輿論就多少得明白产生这种情况和思想的过程。总而言之，我們现在应該大大地发展我們的"历史头脑"，因为历史头脑可以补充我們知識中的缺点，而且它还可以促进合理的进步。从来现状一直是过去的心甘情願的奴隶，现在我們要振轉过来，要利用过去来謀取福利的时候了。

---

① 紅海北端半島上的一座山，据基督教传說，当年摩西曾受耶和华十誡于此。——譯者

“新史学”正在摆脱从前那些对研究历史的种种限制。历史研究将来总会有意識地来满足我們的日常需要。它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經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最近五十年来这些发现曾經帮助我們对于人类的起源、发展和前景等观念发生了巨大革命。在这最近的半个世紀中，沒有一門有机科学，或无机科学不发生过变化的，而且还增添了許多新的科学，这些科学的名字都是十九世紀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所不知道的。根据上述情况，历史这門科学也就必然已被卷入这个革命潮流中去。但是我們还得承认：现在有許多历史家还不知道历史也需要一个革命。这就无怪乎现在一般人所持有对于历史的范围和性质的见解还是十分陈腐的。

本书之所以命名为«新史学»，也就是要特别强調：我們不应該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門停滞不前的学問，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評和融化新的資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們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該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門学問将来在我們学术生活里应該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　史学史

一

“历史学”这个名詞的意义非常含混，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年中，它的性质和目的曾經历过許多巨大的变化。所以人們如果要了解现在流行着的有关历史学的意义和研究方法的各种不同的說法，那就不能不对历史学本身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如果我們对史学史从米利都的黑卡提阿斯①和希罗多德一直到最近的博士論文回顾一番，那么就可以知道历代并沒有一个固定的历史，它始終是既受着常规慣例的摆布，又受着临时情状的影响。现在历史学不得不抛弃它以前的某些野心，由于我們逐步地意識到对于許多事情的愚昧无知，因而抛弃了許多不正确的想法。但是这些屈辱却因为下述情况得到补偿。那就是，晚近以来，史学的范围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大大扩充了。半个世紀以前，人类的过去被人假設为只有六千年的历史，而到了现在，我們已知道它实在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而且，不但人类有历史，就是动物、植物、岩石、星辰，甚至連原子都有它們自己的历史。因此，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甚至連化学家都来崇拜历史。

由此看来，历史观念的发展也許是现代知識界的主要特点。历史观念不仅对社会科学，还对有机世界和无机世界的一般概念发生深厚影响。但是，历史学在最初时期，并沒有甚么严肃目的。毫无疑問，最初出现的历史学家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目的通常

① 約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8年。小亚細亚的希腊旅行家，著有《游記》等书。——譯者

是在于讲述一件事情，而不一定在于供献一套很有系統的科学知識。因此，自古至今的历史只是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在于用艺术手法来描述过去的事实，以滿足人們对于古代伟大人物的功績遭遇，王朝的兴衰，历代的天灾人禍等事的好奇心。

尽管这种原始的历史概念是非常明显的，我們可以不必再加以說明；但是，讀一讀下面这段文字倒是很有趣的。在1820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有名的历史学家叫道諾，当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历史研究的課程时，他說要做一个未来的历史学家，他首先应該讀一些史詩名著，因为叙述的艺术正是詩人創造的。其次，他可以从近代的小說中学习对他所描述的人物与事实賦于艺术的形态，并且学习如何連貫叙述的綫索，如何将叙述中断，如何又继續叙述，如何維持讀者的注意力和激起讀者的兴趣。将詩和小說讀完后，再去讀那些优秀历史学家的著作，其目的在于获得它們的文学风格的秘密，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①、色諾芬②、波里比烏斯③、普魯塔克④、凱撒⑤、撒路斯提烏斯、李維⑥、塔西陀⑦、馬基雅弗利、归查

①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約公元前455—400年)，著有《伯罗奔尼撒战爭史》。——譯者

②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約公元前435—354年），著有《长征記》、《希腊史》等书。其《希腊史》将修昔底德的著作續至曼梯尼亚战爭止，包括四十九年的事迹。——譯者

③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約公元前203—120年)，著有《通史》，叙述公元前221—146年間事。——譯者

④ 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約公元后50—120年)，著有《传記集》一书。——譯者

⑤ 古代罗馬政治家(公元前100—44年)，著有《高卢战記》、《內战記》等书。——譯者

⑥ 古代罗馬历史学家(公元前59—17年)，著有《罗馬史》，起自罗馬城的建立，訖特魯苏斯卒(公元9年)，凡142卷。——譯者

⑦ 古代罗馬历史学家(約公元50—120年)，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編年史》等书。——譯者

提尼[1]、西安侬[2]、休謨、[3]、罗伯特逊[4]、吉本[5]、伏尔泰[6]等。有了优美的文笔之后，可以再把优秀著作讀一遍，不是要注意它們的形式，而是要注意它們的內容。因为，正如明智的道諾所說的，在写历史之前，“显然先要知道历史”。道諾所說学习历史的方法步驟，和他所开列的历史学家名单——无疑地这些都是多少世紀以来最有名的历史学家——都可以証明文学传統的势力在历史学家中間是很大的。

但是，大家都承认，历史和其他文学部門是有区别的。波里比烏斯在他于公元前二世紀所写的书中曾經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說："历史学家的目的不应該用一系列聳人听聞的軼事去引起讀者的贊叹，也不应該杜撰許多演說詞备人引用；而是应該像悲剧作者那样，逐漸把故事引向高潮。恰恰相反，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在于忠实地記載古人确实做过的事情和确实說过的話，不管这些是怎样平常的言行"。

但是，古代的历史学家对于波里比烏斯的这些警告通常是不加注意的，因为他們的目的是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非常事件来激起讀者的兴趣，或是通过描述和分析过去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政策，給讀者进行政治教育，作为他們担任政治职务的准备；或是通

---

① 意大利历史学家(1485—1540年)，著有《现代意大利史》。——譯者

② 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1673—1748年)，著有《那不勒斯王国史》。——譯者

③ 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1711—1776年)，著有《英国史》，叙述1754—1761年間事。——譯者

④ 英国历史学家(1721—1792年)，著有《英国史》、《查理五世传》、《美洲史》等书。——譯者

⑤ 英国历史学家(1737—1794年)，著有《罗馬帝国衰亡史》。——譯者

⑥ 法国启蒙思想家(1694—1778年)，著有《路易十四的世紀》、《历史哲学》等书。——譯者

过讲述古人所遭遇的灾禍，来教育讀者忍受逆境，維护尊严。显然，那些供人消遣、給人教育，提高道德等目的，这一切都是可以用文学的手法来达到，而不一定需要对历史进行艰苦的研究。

在修昔底德、波里比烏斯和塔西陀看来，历史純粹是人类的、世俗的事情。历史的意义只以这个世界为限。他們并不把历史看作是神或上天所起的影响。但是，随着基督教教会的成立，历史就开始具有宗教的和神学的意义。

二

在早期的基督教徒看来，«旧約全书»里所述的希伯来史，很可以用以証明和体现他們那个耶穌最后下凡救世的主张。他們借用比喻的解释，往往可把古代的一件十分偶然事件，說成同现在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因此，基督教徒們可以說是第一个认为历史中有伟大意义的人，他們把历史看成是叙述从創造人类到最后善恶分明为止的一篇史詩。

但是，这种神学的統一和历史意义都是大大抛弃了一切世俗的观点和正确性的情况下取得的。他們把亚摩利人① 說得比迦太基人② 还要重要。他們对于以諾③ 和罗特④ 看成极有关系。至于培里克里斯⑤ 是一个甚么人，他們則一无所知。这种比喻的解释，

① 古代西亚的一个部族，建立了巴比仑国家。——譯者

② 原为古代腓尼基人在北非海滨所建立的殖民地。后成为强大国家，領有北非及西班牙一带之地。其国势之盛，实超过共和时代的罗馬。自公元前 264 年起至 146 年，凡与罗馬三战而亡。——譯者

③ 据犹太神話，以諾为洪水以前的善人，他周围的恶人不信奉上帝，上帝怒，乃降洪水将世界的恶人一扫而空，惟以諾得救。——譯者

④ 根据«旧約»传說，罗特为古代犹太亚伯拉罕之侄。——譯者

⑤ 培里克里斯(約公元前 495—429 年)为古代雅典政治家，是雅典极盛时代的执政。——譯者

使得文学的批評同历史的批評全无用处，即使不是对于上帝所启示的眞理发生怀疑。后来，奥古斯丁[1]又提出一个苦心創立和好像言之成理的“双城理論”。一个是从开初就存在的«上帝之城»，它的存在可以从«旧約全书»一直叙述到«新約全书»；另一个是为堕落的天使所建立的“魔鬼之城”，它以国王俾路斯[2]和塞密拉密斯王后[3]为典型的，它的丑恶的历史可以从远古一直叙述到他所生活的罗馬帝国时代为止。历史从此分为神圣的和非神圣的历史。他們先讲用幻想解释的犹太史，再讲基督教士的殉道和神迹，构成了完美无缺的历史。

到了奥古斯丁的弟子奥罗修斯[4]，他抹煞了埃及人、希腊人、罗馬人的一切伟大成就。把这些国家的历史看作是崇信异教的人們的罪恶史。他奉师命，著了七卷«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他的目的在于駁斥那不信基督教的人們的說法，即自从罗馬人放弃了古代的神道，他們所受的苦痛，比其他人們更为深重。奥罗修斯勇敢地起来宣称：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沒有出现以前眞正的灾难早已降临人間。他为了証明这一点，他就把古代史中的战争、瘟疫、饥饉、地震、水灾、火山爆裂、雷电、风雹以及由罪恶而生的种种可怕的灾害的实例，集成一部著作。从此以后，他这部书被用来作为当时世界通史的标准教科书，达千年之久。中世紀时期的教徒們很喜欢讀它，而且受到教会最高領袖的贊揚。所以对于奥罗修斯和他的无数讀者来說，历史就成为上帝懲罰人类最初罪恶而給整个人世带来灾难痛苦的記載。

---

① 基督教会初期著名神学家（354—430年），曾任北非希波城主教，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等书。——譯者

② 相传为古代亚述国王，他的后嗣建立了古代吕底亚和古波斯王朝。——譯者

③ 古代亚述女神。相传她曾任亚述女王，死后化为鸽子，飞去为神。——譯者

④ 罗馬帝国末年历史学家，生于公元后五世紀时。——譯者

但是，我們不必深究奥罗修斯的雄辯就可以看出，他对于历史目的和效用的观念，和希腊人、罗馬人的观念是显然不同的。在上古时代，历史有一种仿效詩和戏剧，以及借用它們的华丽的辞藻的危险。到了此时，历史就听任文学的劲敌神学蒙蔽住眼睛而被牵着走。中古时代的人把希腊的历史学家們和罗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全都遺忘。这样奥罗修斯的历史书把欧洲人的历史观引入歧途达千年之久，一直到中世紀晚期修昔底德和波里比烏斯的学說又重新受到重視。

但是，即使在文艺复兴之后，历史上神意的观念，还是沒有消灭。布須埃[1]所著的《世界通史》里面对这一点，有很明白的說明。他认为自古以来，所有的大事，隐隐之中都寓有秘密的天命。

"上帝握有世界各国最高之权；全世界之心都由他掌握着。他对于人类的情欲，或予以控制，或予以放纵，从而操纵全体人类的命运。上帝若要造就英雄，他就用恫吓来激励他們，并使軍队鼓起百折不挠的精神。上帝若要造就立法家，他就賦与智慧与远见，去除政治的弊害，确立安宁的基础。上帝知道人类的知識是有限的，他或启发他們，开扩他們的眼界，抛弃他們的愚昧；或使他們愚昧无知，不辨是非，使他們陷于困境而不能自拔。通过这些方法上帝就能根据公道的规则对人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

不幸的是，上帝的安排既如此玄妙，遂給許多針鋒相对的观点大开方便之門。在布須埃看来，所有的历史都証明上帝爱护旧教，而痛恶那些叛离由彼得所传下来的旧教的人們。但是，路德[2]却认为历史是可以帮助他去攻击那个"栖居于罗馬的那个魔鬼"。他

① 法国摩沃地方的主教(1627—1704年)，著有《世界史》。——譯者

② 路德(1483—1546年)，德国宗教家。他代表市民阶层的利益，发动宗教改革。——譯者

死后不久，又有一批新教徒編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教会史，书名叫做《梅格德堡世紀》。在这部书里面，他們企图証明罗馬教皇和旧教教会都来自魔鬼。后来，巴罗尼阿斯枢机主教[1]自信在圣瑪利直接的支持下，著了十二卷书，书中列举了上帝对于那些"胆敢反对天帝教会的傲慢之徒所降的懲罰"。在后三百年間，新教徒和旧教徒都继續不断地利用历史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就是到了现在，許多历史研究者还存在着宗教偏见。尽管这些宗教上的爭論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盲目；但是他們却大大激起近代的許多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假使沒有这种具有党爭性质的著作，如累諾杜斯继續了巴罗尼阿斯的著作，和现代詹孙的《德国人民史》，那么，我們历史的著作恐怕就会十分貧乏了。

在《梅格德堡世紀》作者們和巴罗尼阿斯看来，以及在新教和旧教历史家們看来，历史上最大的、最显著的、起决定作用的势力就是神和鬼。但是，自从十六世紀以来，我們上帝的观念和历史观念已經大大地改变了。现在难得还会有这样的历史学家，他自信能够探討上帝的意思和上帝賞善罰恶的历史事实。至于魔鬼这样东西，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很少可以归功于他了。

三

当十六世紀之时，以馬基雅弗利和归查提尼为代表的一批人把历史的观念轉到世俗的方面去。这种情形，到了十八世紀更加显著。吉本、伏尔泰、休謨、罗伯特逊等人，不但把历史世俗化，而且竭力采用古代优美的文体来叙政治事件。

---

① 意大利那不勒斯地方人（1538—1607年），曾任枢机主教与梵蒂岡图书館主任。著有《最初十二世紀之教会史》。——譯者

布林勃芳克勛爵在他約于1737年写成的«論历史研究»一篇书札里說道:“无論哪种学問,倘若不能使我們成为善良的人,或善良的公民,那么这种学問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有名无实的东西,和懶惰的借口而已。而我們由此得到的知識,只不过是一种可敬的无知。这种可敬的无知,在我看来,就是我們普通人,甚至是最有学問的人从研究历史所得的全部利益。但是研究历史却是培育我們私德和公德的最正确手段”。他又說:“历史这样东西,大部分人們把它当作是一种消遣,正好像他們打牌一样。有些人研究历史是为了要使他們的說話富于历史引喻。现在还流行着这种說法:认为人們必須知道足够的过去历史,才能明白文献上所提到的伟人巨勛。布林勃芳克又說:“缺乏想像力的学者只是滿足于整理难讀的抄本資料,和解释难懂的字句来替人們服务,或是根据不可靠的材料来編纂离奇的編年史”。他說:“也有与此相反的人們,他們认为历史毕竟只是一种‘用实例进行教育的哲学’”。他认为人們在“历史中所找到的实例都是經过历史学家用生动的文笔加以描述,再加上公正的解释或批評”的。它們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比空洞的辯論或干燥无味的哲学优美而且持久。尤其是,若把他的这些話加以小結的話,那么通过研究历史,我們可以在别人付出代价而我們自己不用冒险的情况下,在短时間內利用人家的大量經驗。历史可以使我們“同以前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且可以在我們沒有到过的地方居住。地域加广了,时間增长了。因此,我們假使及早地研究历史的話,那么或在几年之內,或在我們还沒有出去应世以前,我們不但可以获得广闊的人类知識,而且还可以获得比任何一个先輩所經历还多上数百年的經驗。”我們个人的經驗,就有两个缺点:由于我們生得太迟,不能看见許多事物的开端。由于我們死得太早,不能看见許多事物的結局,而历史这样东西却可以在很大的

范围内弥补这两个缺点。

布林勃劳克关于历史具有使我們成为更聪明，更好的人的作用的說法，并无新奇之处。波里比烏斯早就把历史看做是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指針。古代許多历史学家著书的理由就在于希望以过去道德上的成敗来揚善抑恶。但是，到了现在，几乎难得有一个历史学者还敢去劝导政治家、軍事家和道德家去相信历史上的前例和教訓；因为所謂前例，仔細研究一下，原来都是一种幻想；所謂教訓，原来就是毫不相关的东西。拿破仑[①]有沒有在他历次战事中利用过亚力山大和凱撒的經驗，我們且不去管它。但是，东乡大将[②]却沒有利用过納尔逊[③]在亚力山大里亚[④]和特拉法尔加[⑤]的战术，那是可以断定的。我們的情况变化得这样日新月异，以致一百年前的政治前例和軍事前例，到了现在已經沒有什么价值了。至于梅德林克所謂"渴望的道德"，古代薩达那培路斯[⑥]和尼罗的荒淫无度[⑦]，阿里斯蒂德斯[⑧]和荷拉希伊[⑨]的公正无私，显然都无

① 拿破仑(1769—1821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軍，后来发动政变，篡夺政权，后又成立帝国，自任皇帝，卒为各国联軍所敗。——譯者

② 日俄战爭中的日本海軍大将(1847—1934 年)——譯者

③ 英国海軍大将(1758—1805年)，在法国革命时期，曾两度击敗法国海軍。——譯者

④ 在埃及尼罗河口外。1798年英国海軍大将納尔逊大敗法国海軍于此。——譯者

⑤ 在西班牙半島西南，1805年英国海軍大将納尔逊再敗法国海軍于此。——譯者

⑥ 亚述最后的国王，初本荒淫无度，迨波斯与巴比仑軍队入侵时，忽一改旧态，誓以身殉国。困守于都城尼尼微中者凡二年，城陷自焚死。——譯者

⑦ 罗馬皇帝，相传公元64年罗馬城中的大火，即由他主使点放，但反嫁禍于基督教徒，大肆虐杀。荒淫残虐，激起国人反抗，乃自杀。——譯者

⑧ 雅典名将兼政治家，世以"公平者"称之。战功甚著，清廉自守。死后景况萧条，雅典人对他举行国葬，并由公家出資以贍养其家属。——譯者

⑨ 相传为古罗馬早期兄弟三人与古利亚梯人战，对方阿尔班兄弟三人，兄弟二人死，唯他一人未死，卒战敗对方三人。——譯者

助于它的倡导。

到了十八世紀，大批的历史哲学著作的出现，并且受到大众的欢迎。这些著作都是想要了解和解释人类过去历史总趋向。奥古斯丁和布須埃的目的当然也是如此。但是，伏尔泰却于1765年写了一部《历史哲学》，专門攻击当时人們普遍接受的宗教。他沒有提出任何特殊的历史理論，他只不过选出許多所謂“有用的眞理”。他在他的《各国民族风俗与精神》一文的开卷語中向夏特萊夫人說道：“在这本书里，您可以找出您所认为有价値的东西；各个重要民族的精神、风俗和习惯，都是有事实为証的。对于这些事实，我們不能不加以注意。这部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要人們知道哪一年在一个野蛮国家有一个野蛮的君主去承继一个无能的君主。假使人們不幸地将历代的年表装进脑袋，那么人們所知道的只是一些名字罢了。我們应該知道君主的有利人民的种种丰功伟績，而不应該将无关紧要的君主裝进我們的脑袋。历史的材料是广大无边的，人們不能兼收并蓄，只能加以限制和有所选择。我这本书好像一个大貨栈，你可以拿取对你有用的东西。”

伏尔泰对过去的反应可以从他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态度中见出，他从“大貨栈”里拿取了为他的反对现状的运动所需要的东西。尽管在我們现在看来，他的著作里面并沒有批評的精神，但是他的这种做法还是可行的。

赫德[①]于1774年中，大駡伏尔泰和其他同时代人学問的肤浅，和著作的漫不經心；认为他們这些人妄图把人类和宇宙的历史，压縮到狭小的哲学范围中去。过了十年，他又写了一部巨大著作，叫做《对于人类历史的观念》。在这部书里，他想給予历史以某

① 德国哲学家(1744—1803年)。——譯者

种理想的統一和秩序，从地球在天体里的位置和人类与动植物的关系說起。他說："假使自然界有一个上帝的話，那么历史也应該有一个上帝。因为人类本来是造物主所造的一部分。人类的情欲，无論如何复杂，但都不能不服从于同一种同天体运行一样完美的自然法則。现在我深信：人类是具有获得知識的能力，而且他一定要取得他应該知道的一切；所以我就滿怀信心地想在很杂乱的人类过去当中，探討支配人类的那些美好的、崇高的自然法則"。他认为人类天性的終点是人道。人类要經历各种不同的文明阶段。但是，人类持久的幸福只能建立在理智和公道的基础之上。而且这是一条自然法則：即"假使一个生物或一类生物被迫离开其眞善美的永久位置的时候，它一定会用它自己內在的力量，或由震动，或由漸近綫返回到它原来的位置。因为离开了它原有的位置，它就失去了稳定的境界"。赫特从混乱的过去中，概括出許多"法則"。这些"法則"不管是对是錯，对于当时哲学的尖銳批評，和对于历史深湛的观察，使近代讀者感到惊奇。他显然是"浪漫派"的先驅。这一派到了黑格尔[1]的«历史哲学»便达到頂峰。

四

从十八世紀中叶以来，在史学方面，人們在文学的、政治的、軍事的、道德的、神学的兴趣之外，又有一些新的兴趣在不断发展。这些新的兴趣对于历史研究很有影响，它使历史研究的精神和目的引起了根本变化，并使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最簡单的例子就是孟德斯鳩[2]所写的«法律的精神»一书（于1748年出版）。在这部书里，他叙述了过去的历史，为的是要建立一种純粹科学的理

① 德国著名哲学家（1770—1831年）。——譯者

② 法国法学家（1689—1755年）。——譯者

論，那就是人类各种制度——社会的、政治的、教育的、經济的、法律的、軍事的——都具有相对性。法国于1789年至1791年間起草的第一个共和国宪法的时候所展开的許多討論，曾促使人們去研究宪法史，而这种研究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沒有松弛下来。

到了十九世紀初年，法国革命初期曾风行一时的世界精神，开始衰落。欧洲各国民族思想开始觉醒，这在德国尤其显著。这种情况立刻在历史哲学的解释上表现出来。我自己虽不十分懂得黑格尔的哲学，但是关于他于1822—1823年冬天在柏林初次讲授的历史哲学，也許值得給讀者再略述一遍。因为有許多人自以为已經很懂得他的哲学，而且很受他的哲学的影响。当他回顾到过去个人和民族的不断变化，存沒无常，他就自信他能够看出，正是“世界精神”先去获得自觉，再去获得自由——它是世界精神的实质的自由。世界精神經历过許多阶段，呈现許多形式，在随时变化，推陈出新。各种形式都体现在各个历史民族所特有的天赋的才能里。黑格尔认为某个民族的精神一旦具有一定特点后，它就会把这个特点体现在客观世界中的一定的宗教、习惯、宪法、法律等方面。簡言之，就是体现在那个民族的一切制度里和那个民族的历史里。他认为波斯人是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因为世界精神在波斯国才第一次取得“无限的主观內在性”。希腊人的特点则是“以美为条件的个人主义”。罗馬世界的普遍原理則是“主观的內在性”。他这种理論虽然很巧妙，但是要不是黑格尔突出地发现德国民族是表现出“世界精神”的最高尙的形式的話，那么他的原理就不见得能成为民族自由新福音的根据，也不见得能对解释历史发生影响。黑格尔說：“德国的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在于实现絕对的眞理，就是对于自由的无限自决……德国人的将来是基督教原理的传布者。”

黑格尔把最高的地位給与他的同胞，使得德国人非常驕傲。浪漫派所歌頌的中古时代的“德意志民族精神”，近来法兰西压迫者之被逐出，不都是值得驕傲的嗎？这一切給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以鮮明的民族主义傾向和爱国主义的傾向，这是必然的。集中世紀德国史料之大成，并为世界各国典范的《日耳曼史料汇編》[1]于1826年开始出版。从此德国人就开始成为世界历史学的領袖。以后在許多学科里，德国人都处于領导地位。兰克、达思[2]、奇斯布萊希特[3]、魏玆[4]、德罗生[5]和其他数十人开始专門研究德国史充滿着同上世紀世界主义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热忱。此后，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漸走上了民族历史的道路，大大推动了规模宏大的历史資料汇編的出版。

自然，这种民族精神和十九世紀的政治与宪法問題，会把人們对于政治史的兴趣继續維持下去。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們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爭，都是最容易叫人記載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組織。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們最値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間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萊克、傅利門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是眞正的历史。

五

我們上面已經讲了从修昔底德到麦考萊和兰克历代历史学家

① 这是德意志中世紀的史料汇編，集中世紀德意志史料之大成。——譯者
② 德国历史学家(1834—1912年)。——譯者
③ 德国历史学家(1814—1889年)，著有《德意志帝国史》。——譯者
④ 德国历史学家(1818—1886年)，曾任《德意志史料汇編》总編輯。——譯者
⑤ 德国历史学家(1808—1884年)，著有《普魯士政策史》、《亚力山大史》、《希腊精神史》等书。——譯者

所接受的影响。他們都主张用忠实的态度、批評的精神来研究历史事件和条件，目的在于使讀者得到快乐，或受到教育。但是，这些兴趣沒有一个可以說是科学的。在研究过去的历史，以求发现成为政治家或軍事家的秘訣，推翻异端的信仰，說明旧教或新教是对的，說明"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阶段，說明自由是从德国森林里面产生出来的，而永远再不回到那里去，在这种种动机下，虽然也做出精深的研究，但这些动机却都不是科学的。到了十九世紀的中叶，常常变化的历史学开始受到自然科学的支配。它不再滿足于在赫利孔山上用笛子和尖銳的七弦琴来歌頌英雄們的和各民族的丰功伟績，它不敢再把天理摻入人类社会。它开始承认：从事它的事业，在早晨的时候到图书館里面去搜集資料，校閱不同的抄本，改正它們的异文。不但如此，它竟开始談到它要把它的乱成一团的史料提高到科学的行列中来。

使历史成为一門科学的新的雄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首先，就是人們开始使用批判和怀疑的观点来看待史料。只要历史学家叙述历史事件的目的是在于激起讀者的兴趣，或評論历史事件以培养讀者的品德或爱国心，或使其继續信仰上帝，那么，是否需要辛勤去考証史实的眞实与否，就无关重要。实在說起来，眞实的事实难得像"可能发生过的事实"那样有趣味，或那样有教育意义。但是，到了现在，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大部分轉向史料的性质、正确性和缺点上面去了。历史学家对他們所根据的材料加以严厉的审查。从前认为可靠的材料，现在却把其中的一部分抛弃了，或者全部抛弃了。同时，細密研究和系統的編目，也提供了許多新材料。

特别是，现代历史学家都清楚地知道：他的一切史料，就其性质而言，都不如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門的材料那样可靠。因为历史学家对于他所描写的許多现象，几乎是难于有直接的經驗。历史

学家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只能根据当时所遺留下来的不完全的遺迹。如书籍、文件、碑文、残存的建筑物以及其他考古遺迹。书籍里面的事实，历史学家慣于信賴的往往是别人写的报告，并不是写报告者自己的直接經驗，而且写报告者并不向我們說明他們自以为是的材料究竟来自何处。上古和中古的一切历史学家和編年史家几乎都是如此。所以向历史学家所提供的一切史料，其中供其推想的奇人异事，不是事实的本身，而只是心理活动的遺迹。有一个法国学者曾說："我們历史学家好像这样一个化学家：他不得不依靠一个实驗室僕人的报告来获得他的实驗的知識。"

这些例子是举不胜举的。现在我举出一个例子来說明一下。吉本对我們說过："自从公元410年阿拉利克[①]死后，野蛮人凶猛的性格，就体现在埋葬这位英雄上面，他們对于这个英雄的勇敢和命运，很是哀感。他們利用大批俘虏的劳动力，强迫他們来使康山梯阿城外的普山梯努斯河改道。用从罗馬弄来的許多掠夺物和战利品装飾起来的王陵，建筑在疏浚干淨的河床上面，于是再把河水引回到自然河道，并且把这批造墓的工人統統杀死。这样，埋藏阿拉利克的尸体所在地就永远成为一个不宣的秘密。"他这段叙述，是根据同上述事实相隔一百四十年的一位沒有学識的約旦尼斯[②]所著的文理不通的《哥特史》。而且我們知道約旦尼斯又是从他同时代人卡西奥多路斯[③]所写的、现已失传的书上抄袭来的，这就是我們确切知道的关于这段史实的全部情况。

---

① 西哥特人的領袖，于公元401年，率領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410年攻陷罗馬城。412年卒。——譯者

② 哥特人，約在公元551年根据卡西奥多路斯的《哥特史》，写成《哥特史輯要》一书。——譯者

③ 意大利人（約480—575年），曾任东哥特王西奥多利克的秘书。著有《哥特史》及《信札》。——譯者

这段事实是，对于在許多教科书里都讲到的一段历史，对它我們該不該相信呢？吉本沒有亲眼看到阿拉利克的葬礼。吉本所依据的前书的作者約旦尼斯，也沒有看到，就是后于哥特国王阿拉利克死后八十年才出世的卡西奥多路斯也沒有亲眼看见。我們能够約束在吉本书中所描述的心理活动，因为他說他的材料是从約旦尼斯书上取得的；但是我們除了約旦尼斯的材料是从卡西奥多拉斯书上取得以外，对于那种把实际情况同书本的情形分开的种种心理活动，我們就沒有方法加以約束。我們假設阿拉利克已死了，那是除了有約旦尼斯为証外，还可以有别的理由用以断定；至于埋葬阿拉利克的实际情况，我們只能說它或許就同約旦尼斯所描述的那样，但是我們万万沒有理由說：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那样。

六

科学精神的第二个結果，就是如兰克的豪語所說的，要"据实記事"。在十九世紀中叶，要想做到这一步，还是不能不提出一些理由。因为我們上面曾經說过，先前的历史学家都是抱有种种不同的目的，他們都指望叫历史来支持或至少不是来反对现行的爱国主义和宗教成见。因而历史学家的"据实記事"的有意識的决心，不仅使他的地位，比从前提高了許多，而且还使他起很大的影响。举例来說，过去五十年对宗教上的大宗现象，由于曾經过眞正科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最巨大的研究成果。

但是决意要謹愼地检驗史料，同决意要据实紀事，这两件事体，終究只不过是科学化的史学的初步。因为所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証实的人类过去的事实其数量不仅是远远超过我們可以加以簡单叙述的范围；而且这些史实的性质异常复杂，人們可以予以形形色色的解释。因此我們不能不問：自然科学对于历史学家在选择

事实和解释事实上究竟如何起它的潜在影响？

首先近代科学方法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人們可以满怀信心地說：一切科学研究者尽管他們研究領域不同，但是十分重視小事、常事、和隐事的重大意义，以及排斥神学的、超自然的、和以人类为中心的解释。这两方面他們都是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其次在探討和多方面应用自然法則方面已經取得了最乐观的、最意外的結果进行細致和耐心的研究，发现和解释自然法則，这一切都构成近代科学研究上最显著的特点。

历史这样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套着假面具，这个假面具，或者用来使它平庸的面貌变得更为迷人，使人认不出来；或者用来把人們熟知的平常事物化为牛鬼蛇神，使人惊惧；所以无怪历史学家們只能慢慢地来使自己适应科学观点。从前的历史学家很少願意描写人类的常见熟知的情况和日常生活。他們所注意的和記录下来的，就是惊人的，或例外的事物。他們好像一个地质学家，专門研究地震和火山；或者好像一个动物学家，不研究大象以下的小动物，不研究凤凰和蜥蜴以外的奇怪的习性。近代历史的进步，比化学摆脱炼丹术、天文摆脱星占学要迟緩許多。巴克尔[①]的話也許是对的，他說历史学家的知識，大体說来，实在不如其他領域的思想家。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同化学上或地质学上的問題相比，历史学家的任务面前，有着特殊的，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无疑地，历史学家之能够慢慢地摆脱古代謬誤的见解，大部分不是取决于他們自己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自然科学的全面影响，取决于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科学的特殊影响。

对于选择和解释历史事实起过巨大影响的第一个社会科学，

---

① 英国历史学家（1821—1862年），著有《文化史》。——譯者

自然是十八世紀时发展起来的政治經济学。最早，对于过去的历史，提出一系列的新穎而重要的問題的，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位經济学家，他并且对历史学家所沒弄清的事物提供了科学解释。

早在 1845 年，卡尔·馬克思就曾抨击过那些专門是在天上浮云里，而不是在地球上困苦的日常生活里去发现历史的发祥地的人們。他认为只有从經济上来解释过去，那才是最有力和最有效。他說，社会的历史是取决于社会成員之間生产生活資料和交換工业产品的方法。这种生产和运輸的方法，决定了交換的方法，产品的分配，社会阶級的区分，各种阶級之間的关系，国家的存在，国家法律的性质，以及一切人类的制度。

他这种观念究竟怎样发生，他对于这种学說的創造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我們在这里不必去詳細叙述。对于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怎样濫用他的这种学說，我們也沒有时間来解释。很多有名望的社会主义者和某些經济学家，都使我相信，每件事物都可以用經济学說加以解释，但是历史学家中同意这种說法的人实在少得几乎沒有。不过它的合理部分，許多經济学家开始接受过来。这种学說可以用来解释許多过去的现象，比之以前任何一种解释要强得多。总之，不是別人，而是經济学家，他們才开闢了这块有成效的新的研究园地，他們对于历史学家所几乎完全忽略那些持久性的、但并不显明的因素，特别强調其重要性。这样人类生活中那些平常的和普通因素所具有的重要兴趣和重要性，就逐漸清楚了。现在科学的历史学家已經不再是长篇大論地来叙述英雄的、突出的和传奇的故事，而是力图把过去的眞相重新得到恢复。这一点是具有极大的意义，因而我們不能不对它稍加說明。

现在还常常有人把历史看成是对于过去事实的記載；讀者还

是想从历史学家那里听取过去的故事。但是，有觉悟的历史学家都慢慢地开始明白：他不能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說故事者，理由很簡单，倘若只是把他有充分理由才相信的眞实事物来編写历史，那么，他編出来的故事往往都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小說和戏曲这类东西，人們可以很随便地去构思或安排情节来滿足艺术上的需求。至于历史学家則应該常常領悟到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严厉限制。假使历史学家只是局限于史料上所叙述的确切可靠的事件，那么他的著作往往就会缺少生动活泼、眞正可信的情节，因而就不能編成一个动听的故事。

历史学家逐漸明白：他的事业同文学家的事业是不同的，而他的地位却很近科学家。他能运用的只是他的科学的想像力。科学的想像力同文学的想像力很不相同。他的职务在于应用他的研究过去人类事件的技巧，做出成果来使讀者全面了解对人类的过去。他把过去的事实記載下来，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具有戏剧性趣味，而是因为它們可以說明当时使它們产生的一般的和主要的状况。假使要叙述的某些事实是同某种民族或某个个人的习慣和环境有所联系，那么，不管这些事实是怎样干燥无味也得記載下来。假使历史的主要任务是在于說明事物的由来——这一点上面已經大略談过——那么，形形色色的事件，对于历史学家来說，就是闡明对一般状况和影响广大人民变革的最重要的史料。关于这一点，历史只能学习其他自然科学所树立的榜样，例如动物学所研究的，不是罕见的和可怕的动物，也不是研究可以启发人类的动物，而是普通的原理；数学家所研究的，不是数的玄妙的性质；天文家也不是借助行星的位置来观察我們的命运。但是科学的眞諦，說明它是能够同小說竞爭，而且对我們近代人来說，研究从前被认为是最低級和最无味的最普通的东西，却有着无穷尽的兴趣。

因此免不了会有人要想发现历史上的定律，要根据自然科学的所指出的方向去改造历史，使历史成为科学。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巴克尔沒有写完的《文化史》。这部书的第一卷于1857年出版。他以为历史材料搜集以后，归攏一起看时，就有“材料丰富洋洋大观之感”，但是历史学家的眞正問題，却看不出来，更不要說去解决那些問題了。他說：“尽管人类思想有着多么崇高的目的，史学至今还是貧乏得可怜，它們呈现的外貌，还是杂乱无章，这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人們对历史法則，还是一无所知，甚至于連历史上的許多基本問題还沒有得到解决。”所以他說：“希望写出一部能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相等，或至少亦要相仿的人类史来。关于自然界方面，种种看来是最不規則的和最反复无常的事件，都已做了解释，而且还被証明是符合于某些固定的和根据普遍的法則的，这些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是因为那些有能力的人，特別是那些有坚忍不倦思想的人，研究自然界活动，其目的在于要发现它們的規律；因而，假使我們采用同样的研究态度来研究人类的活动，那么，我們当然有权利来指望取得同样的成果。”巴克尔认为要先发现支配人类活动的两种法則：物理法則和心理法則，再去探究这两种法則在全面发展文化过程中的作用。与馬克思不同，他认为欧洲的文化是如此发达，物理法則几乎是起不了作用，所以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目的就应該去研究道德法則和知識法則。

巴克尔的书出版以来至今已有五十年了，据我所知的，现在还沒有一个历史学家敢說我們向着巴克尔所确立的目标已經有了很大的进展。现在有系統地在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經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已經成功地解释許多事物。但是从天文家、物理家、化学家的观点看来，历史这样东西始終是一种异常不确切、支离破碎的知識。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所研究的是人，

人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人的經常变迁的欲望；所以现在要想把历史納入一定的法則的范围，好像是沒有希望的。而且我們上面已經說过，历史的知識必須永远建立在分散各处异常不稳的材料上面，因而历史的眞实性我們往往沒有法子去检驗。毫无疑問，我們必須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历史，但是我們现在掌握的关于人类过去的材料，尽管可能产生出十分重要的眞理，但人們却不能把它們加以組織使之成为眞正的科学。

近世历史学家都十分明白历史的材料是靠不住的，而且很不完备的；但是就是有觉悟的历史学家，当他們著书立說的时候，也往往将可疑的不定的事实隐瞞起来。那种要把历史通过文学形式有效地表达出来的要求，驅使他們不得不遮盖住他們那种可怜的无知，而且有无視已有裂口的无知深淵傾向。对这已有裂口的深淵，文学家是可以一跳而过的，但是历史学家却不得不悬崖勒馬。巴克尔和特萊柏① 这些大胆之徒，竟敢梦想把历史变为眞正科学，那是因为他們夸大和弄錯了历史知識范围的概念。

五十年以前，人們一般都认为：我們已經知道了一些有关最古的人类的情景，关于最古人类在新創的地球上的驟然出现以及他們的早期行动，好像已有一种簡明的、但却是可靠的記載。到了现在，我們才承认地球上的人类是十分古老。有許多旧石器时代②的遺物，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它們是在一二十万年以前制造的；还有許多近来发现的石器残余，它們也許比旧石器还要早一二十万年。这种时期，当然这些都是臆測或印象罢了，——而且如雷·兰

① 英国人(1811—1881年)，后移居美国。著有《欧洲思想发达史》、《科学与宗教之冲突》諸书。——譯者

② 指人类有文字記录以前的历史时期的初期阶段，当时人类以打制的粗糙的石器作为主要工具。——譯者

开斯特所說：自人类由动物进化到长有巨大的脑袋和熟练的双手，具有长久养成的投擲石块和揮舞木棒的习惯到使用机智，不使用力气来打败外来的袭击，滿足自己的天然欲望为止，到了能够制造石器止，不知道曾經經过几千万年。现在还有許多历史学家以为这些事实都与历史无关，而属“史前”范围的。但是“史前”这个字眼却同我們常听见的“亚当以前”① 这个字眼很相像，非加以排斥不可的。因为这两个字眼表示一种怀疑，即对于在人类的舞台上的脚光未亮、幕帷未开以前，我們所得到的一种不正軌的資料表示怀疑。我們对于史前时代的确知道得很少，但是在历史上曾經有过这样一个时代的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发现。在尼罗河流域发现的最古人类文明的較为发达而进步阶段的遺迹，这些遺迹大約属于六千年以前的事。人們却假設这是人类第一次所达到的一个文化阶段，这种想法是十分无理的。

我們假定：在有关过去至少三十万年間人类的事业和进步中間已經有一些东西值得叙述；我們假定我們已經侥幸地仅仅粗略地了解了人类在这三十万年期間所发生的变化的梗概。假定可以用一頁的篇幅来記載一千年的事情；那么，在这本三百頁的小书里面，只用最后六七頁就可以来讲那段整个历史时期，因为这个时期的資料(以这詞的一般意义来讲)即使是太稀少，太不全备，还是存在一些。或者我們可以把历史比作一个大湖，我們在湖边看混浊的湖底。我們可以把湖深假設为至少有二十五呎、或者是五十呎，或是一百呎。我們可以看清在湖面四五呎的深处有很稀少的生物在活动，再下去六七吋之处，水中的生物固然很多，但是我們已經看不清生物的动作了，因为在三四吋以下的地方，我們已不能看得

① 基督教的《圣經》以亚当为人类的始祖。——譯者

十分清楚。如果我們說实話，那么我們必須承认：在水面一吋的地方，我們就不能清楚完整地看清有什么东西，——恐怕連在离水面半吋多的地方就看不清了。

由此看来，历史学家的眼光不必去回顾地球处于幼年的遙远时代，似乎只要来注意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拉姆西斯二世①、提格拉比塞②、和所罗門③好像是同凱撒、君士坦丁④、查里曼⑤、圣路易斯⑥、亨利五世、維多利亚⑦同时代人；培根⑧、牛頓⑨、达尔文⑩好像是同泰勒斯⑪、柏拉图⑫、亚里士多德⑬的年幼的同时代人的小兄弟。这样看来，那些要想确定人类进化或退化法則的人們，应該擱笔才好。这好像于一周之間，观察一个四十岁的人的行动，就断定他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有发展前途，我們所有比較完备的史料都是不超过三千年；而在这三千年的史料中間，有二千年还是异常不完备，十分不可靠。关于我們虽有几部异常残缺不全的，带有文学气味希腊、罗馬的历史、許多碑文与一些重要的考古残物，但是我們对于許多重大的事情，还是蒙昧无知。罗馬帝国史的資料貧

① 埃及新王国时期法老，約卒于 1251 年。——譯者

② 亚述国王。——譯者

③ 希伯萊国王。——譯者

④ 古代罗馬皇帝（在位年代，公元 324—337 年）。——譯者

⑤ 中世紀时期法兰克国王，后称帝（在位年代，768—814 年）。——譯者

⑥ 即法王路易九世（在位年代，1215—1270 年）。——譯者

⑦ 英女王（在位年代，1837—1901 年）。——譯者

⑧ 英国著名哲学家（1561—1626 年）。著有《論学术的进展》、《新工具》等书。——譯者

⑨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1642—1727 年）。——譯者

⑩ 英国生物学家（1809—1882 年），創进化論学說。著有《物种起源》等书。——譯者

⑪ 紀元前七世紀时期希腊哲学家。——譯者

⑫ 希腊哲学家（公元前 429—347 年）。——譯者

⑬ 希腊哲学家（公元前 385—322 年）。——譯者

乏到以致蒙森[1]不願意去写罗馬帝国史。只是到了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我們中古編年史，才有其他各种文件做补充，使我們比較直接地接触到当时的生活。

但是讀历史的人，往往有这种印象，就是以为我們历史的材料，二三千年以来数量的多寡和程度的深浅都是相等的。当他看见一本大部头的«古代教会史»，或«罗馬帝国史»，或看到达恩写的或霍奇金[2]所写的好几卷«野蛮民族入侵史»，他便以为这些作者，一定是費了多年的苦心孤詣、把他們长年累月搜集来的大量材料，經过删减才写成文章。很少有人知道：从前历史学家的工作，并不是删减材料，相反地，倒是很熟练地把他們的一些浅薄的知識，加以鼓吹，直到把气泡吹得使它的光輝顏色可以吸引最輕率的讀者，博得他們的称贊。倘使把霍奇金所著的甚为过时的八卷«意大利及其侵入者»中的貧乏材料，加以压縮，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出差不多有一卷书就能够包括这八卷的內容。

但是我們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历史学家是一个最有罪过的人。第一，我們不該忘記：历史学家根据长期的传統看来，都是文学家，而做文学家終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第二，同其他人一样，历史学家对于他所找到的似是而非的史实，除非这种史实的著述是同其他記載发生矛盾，是看来根本不会有的。否則他就很容易根据表面的价值接受下来。最后，历史学家同其他的人一样，他也是做了尼采[3]所謂的“梦的邏輯”的牺牲。的确，我們不够經常地考虑这种已形成的傾向：即使具有高度文化的人也本能地有牵强附会，以小夸大的习性。

---

① 德国历史学家(1817—1903年)，著有«罗馬史»等书。——譯者

② 英国历史学家（1831—1913年），著有«意大利及其入侵者»六册。——譯者

③ 德国哲学家(1854—1900年)。——譯者

拿尼采学說的实例来說，当我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們脚底沒有我們醒悟时习慣的那种經常有的压力。这样模糊的感觉要求加以解释。用我們的梦来解释，那就是我們在空中飞。不但如此，梦的邏輯还要造出一座大屋，或者山川的风景，让我們在这上面飞行。再則，当我們刚入睡的时候，或者刚醒来的时候，在我們閉着的眼帘上有时往往会感到有一道閃光，我們把它說成是一种很像人的形像，或者是物的形像，如同影片一样清晰。现在我們明白：就是当我們清醒的时候，也有"梦的邏輯"，或所謂心眼的作用，并沒离开我們。如同尼采怀疑：梦理和心眼作用以及其他的缺陷都是我們动物祖先遺传性的一部分。无論如何，这种作用都是神經錯乱的东西，我們历史学家是本来有他們文学传統的，因而对于这些东西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人說，即使是自然科学家也往往心眼开得很大，不过他决不会像历史学家那样容易被"梦的邏輯"引入歧途。这并不一定是自然科学家自制的能力比較高超；而是因为自然科学家們的工作比較簡单，他們的知識比較容易明了。

如同前面所指出的，我們研究过去历史的人，必須要懂得：历史决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人类学一样，成为一門眞正的科学。因为人类历史的现象是异常复杂，我們沒有办法去直接观察它們，更不必說我們对于史事来做人为的分析和試驗，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大部分历史根本不知道，而只是自从印刷术发明以后，我們的历史材料才算丰富起来了。假使那些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著作家、要想教我們历史学家怎样去利用历史的材料，那么，他們就太不懂得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工作的所处境遇和条件了。

七

但是要想使历史学成为科学性的，首先要使它成为历史性历

史。很奇怪的是，我們现在认为有眞正历史价値的东西，在十九世紀以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不知道。他們所叙述的过去事实，以为都是可以激起讀者的兴趣，他們所批評的历史事实，都是以教訓讀者为目的。他們有时也不辞辛劳地去找出历史的事实的眞相。关于这一点，他們总算是科学的，虽然他們的目的还主要是文学的、道德的、或者宗教的。但是他們一般地还是不想去判断历史事实的所以然——Wie es eigentlich geworden。历史这种东西，二三千年来，主要还是过去事实的記載。这个定义现在还是可以滿足一般沒有思想的人。但是据实記載过去的事实是一件事，而要想确定过去事实的所以然，則是另外一件事。

关于产生这种历史兴趣的原因及其逐步的演变，我們在这里不可能詳細地来談。这种兴趣还具有它的力量，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們近世人已經清楚領悟到人类变化的实现和不可避免性，反映这种变化的实例，层出不穷地来迫使我們注意。希腊的历史学家叙述历史的时候，很少有或根本沒有背景。所以修昔底德把前一代的一切史料，当作只是极不可靠的传說来揚弃。波里比烏斯虽然曾专心去研究罗馬領土的逐漸扩充的情况，但是沒有任何迹象可以說明他对历史的持續性有明确的概念。在中世紀时代，无疑曾經有过这样的概念，即以为人們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演出神剧的大舞台。这出戏的結局，就是判明善恶，区别良莠。但是这种超自然的历史的統一性都是神学的，而不是科学的。关于世俗的事情，中古时代的人几乎都不懂得所謂“时間上的混乱”，所以文艺复兴时代画家，居然会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像画在他幼年时代的馬槽上，而当时的人还以为这幷沒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

一直到十八世紀的时候，人类有可能无限进步的这些話才成为某些改革家所津津乐道的东西，而这些改革家在过去都以“昔日

的黄金时代”为名来攻击当时弊端的人，所以人們必須是在将来的事物中，而不是在过去的事物中；必須是在进步的事物中，而不是在反动的事物中去找改革；这种創见要比任何发见更为重大，更为重要。人們开始日益明白，世界的确是在变化中。到了十九世紀的中叶，有思想的历史学家开始接受历史持續性的理論，开始改变历史的目的和方法。这一切都是以前所未有的事情。

历史持續性的理論，原来是建立在下列事实上。——那就是一切的人类制度，一切的公认的思想，一切的重要的发明，都是长期发展的总和。只要我們有耐心，有方法，都可以追溯得很远。如陪审官制度、戏剧、格林机关枪①、罗馬教皇权、S这个字母，支持判例的原則②，这些现有的形式，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追溯它們的来源。沒有什么人类利益是孤立于无数与之同时共存的利益以及一定的环境之外的。因此这就使得历史持續性的概念，具有更为广闊的意义，这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是很錯綜复杂的緣故。在一种制度或一种习惯里面，是可能发生突变的，但是发生全面的突变，那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一个人因为环境的变迁，或因为穷困破产，或者因为病情恶化，可能很快地根本改变其形态。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还是很少见的。假使把所有个人的习惯和利害結合起来看，人們就可以发见：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个人的許多习惯和利害，才能在霎瞬之間发生突变。但是社会这样东西，由于許多特殊的原因，它要比个人保守得多，所以历史的持續性，是科学的眞理，——这一点也不能太强調。——追溯变迁的緩慢的过程，是一个科学問題，也是一个最耐人寻味的問題。正是由于发见和应用了这个法則，这才使得历史有别于文学和伦理学，这才在某一种意义上来

① 美国人加特林于1861年所发明。——譯者

② 这个原則創自罗馬法。——譯者

看，它把历史提高到科学的地位。

八

历史严格化的后果，就使得历史的专业化迅速发展起来，这就給学历史的人提出一个新的根本問題。假使各种学問都变成为历史性的学問，那么普通的历史还有什么必要呢？假使政治、战争、美术、法律、宗教、科学、文学都做历史的研究，那么历史本身就要四分五裂，成为有机因素了么？剑桥大学西萊[①]教授认为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二十年前他曾經宣称：历史这样东西，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残余物，这种残余物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历史事实，为某些其他科学拿走之后留下的东西，而且现存的这些残余物，将来一定会遭到与其他事实相同的命运，并且不久就要有一种科学来把现在还掌握在历史学家手中无可爭辯的财产全部拿走”。

现在我要談一談最后一个問題，那就是历史在取得了全世界的地盘以后，它是不是必然要丧失它自己的灵魂？我們可以假定，历史的专业化工作已經完成得很完备，有关人类过去的各个方面、各种制度、感情、概念、发现、成就或失敗，已經都根据科学分門别类，并經过各种科学在各种学科中进行历史研究以后，各得其所了。进行历史专业化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要在許多方面来改正历史，来扩大和加深历史的作用。人类的种种事务和种种变化，不会因为写出了許多有关某个社会的教会組織或軍事組織、立法程序、农业制度、美术、家庭习慣、高等教育的观点的专門論文后，历史研究就此枯竭。相反地倒会清晰地闡明历史的絕对必然性。有許多重大的事实，当人們要想把它們納入一种純粹的科学时，往往显得

---

① 英国历史学家(1834—1895年)，著有《英国的向外扩张》，《英国外交政策的成长》等书。——譯者

异常生硬。物理的、道德的、和知識的想像，在人类活动和变化过程中，是奥妙地相互制約的。这就是历史学家应該去研究和描写的东西。

人类这样东西，絕不是科学地分門别类的总和。水是由氫和氧組成的，但是水既不像氫，也不像氧。假使要把人类的素质用科学方法分成宗教的、美术的、經济的、政治的、知識的和好战的，那就太牵强了。对这些素质固然可以进行分类的研究，而且很有裨益，但是假使沒有人去研究它們的整体，那么分类的研究，一定要产生极荒謬的結果。那些研究整体过程的人，就是历史学家。假使一切社会科学家都各自去专心研究十字軍、宗教改革、或法国革命；他們的研究完成以后，历史学家岂不是还要利用他們研究的成果，增添他們所略去的东西，改正他們由于对全面情况的无知而导致謬誤，把历史重述一遍么？

乍看起来，好像只有那些最熟悉本門研究——如宪法、植物、神学、語言学、繪画、化学、經济学、医学——的人，才有資格去研究各种专門史。但是科学家往往有两个缺点。第一：因为他們只是熟悉他們本門业务的原理，所以他們对于那些超出他所熟知概念外的远古的和不熟悉的情况，就很难进行思考。第二，发现、利用和解释历史材料，似乎有一个长期而且特别的訓练，而这种訓练，只有专門的历史学者才能具有。历史学家恰常常惊奇地发现許多沒有研究历史經驗的人发表某种荒謬见解，尽管他們对于自己本行业务很有研究，但是他在进行历史研究，則往往要犯历史学家所不会犯的錯誤。这就是为什么到如今我們还沒有一部令人满意的自然科学史或某种科学的历史，此外，人类思想和事业的某些重要問题，对专門訓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有特别的困难的。他們掌握的科学細节足以来进行研究。实在說来，即使是近世科学中最

奥妙的科学，包括数学在內，在二百年以前都是异常簡单，对于对人类某种利害抱有兴味的历史学者說来，是可以追溯出这門科学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因此，历史学者将来会越来越专业化，而且还可以补充当时各种科学家的不足。关于这一点，我想在那《思想史的回顾》一章里加以詳述。

我已經明白地指出历史学家的无知。历史学家自己也已經承认，而且尽力去用科学方法来补救他的缺点。而且历史学家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也想将他們的事业追溯到古代去。我相信：历史学家将来会对解释现状越发感到兴趣。幸而这最近二三百年以来，历史的材料，比之早期的世界史的全部史料丰富得多。历史学家现在正在对这些史料进行鉴别和分类的工作，使之可以供人应用。这五十年来，这些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使得普通的人看到会感到惊异。

我們现在已經把問題的关鍵找到了。我們已經用历史来解释历史了。从狹义的科学观点看来，历史学家的地位比文学家要稍高一些，但他比天文学家或生物学家則低得很多。但是历史学家不必同文学方面的各种联系断絕，因为文学方面的联系是异常可尊的。不过历史学家今后不但应該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該研究它的“所以然”。历史学家始終是社会科学的批評家和带路人，他应該将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綜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际生活来加以检驗。历史学家的事业是如此迷人，是如此錯綜，以致它无疑会使历史学家逐步地专心致志于历史研究，并与文学脫离关系。因为历史学家现在已經越来越明白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理想，比之詩人或戏剧家要崇高得多，更能令人感悟，而这个理想却要求历史学家具有日益提高的想像力和表达力。

第三章　史学的新同盟軍

一

我們都知道历史时常需要重新編写。这是因为什么呢？人类的过去，在一般人想来，好像已經完結了，固定了。即是神学家也不敢說，万能的造物主有力量去改变它。那么，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去利用他手边所有的材料，一劳永逸地写成一部固定的历史呢？历史学家回答說：因为随着时間的推移，我們对于过去的知識，常常有所增加，从前的錯誤常常有所发现；所以我們应該用比較完好的、比較正确的历史，来代替已經陈旧的历史。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但是即使各代的历史学家，都能够后来居上，改正从前历史学家的錯誤，那就算尽了他們的能事了么？难道他們在选择材料和判断材料上就沒有陈陈相因的危险么？难道现在的历史学家都沒能及时地迅速地使自己适应最近三十年来所积累起来大量新知識么？他們能够跟上现代人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态度的根本变化么？

历史学者所接受的一般訓练往往給他留有这样的印象：历史是固定的，可以作出結論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知道：自古以来，就有許多人劳心苦思地想确立起历史的眞理；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是很多的；許多历史学家想竭力保护历史的領域，深怕为其他学科所侵占。他們认为一切历史著作的总的精神和总的內容都是十分一致的，于是他們就以为历史的材料是非常系統完整的，只要运用一套明确的方法就可以进行研究。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非常錯誤的，它足以阻碍历史研究的正确发展。现在让我們先来看一下"历史"两字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历史本身就有一段漫长而变化多端的历史。这一点，我們在前一章里已經簡单地談过。历史的內容、目的和方法，自古以来一直是不断地变化着。一旦我們能找出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我們就可以推知历史这門学問未来的許多可能性。我們知道，历史总是勉强地，而且只是局部地使自己来适应各个时代的一般看法。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着。

第二，现在有一些自称为历史学家的人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已經如此的广闊，以致无法把历史归入一定的范围之內。举例来説，历史学家可以像吉本那样，喜欢采用普洛柯比俄斯所著的关于阿拉利克的未必会有的故事情节来使历史带有一种"像是会有"的气氛。他們也可以去研究古代希腊瘧疾的流行，或去研究小亚細亚克利薩斯①时代以来，小亚細亚的空气湿度有否变化，或者去研究法国革命的时候发行四千万法郎鈔票所起的影响②。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我們只有經过一种特别的訓练，才能判断古代石器同普通未經人們加工的火石間的区别，或者才能去校訂罗杰尔·培根③所写的《光学》那部书。人們要是想研究路德解释"篤信上帝"四字的解释是否是独創④，就和要研究俾斯麦对于老年和残废者的保护⑤

① 紀元前六世紀时吕底亚最后的国王，以富名于世。后为波斯王居魯斯所敗。——譯者

② 法国革命时期，因发行鈔票过多，不久即价値日落。至1800年，每百法郎的紙币，其价値尙不及原来的百分之一。国家財政状况，愈形困难。——譯者

③ 英国中世紀科学家（1214—1294年）。培根是圣芳济派的僧侶，长期在牛津讲学。他預言将来会有电話、飞机、輪船等发明。著有科学著作数十种。——譯者

④ 路德认为徒行"善事"而不篤信上帝，則与不行善事等。篤信上帝才能得救。——譯者

⑤ 十九世紀后期，德意志工人运动有巨大发展。俾斯麦看出他的恐怖政策压制不了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他遂企图改用"糖果"政策来腐蝕无产阶級的斗爭意志。1883年頒布了工人疾病保险法案，1884年頒布意外灾难保险法，1889年又頒布老年工人保险法等，以小恩小惠对工人阶級进行欺騙。——譯者

需要不同的訓练。所以我认为，如果人們要想安靜地使脑筋得到休息，那倒不如不去給历史下定义，那倒不如来承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研究他所认为是有趣的和重要的，并且现已掌握許多史料的、人类过去所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而且历史能否进步同能否有用，都取决于历史是否能够克制它自己，不要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同时也是去抵抗其他学科的侵犯，这些科学时常会出现在它的周围。假使历史企图这样作，那他就会誤解近世科学发展的情况。因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是不能要求独占一个即使是很小的科学范围的。說实在的，再沒有比成功地抗拒这种要求更使他們致于死命了。人类各种学問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問的界綫是互相交錯的。因为眞正人类和人类所处的眞正宇宙的內容是如此复杂，以致即使有忍耐性情、思想精細的德国人，也不能滿意地而且永久地确定起一系列自然现象——語言、思想、事业、力量、动物、植物、星星等的精理。一切的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賴的。每一門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絕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

肯波教授对于他自己所研究的地质学，曾怀着感激的心情說道：“假使地质学沒有别的科学的帮助，它就不会成熟。”他又說：“我們假使沒有物理学、机械学、天文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的帮助，我們就不能了解这个巨大的包罗万象的世界的整体。”不但地质学的早期发展是“以其他兄弟科学为根据的；而且现在它同这些科学同时进步，依靠它們的帮助。同时，地质学反过来也对于其他科学，做出一些貢献”。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研究也应該抱着同样的态度。假使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

历史这門学問必須要承认：它同生物学、地质学以及其他科学一样，它的发展是以其他兄弟科学作根据的，它只有同它們一起取得发展后，它才能反过来在帮助人們了解人类过去做出一点貢献。不管是什么历史，它总是研究人类。这样看来，假使历史学家忽視他人使用异于历史学家传統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而得出种种发明，那他們岂不是成了天下最愚蠢、最傲慢的人了嗎？

为了明白历史学家当前所处的境地，我們要追溯到历史学第一次受到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的十九世紀中叶去。我們都知道，以前的历史是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显然是文学的，也就是說，它还沒有被利用来为宗教学說服务，或还沒有被利用来激起爱国主义的自尊心和竞争心。但是到了六十年前，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取得了許多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历史学家往往引以自豪。这些成就，照我看来，共有四种。这四点成就的取得都应归功于自然科学的影响。第一，历史学家批評历史的材料比从前严格得多，部分地或全部地推翻了許多先前历史学家所盲目信任的史料。第二，历史学家有决心要直言无隐，不怕伤人感情。第三，历史学家开始知道历史上不突出的、普通的和常是隐晦的因素的重要性，注意平凡的、常见的和普通的事情；而不去注意那些罕见的、特别的和传奇式的事情。第四，历史学家开始輕視先前历史哲学家那种神学的、超自然的或以人类为中心老一套的解释。对于这四种成就，我不想詳細說明了。因为沒有人再会来怀疑它們的根本性质。它們是多年研究的成果，也是带动历史发展的先驅。但是，这四种成就仅仅就是带动历史发展的先驅嗎？如果对它們加以考察，那它們的性质会不会被証明是消极的呢？决心把尽力考証出来的事实眞相說出来，宁可考虑正规的、平常的事情，不去考虑那些突出的、聳人听聞的事情，抛弃向上帝和魔鬼去寻找历史解

释，这一切都仅仅是給重新編写历史做的准备工作，它們所提供的只是編写历史的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开展历史研究的計划。而且这一切决不是必要条件的全部。历史学家們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有希望理解过去的历史。

托瑪斯教授曾說得好："自从人們广泛地接受了关于生命和世界的进化的观点以来，这就使得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所有关于人类的科学受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对于生活中的某种状况决不能单凭它的眼前的现状就可以完全了解。无論对哪种东西，应該看作它是有它的来源和发展的，我們不能忽視它的发生和发展的阶段。举例来說，现在心理学家和神經学家并不是仅仅去研究成人的脑子，要想明白人类大脑的活动和构造，他們还要观察儿童的心理活动和儿童大脑的构造，来补充他們的研究。他們还要从这个問題的现状作进一步的研究。他們进而要研究猴、狗、鼠、魚、蛙等的心理和脑子，研究一切有神經系統的生物，甚至于研究只有单細胞动物的心理和脑子。他們进行这些研究就有可能对于大脑构造和心理作用得到启发。他們要从最下等动物的脑子研究到最高等动物，从最簡单的脑子研究到最复杂的脑子，逐一地注意它們的构造和功能的不同，从而才能弄清楚最复杂的人的脑子、弄清楚人；至少有弄清楚这些問題的可能。"

按理說，历史学家应該首先发现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的理論。但是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不但不是第一个理解到历史观点的重要性，反而让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去发现。更糟的是，我們可以說：虽然自然科学家已經充分发展这个創见，但是历史学家却至今还是偶然地加以利用。因而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像比較解剖学和社会心理学那样有严格的"历史性"。即使在现在，

許多历史著作在叙述事件和情况时，作者还沒有明白：一切事物都是有其来源和发展过程的；不明白它們的发生和发展阶段，不明白"生活中的某种状况是决不能单凭它的现状就可完全了解的"。历史学家当然也常常談到帝国的兴亡和制度的盛衰；而且近来他們很注意各种制度的发展情况，但是他們的采用事物发展的观点的范围就仅限于此。因而他們的历史著作还是不能摆脫具有长期传統的、即我們所謂历史片断的叙述方法。他們仍旧还是徒劳无功地去描写事实，而不知道事实的"所以然"。举例来說，现在大家之所以不能了解法国革命，就是因为历史学家急于要叙述 1789 年以后发生的巨大事件，不是依据前事来进行解释，他們对于以前的事情只是用导言的篇章做一般性的解释，当然这样还是不能給讀者提供充分的綫索来理解以后发生的事情。又如"文艺复兴"所以一直为人所曲解，就是因为博哈德和西蒙兹对于"文艺复兴"以前的时代的无知。又如中世紀时代的文化对于那些沒有精心研究第四世紀文化的人来說，至今还是一个謎。

现在历史学家的处境还是像一个人睡在一张别人的床上忽然醒来那样，他只有仔細考察房中的家具，才有希望弄清他的处境。这种令人奇怪的处境只有通过回想过去才可弄清楚，也只有通过回想过去才可理解。这种情况很像一个人从芝加哥出发，他的目的地是旧金山，中途要耽擱一下，不能不在沃格登过夜。例如，假使历史学家給讀者詳尽地描述 1692 年薩勒姆村的情況，告訴我們說那个被称为好好先生的主教的地窖在甚么地方；那个致人死命的木偶是在哪里找出来的；并向我們指出尼希米修道院长的公牛是在甚么地方因为被蘿卜梗住而突然死去的，那么，我們还是不能領会新英格兰所发生那个可悲痛的事件。因为眞正关鍵的問題在于我們好好的祖先为什么因为所謂的老妇同鬼打交道就要絞死她

們[1]？这个問題只要稍微具有宗教和教会史对比的知識，就可弄清楚。宗教改革家并沒有去废除或削弱卡登·馬瑟的迷信观念。即使我們对于卡登·馬瑟所处环境进行了极精密的研究，我們对他还是不能了解的。

近代历史学者往往向专业发展的趋向，他們希望专长某个領域。其实，这种现象往往会阻碍他們去眞正了解他們认为似乎是最了解的东西。最优秀的历史著作（这种书是很少有的）同平常的历史著作的差别，就在于作者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眼光这个問題将来一定会大大地发展起来，因为一切历史著作，若要成为建設性的和教育性的历史著作，并且不仅局限于历史原材料的收集，那么，都应該把历史眼光貫注于整个著作之中。

历史学从其他不同領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方面得来的好处决不止于历史眼光。此外，还有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发现的两件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这两件事实，沒有一件可以归功于历史学家的。一件就是动物学家証明：人类是从低級动物变来的。另一件就是英国的一个地质学家第一回清晰地很有条理地証明：人类住在地球上决不止六千年，而是至少有六十万年的历史，但是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点則都是妨碍他們去发现这些学說。历史学家为了替自己辯解为什么自己不能作出这些发现，說成是他們完全不熟悉那些被用来証实人类自动物变来和人类有悠古历史等事的材料。即使他們的托辞是对的，那我們可以质問他們究竟有沒有严肃地考虑过达尔文、来尔[2]两人所发现的两个重要学說呢？

---

① 十七世紀末年，英美諸国，巫术迷信頗为盛行。1692年前后，美国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村中有老妇被控行巫术，审官肆行拷問，牵連甚多。因被指控行妖惑之罪，无辜而被絞死者凡十九人。——譯者

② 英国地质学家（1797—1875年），著有《地质学原理》及《古代人类》等书。——譯者

实际上他們并不急于考虑这些学說。这两个学說对于上一代的历史学家来說，都是很生疏的东西；在历史学家兰克和班克洛夫特看来，这些学說同他們的工作是毫不相关的。即使在今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仍旧怀疑人类从低級动物变来的說法，认为这并不是历史事实；尽管他們承认亨利二世是征服者威廉一世的后裔这个历史的事实。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坦率地說：人类起源和人类具有很古的历史两种学說，同他們所研究的問題，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关系。他們这話說得很对，大部分的历史研究工作是可以不必去管人类的起源的。假使他們去研究公元887年7月1日这一天，胖子查理[1]究竟是在英格兰，还是在卢斯特瑙时，那么，查理国王的祖先究竟是或在凉风的黄昏和上帝对話，还或是爬在地上，或是睡在树上，就无关紧要了。假使他們要断定在俄亥俄河上的法国堡垒[2]究竟是在甚么地方，或者去描述瑪利·安东奈特[3]所以厌恶米拉波[4]的原因，那么，他們当然可以不管在海德耳堡[5]挖掘出来的古代人类的顎骨。整个历史研究的进行不但可以不管人类的起源，就是不懂得人类是什么东西也不要紧。但是，在許多重要的研究領域内研究工作者都必須要知道关于人类的一切发现，否则他們就会心甘意願地陷入学問肤浅、結論謬誤的泥淖。

---

① 神圣罗馬帝国皇帝(在位年代公元881—887年)。——譯者

② 美国中部大河，当七年战爭时(1756—1763年)，法人沿河筑炮垒，为联絡北美南北两部殖民地之用，卒为英人所夺。——譯者

③ 法王路易十六之王后(1756—1793年)，法国革命时期，于1793年10月被革命政府判处死刑。——譯者

④ 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1749—1791年)，出身貴族，但在革命运动中他代表大資产阶級利益，1791年卒。——譯者

⑤ 德国地名。——譯者

二

由此看来，历史学家虽然在那里尽心竭力地想使历史成为科学，但是他們却仍旧让自然科学家去說明历史眼光的优越性，让他們去发现两种关于人类的学說；这些学說比奇塞布勒希特、韦兹、馬丁或霍奇金等人的一切学說要更具有革命性。现在，研究历史的人显然不但应該尽快地使自己来适应总的学术情况中的这些因素，而且还应該对于各种关于人类的新科学表示他們的态度。这些新科学，因为自由地运用了演化的理論，进步异常迅速，改正了許多为大家所接受的那些历史学家所做的結論，并且澄清了許多自古相传的謬論。所謂关于人类的新科学，我所指的首先是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和比較宗教学。政治經济学对于历史已經发生很大影响。关于社会学，在我看来，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观点，而不在于关于人类的新发现。这些新的社会科学，都有人在做专門的研究，他們已經使历史学家慣用的許多名詞的意义全部改变了，如“种族”、“宗教”、“进步”、“古代人”、“文化”、“人类的天性”等等。他們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旧說，解释了許多历史学家使用自己的方法再不能解释的历史现象。下面就开始来讲一讲史前考古学。

保守的历史学家也許会立刻起来反对說：尽管未有記載以前的人类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因缺乏文献記載，我們对它却一无所知。他們說，考古学虽然发现了几件比从埃及陵墓中发现的还要古老的人类手制器具和人类的头盖骨，甚至全副骨胳，而且熟悉史实的人都不怀疑，在埃及文化未发达以前，人类在世界上已經生活了千万年。但是我們除了知道古代人类顎骨的形状和他們石器、骨器的性质以外，我們对于古代人类还知道些什么呢？假使我

們认为我們对戴克里先[1]和克劳維斯[2]时代还知道的不多，那么，要想推想穴居野处时代人类的生活习惯，岂不荒唐？

若說我們对古代穴居人类的家庭生活至今还是毫无所知，那当然是事实，并且恐怕还不会有明白的一天。但是关于最早的銘文出现以前，人类历史的材料，却已积累了不少。人們所以不知道它們的重要性也許就是被"史前"这个不幸的名詞所誤。历史学家走馬看花似地看了一盒又一盒的石器、拳斧、箭头、刮刀，画在骨头上的图画，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銅器等，觉得可厌；他們以为这些东西最多不过可以証明从前有一种野蛮的人类，同现在的蛮族差不多，那就完了。但是，假使他們去仔細想一想，他們就会知道"历史"和"史前"的区分，实在是一种武断的区分。所謂"有史以前"，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摩西[3]和荷馬的作品沒有出现以前人类的历史，人类最早遺留下来的东西。

但是，历史这样东西，就其最全面的意义說来，应該包括所有我們所知道的关于人类过去一切事情，不管我們所运用原始材料是怎样性质。史前史学者所占有的考古資料不仅在可靠性上有时要远胜于文献記載，就是在碑文和书籍出现以后，它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现在我們把那些許多不见于书本或碑文記載的材料认为是史料。比如古代人类最早所用的完善的手工工具、石斧，在南部欧洲、非洲、印度、日本、北美洲都被使用，这并不是一件"有史以前"的事实，而是一件"历史事实"。这和凱撒在月圓的时候渡过英国海峽那件事实[4]是同样性质的历史事实，而且更加重要。

---

① 罗馬皇帝（在位年代，284—305年）。——譯者

② 中世紀初期法兰克国王（在位年代，481—511年）。——譯者

③ 《圣經》中的犹太領袖，相传他率族人离开埃及返回犹太，于西奈山上，受耶和华之十誡，創立犹太教。——譯者

④ 凱撒第一次渡海为公元前55年8月25日。——譯者

假使研究历史的人們还是对古生物学漠不关心的話，那么，請他們去想一想下面这件事情（因为这样的假設是沒有危险的）：假使最古的拳斧是由二十万年以前人类所制造的，那么，我們所謂五千年至七千年的“历史时代”，只不过是人类慢慢地建立现代文化基础这段时間的三十或四十分之一。但是，相对地来說，拳斧是一种很完全的工具，而且散布于地球的各个地区。所以它可以反映出从不能說話、不能制造工具的人类祖先到能够制造石斧的人类，这中間不知道經历过多少年代的进步。照这样看来，假如研究历史的人忽視原人学，他們就有对人类近代变化全部情况沒有它的背景的危险。从前阿修大主教①曾认为所有人类和陆地的动物，都是在紀元前4004年10月28日星期五那一天創造的。这种說法引起了我們和“古代人”的关系的許多肤浅談論，实則这些“古代人”实是我們的同时代人。

我們似乎可以有这种看法：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現在这个短时間內，人类的思想能力既沒有增加，也沒有减少。实在說起来，假使我們能够让一伙公元前五世紀时候出身于雅典上流家庭的嬰儿，同一伙现在出身于最有知識阶級中的嬰儿，完全同文明隔离，由狠喂他們乳，由烏鴉喂食，那么，这两伙孩子就会陷入野蛮状态，就要同猩猩差不多。沒有人能知道他們中間究竟要經过多少时間才能不断产生才能出众的人来作句子，发明火，或把一块燧石块造成拳斧，而且我們也沒有理由可以想见这两伙人中間誰会比誰最先取得进步方面具有优势。因而只有教育和社会的环境才能够把我們最文明的人同地球上的最野蛮的人分开。

对于“种族”这个名詞，历史学家过去是，现在还是十分随便地

① 爱尔兰人（1581—1656年）。——譯者

使用。以前关于"种族"和人类起源于亚洲西部的許多学說，大部分是从《創世紀》中关于伊甸园、洪水神話的記載，和关于建造巴别通天塔时，上帝混乱各地人的語言，使他們彼此言語不通的故事，或无意中得到暗示，或有意識地得到启发的①。例如，蒙森在《罗馬史》第一章中所提出的、关于阿利安人种的学說，现在看起来，几乎是同《圣經》中建造通天塔的那种說法一样幼稚可笑。自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的那个地质时代以来，水陆的分布、气候和动物的分布一直在經历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外界环境的自然变化，当然会引起人类各种移动和融合的种种情况；此外，还会产生征服、侵犯、奴役和杂乱的性关系。这样就将各种不同的人群混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十分复杂混乱的道德、习慣和語言。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还是常常談到"人种"这个名詞，好像我們仍旧可以相信麦克斯·繆勒② 所編造的伊朗高原和阿利安人种散布的那个故事。

上述的一切情况是足以具体地說明史前考古学对于一切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因为假使他們无視史前考古学的成果，那么，他們就有沿袭自古相传的謬誤說法的危险。但是，为了要了解在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的状况，我們所能利用的資料并不限于过去人类的遺迹和人类的手工制品。威廉·湯麦斯教授說得好："现在的部落社会实际是一种未发达的文明；现代的野蛮人就是我們同时代的祖先。" 那么，那些研究工作者——即是人类学家——那些研究现在野蛮人的习慣、风俗、制度、語言和信仰的人們，将会作出最大的貢献帮助人們眞正了解历史。从人类发展观点来看，人类学可以

---

① 《旧約·創世記》中謂最古的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样"。以后在巴比仑首都巴别地方建造通天塔时，上帝变乱了人們的語言，使各地語言彼此不通。——譯者

② 德国語言学家(1823—1900 年)。——譯者

被看作是历史的一部分，正好像动物心理学和比較解剖学是人类心理学和人类解剖学的一部分一样。

我們至少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已經承认这个眞理。爱德华·梅尔教授[德国著名古代史家]在他那部增訂再版的《古代史》里，用了二百五十頁篇幅来讲“人类学原理”。他說：“我的著作前面，作了这样一篇导言，这在从前恐怕就会引起人家的惊奇，而且还会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因为当时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完全不注意这些問題。现在这种情况已經改变了，沒有声明的必要了。……其实，对于一部科学性的內容正确的古代史来說，这篇导言是絕对必要的。”

但是，现在有許多历史学者还不明白人类学对于他們可提供的帮助。这一則是因为他們对于人类发展的全部問題，本来就漠不关心；二則是因为他們多少怀有合理的怀疑心理，他們怀疑如果按照我們企图用人类学上的原理和讲解来解释过去的事实和状况，恐怕会有誤入歧途的危险。

但是，由于我們愚蠢而不知某种工具的用途而就加以排斥，这是一回事；我們为了保护我們自己而不让这种工具来伤害我們，則是另一回事。但是，即使是最頑固和自滿的历史学家，除非他穿上了上帝的胄甲来保卫历史的疆界，也一定会肯定研究人类学的价值。因为人类学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提高我們的见解，尤其是在对一切有关宗教、宗教习慣或保守精神的潛势力等問題，特别有帮助，这也就是历史学家所常常遇到的問題。在近代科学里面，再也沒有一門科学像比較宗教学那样将陈腐的历史观念彻底推翻掉。因为这种科学所用的材料和方法，是半历史学的和半人类学的。从前的历史学家对于宗教上的现象往往不能深入本质，以为那些现象是自然而然的，它的起源也是不足为奇的。他們不知道在人

类社会发展中宗教是最容易說明的一个方面。人們不仅把产生正宗派基督教的混合主义弄明白了，而且还把掺进在基督教初期教父們的神学中那些很古的和很原始的迷信也弄明白了。

圣·柴尔曼博物館館长苏罗門·莱那契先生曾对我說：几年前，当蒙森来博物館参观收藏品时，他还沒有听到过'冰川期'这个名詞①，也沒有听到过'图騰崇拜'这个名詞。蒙森以为这些名詞都是这个館长編造出来的。现在我們都知道蒙森是近代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我們大家对他的著作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是很熟悉的。由于他对史前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两件最普通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阻碍他不能用正确的眼光去观察罗馬的文明，阻碍他不能完全領会罗馬的宗教现象，甚至它的法律现象。正如亨利·亚当斯曾經恰当地說过："人类在长期的冰河时代，好像一个'函数'"。至于图騰制度則被用来解释这些现象：如馬达兰尼时代②黑暗山洞里的壁画、犹太人对猪肉的嫌恶，垒球队的尊重'福星'。现在基督教教会的許多信仰和习惯，也可以直接地或迂迴地追溯到图騰制度、万物有灵說和神賜的食粮等信仰。

历史学者明白了这些道理，假使还沒有照着这样去做，那么，就应該快去讀讀人类学和比較宗教学方面的富有启示性的著作。下列各书都是这方面的名著：湯麦斯編輯的《社会起源資料选輯》、已經去世的森木納教授所写的《社会传統》、苏罗門·莱那契所写的《奥非烏斯》，康尼皮尔所写的《神話、魔术和道德》和德·摩尔根所写的《初期文明》。如他讀了以上各书，还不能改变他的历史观念，那他眞是魯笨的人了。

① 根据地质学家之計算研究，地球曾經过四次冰川期。——譯者

② 此期是旧石器时代之最后期(約在紀元前 35000—15000 年)。——譯者

三

因此，关于我們同所謂“古代人”的关系、一般宗教和基督教、以及“种族”等問題的陈旧观念，經过现代学者的研究，已經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学者一般不被看作历史学家。这些科学家們指出了旧日历史学家的推理的肤浅，并且还指出了一种新的、較为正确的方法去解释过去的事实和状况。有些历史学家对于“进步”、“衰退”、“人类的天性”、“历史的連續性”和“文化”等名詞幷沒有充分了解而胡乱使用。假使他們稍有一点“人类学”的知識，再懂得一些“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等新科学的原理，那么在使用这类名詞时，就可以有較深刻的了解而糾正过去的錯誤。

社会心理学现在虽然还刚刚开始創立，但是它是建立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那就是我們因为同他人有着联系，所以才有自我。“自我”是社会的产物。如果沒有他人，我們就沒有“自我”。米特教授說过：“不管唯我論在形而上学上是否能存在，但在心理学上它是存在的。假使要有自我，那么一定要有他人。进行心理学的分析，对于往事的追忆，对于儿童与野蛮人心理的研究，都表明‘自我’只能作为与其他的許多‘自我’的对立物时，才能为人所意識到。”

乍看起来，关于自我的来源及其对于社会的依賴性等問題，同薩尔貢[①]在位的年代、文艺复兴的意义、或拿破仑征服英国的可能性的看法等問題好像是离得太远。但是，历史学家对于許多更加重要的事件的看法，如果他們对人类模仿的规律和我們从原始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本能稍加研究，那么，他們的见解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这門学問和泰德教授的名字分不开的。实在說来，假使沒

① 約于公元前2369——2314年为古代两河流域阿卡德国王。——譯者

有社会心理学，我們就决不能理解人类如何学习和传播它的发現和誤解。我們就不可能理解有别于类人猿生活的人类文明的全部理論。如果沒有动物心理学，我們就不可能理解社会心理学。只有对这些学問进行研究，才能説明那些历史学家必須加注意的“进步”、“退化”的問題。在这样一篇小文章里要説明这个复杂的問題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这个問題十分重要，我想在下面做些簡单的介紹。

第一，我們对于种种事物的看法，如今岂不还是心甘意願地在做“以人类为中心”那种陈旧观念的牺牲品么？由于西方人士长期持有这种观念，他們根本不管近六十年来的种种发明，过去传下来的許多未曾改正的观念至今还潜伏在我們的见解之中。我担心，我們經常会忘記：人类男女并不像馬克·霍浦金[①]和他同时代的人所普遍相信的那样，是上帝在一天之內就造成的。人类是从不会說話和不会耕田的动物进化来的；并不是出世之初，就有純洁的崇高的抱負、很发达的語言和农业的知識。所有古代有过的同现在还有的动物，人类也包括在內，“恐怕由于远近血緣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們的血統不止几百代，实在可以追溯到自从地球上人类以来所有地质学上的年代。人和类人猿身体相同之处，长期以来，一直是人們討論的題目。二千年前，罗馬埃尼烏斯[②]曾經发生过这样問題：“我們的祖先同猿何以这样的相似？”随着近代动物学和比較解剖学的发展，人类和动物在身体构造上相同的地方愈加显明了。达尔文曾經将人类全身有毛的祖先描繪成这样一个肖像：有尾巴、有可以握东西的脚，长着像犬的大牙。这个假設由于在人身上还发现某些退化筋肉和器官、祖型再现现象和

① 美国人(1802—1887年)。——譯者

② 罗馬詩人(公元前 239—169 年)。——譯者

病理学上的状况而得到証实，因为这种情况只有进化的学說才可加以說明。我們的身体和身体的作用，同高級动物既如此相似，那么，我們的头脑又怎样呢？是不是从动物心理逐步发展过来的呢？我們的心理同动物的心理是否完全不同呢？还是动物的身体好像我們的身体一样，身上仍旧保存着一切有用的和那些已經无用而只能产生紊乱的特点呢？难道我們还不会說話的远祖的心理不但出现于我們嬰儿时代和年老力衰的时代，而且每当我們一遇到危急的时候也要重新体现么？我可以毫不武断地肯定說：研究动物心理学的人，都会承认：灵长类的其他动物身上的心理作用将永远体现于人类的身上。假使这句話是正确的，那么，我們岂不是应該研究动物心理学以求得一种知識，来使我們发现与明白眞正使得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是些什么东西？

比較心理学或动物心理学这門学問在美国各大学里只是最近才有适当的地位。桑代克教授在十二年前是第一个将心理学建立在实驗基础上的。从此以后，心理学发展很快，特别是在美国。当猿皺眉地在观看时，我們几乎很难知道它在那里想些什么。萊那契說过："动物不能把秘密告訴我們"。但是，科学上的观察和实驗都已証明，猿和其他各种动物都有接受教育的能力和它們学习的方法。科学家又証明：类人猿能做許多它那住在森林中的祖先所不能做的事情。它們是很可以教育的。看来通过"用試驗和糾正錯誤"的方法，或者使用我們所謂作弄心理的方法，用賞罰去激动它的方法，类人猿可向人学得許多东西。尽管模仿性的性质和作用到现在还沒有弄得很明白；但是我以为沒有人会怀疑它的重要性。现在我們不能不提一个显著的問題：我們人类是不是同类人猿一样，大体上也因为有了試驗，有了錯誤，有了作弄的能力，有了賞罰的刺激，有了模仿性，才可以学得許多东西呢？我深信这个

問題的答案是：几乎我們所有教育根据都是建立在同类人猿原理略有变更的基础上的。对于一个相信历史具有連續性的人来說，这是一种很可喜的新发现，尽管从其他方面看来，这未免使人感到耻辱。

我知道大部分历史学家，乍看起来，都认为比較心理学和历史学相去太远，很难发生关系。但是这种印象是錯誤的，至少在关于文化的性质和传播的問題方面是錯誤的。假使我們不懂得一些动物心理学，我們就不能了解人类文化的性质是有别于我們只是从动物身上继承过来的遺产。历史学家若能把較高級的少有的人类特有的心理，同我們由于祖传习惯现在还經常在依賴的那些优势的基本的类人猿心理方式加以区别，那么，对于思想的变迁、制度的发展、发明的进步、几乎一切的宗教现象等問題，恐怕就要容易研究得多了。

我想对于心理学方面来举一个簡单例子。加勃里尔·塔尔德曾經强調說，我們所有文明中各个最微小的原质，文化中的各个原子，以及动物身上必要的器官，一定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或是重新体现的，否則就消灭了。对于这个规律在历史上的作用，給予証明便是我們历史学家很重要的一部分职責。文明不是天生就有的，但就广义来說，它是由模仿传下来的。一个字、一种工具、一本书，假使不去加以普及推广和不断更新，那么，它們就肯定会像有机体那样遭到消灭，这个规律也适用于下列事例的說明。假使西罗馬帝国瓦解以后，时局混乱和学問长期消沉的程度稍稍增高，那么，恐怕西欧的希腊书籍就会遭到必然的消灭，假使在都尔的格里哥里[1]时代，在高卢[2]地方能讀希腊书籍的人只有君士坦丁时代

① 法国人(540—594年)。——譯者

② 在今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譯者

的一半，那么，色諾芬的«居魯士的教育»，或欧里庇底斯[1]的«伊雷克特拉»这两部书遭到消灭的机会，就不知要增加多少。

在总結这些见解的时候，我很知道这些见解对于有思想的讀者，也許会引起許多严重的危险。历史学家会承认他們是忽視了在别的科学領域各种新发明的学說对于他們的結論所具有的影响；但是他們会提問：他們如何还有功夫去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經济学、比較宗教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气候学等等的科学呢？仅是这几种新的科学名詞，他們已經弄不清楚，哪能作进一步的研究呢？而且他們还抱有一种并非不自然而产生的怀疑心情，认为許多人向他們介紹一些常識，其实这些人自己还是一知半解的东西。有些新兴的社会科学中常使历史学家很不愉快地回想起那些现在已經絕迹的历史哲学家，他們自以为是用推理方法发现了人类过去的由来，而对人类的过去却不必去进行研究。

但是历史学家假使把近代的社会科学，同从前那种陈旧的无人相信的历史哲学相提并論，那就大錯特錯了。历史哲学家研究人类的过去，其目的在于滿足他們的感情上的渴望，他們所作的解释，归根到底往往是带有一些神学的、或者民族的偏见。至于现在社会学家則恰恰相反，他們对于人类过去的历史作了一种很眞实的、有价値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显然是片面的。虽然社会科学家确实忘記了休謨所說的那句話："宇宙运行中有千变万化"，而去过份地强调自己所喜欢的某一方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效用。

显然，同地质学家、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一样，即使历史学家沒有功夫去掌握他們最为接近的其他科学的原理，但他們必須利

[1] 古代希腊悲剧作家（公元前 480—406 年）。——譯者

用其他科学家所能提供給历史学的学說。历史学家不一定要作人类学家或心理学家才可以利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发明和学說。这种发明和学說必然可以对历史学家貢献出一种新的见解，而新的解释則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糾正許多誤解，改正存在于历史著作中許多陈腐观点。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应該彻底树立起历史的观点，运用发展的学說去解释人类过去的經驗，而且消除人們这种猜疑，即历史学家尽管自己的称号和地位是历史学家，而他們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所有企图解释人类的学者中間却是最沒有历史观点。

許多新兴科学領域，有时很可能会言过其实，他們所提供的历史解释，也时常会遭到历史学家的反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經济学家的思想，无疑地跑得太快，失去分寸，这就使得許多历史学家抱住过份的保守思想，心安理得地就什么也不去想了。但是无論如何，想得太少总比想得太多会有更大的冒险。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軍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

第四章　思想史的回顾

一

培根勛爵在他的《論学术的进展》一书里曾經說:“现在虽然有許多关于研究自然现象、政治和宗教的著作,但是总沒有人专心去描写和叙述历代学术思想的概况。世界史中如果沒有这方面的叙述,那就如同波利菲穆斯(独眼巨怪)[1]沒有眼睛一样。这就缺少了那个最足以代表人类精神和生命的东西。但是,我并非不知道在各种科学里,如法律、数学、修辞学、哲学等,常常提到某些学派、作家和书籍;而且对于技术的发明,或日常的习慣,也有些簡单的叙述。但一种公正的学术史,包括学术流派的起源、它們的发明和传統、它們不同的行政制度与管理制度、它們的兴盛、对峙、衰微、萧条、消沉与湮沒,它們的根源和它們的起因,以及所有自古以来其他关于学术思想的大事,却是缺乏的。”

培根这話已經說过了三百多年了,但是他所指的那些缺点,到今天还沒有得到弥补。我們现在还是沒有一部“恰当的思想史”。我們的确有过几部叙述某些思想的历史书,尤其是叙述哲学史和神学史的书。但是这一类的著作,大体上都是局限于那些著名思想家的学派,如柏拉图派、亚里士多德派、康德派[2]以及黑格尔派;保罗派[3]、奥古斯丁派、阿奎那派[4]、路德派以及約那頓·爱德

① 古代希腊荷馬时代神話中,謂西西里有一个独眼巨怪,名波利菲穆斯。其眼后为勇士尤利西斯所焚,遂致盲目。——譯者

② 德国哲学家(1724—1804年)。——譯者

③ 相传耶穌的門徒。——譯者

④ 意大利中世紀經院哲学家(1226—1274年)。著有《神学大全》等书。——譯者

华派①，而不是叙述当代流行的思想。普通人只能懂得各种哲学流派里面的、簡单易懂的部分。因而对輿論史发生影响。当我們說奥古斯丁主义、黑格尔主义、或者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們指的并不是这些作家的全部哲学系統，而只是他們的几点特別突出看法。由于这些学說特別深奥，只有专家才想去对它們进行研究。现在一个知識分子假使要回顾和問一問自己，他和一般人所接受的思想，究竟来自何处，他若都想从哲学史里去寻找答案，那只是徒劳无益的。培根的話，至今还是有用，因为我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沒有人十分明白地要写一部学术思想史。

但是，在过去的最重要的教訓中，难道还有比教导我們去了解那些重大問題是如何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更加重要的东西么？这些见解大部分都不是我們自己苦心发明的，而是同我們所居住的地方的制度和社会习慣一起继承过来的。丰富的思想內容是几千几万年积累的結果。现在有許多广泛流行的观念，断不能发生于近代，而一定是发生于跟现在不同的环境中的。因而我們的陈腐知識，就往往不能承担种种新的前所未聞的事业。我們只有研究人类思想的变迁，才能使我們充分明了这一点，从而才能改变我們的观点来适应现在的环境。

如果事情像前面所說的那样，在我們现在所处的机器动力时代，我們的思想变化往往是落后于环境的变迁，那么，如果对于那些存在于我們世界观和对世界的态度中的謬誤不去研究其产生的根源，我們又怎能发现我們的謬誤呢？培根責备历史学家說他們只給我們提供了一幅肖像画，而在这幅画上却沒有画上体现人物精神生命力的巨大眼睛，这种責备岂不是很对么？

---

① 約那頓·爱德华(1703—1758年)是美国教士。——譯者

广大群众在对于这个被人忽視的园地的殷切关怀也可从德拉波所著的久享盛名的《欧洲思想发展史》一书见出。现在看来，这本书虽曾得到好几年的盛名，实在是名过其实。用我們现代的观点看来，这本书除了体裁还可用、见解还可信以外，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缺点。德拉波始終不願意向讀者說明他的史料来自何处，可是批評家都很淸楚，他的见解看法是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的各种著作中得来的，他的結論根本不是从第一手材料得来的。他坦率地向我們說：他的目的在于証明两个法則，而这两个法則现在根本沒有人相信了。

在德拉波的著作出版的同时，萊克[①]出版了《欧洲唯理主义的兴起及影响》一书。它同德拉波的书大不相同。这是精心研究的結果，它体现了作者的特别謹愼的治学态度及其所具有的学术水平。但是遺憾的是，他只叙述了最近三个世紀的欧洲思想的发展，而对以前的发展只是提供了一个簡单的背景。

曾經引起許多讀者注意的第三部著作是怀特所著的《科学与神学之爭》一书。在这部书里，作者的措詞异常激烈。这也許是因为他曾亲自参加論爭的緣故。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曾借助于許多学者給他提供大量的論証。他很有力地利用这些論証，駁倒那些神学家。但是他在书中却宣言他写书的目的，无非是揭穿基督教教父遺书的和中世紀传統的荒謬学說，并不在于站在公平正直的立場来叙述学术思想的历史。

勒斯列・斯蒂文[②]所著的《十八世紀英国思想史》很可作为十八世紀哲学史和文学史的补充。本恩所著的《十九世紀英国的理性主义》一书叙述的主题是十九世紀时期人們对于教会所支持的

---

① 英著名历史学家（1838—1903年），著有《十八世紀英国史》等书。——譯者

② 十九世紀英国学者。——譯者

意见愈来愈不滿意。迈尔兹所著的《十九世紀欧洲思想史》一书也許是当前对于学术思想通史上的一个最有学术价値的，最重要的貢献。书里有几章出色地显示了研究思想史的价値。最近泰勒写了一部很好的书，名《中世紀思想》。这部书里旣有同情，也有批評，而且它是以对于原始材料进行不倦研究为依据的。上述的那些著作，尽管具有不同价値，但是它們都局限于某一时代，除了德拉波那部已經陈旧过时的著作以外，我們在那些著作中根本找不出能够概括自古以来欧洲思想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

如果只是看到各个时代所提出的問題是非常复杂难解，那么，看来人們对要想写逐代的学术思想概况的任何企图似乎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够摆脫叙述历史的传統方法，对和人类特定的学术遺产同时产生的那些重要事件进行有条理的叙述，不去专門留心专业研究家或学者的思想态度和知識范围，而只去留心一般学术思想界的心情和知識范围、他們对于各种大問題的见解：他們的推理方法、批評能力、见解、以及他們始終所信服的关于神的或关于人的原始材料、他們的知識范围，他們前后的无知程度，那么，要叙述逐代的学术思想的概况，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叙述的时候，当然应該特別强調获得和传播知識的方式（或那些曾被人誤以为是知識的事物）以及利用知識来促进福利，改善世界人类的今天和将来的生活状况。

二

如果我們要想写一部思想通史，那我們必須要注意那些过去沒有能影响萊克和德拉波的重大发现。我們可以肯定：如果人們要追溯人类的心理，那么，人們会发现人类的心理和动物的心理是混杂在一起的，因而人們若有志研究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动物心理

学和比較心理学，就能大大弄明白人类思想的某些方式。这并不是說我們有任何理由可以假設：动物能够运用狭义上的理智。我只是說，在某些地方，高級动物学习的方法，同我們人类的学习方法是相像的。无論如何，研究动物的心理，要比研究别的事物更能弄明白人类心理的主要特点。某些高級动物，特别是类人猿，它們是很能接受教育的，而且它們身上是体现着一种可以不凭理智进行学习的能力。这种能力，不用理智而取得知識，不但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而且人类要比动物强大得多。人类文化的眞正的本质与文化的传布方法，以及人类理智同猿类心理活动过程的区别，也只有研究动物心理学，才能把它們弄明白。人們现在正在苦心研究这一門新兴科学，这在美国尤为显著。在上一章所述及的另一門新兴科学社会心理学，将来必然会帮助我們弄明白人类相互依賴的本质和程度。总而言之，我們人类不但还保留着动物的心理，而且还保留着为人类学研究所发现的与那种原始人所共有的原始的推理方式。正如同在某些危急的时候，我們的原人思想对我們提供的帮助那样，我們的原始的推理方式，如果还沒有为日积月累的知識所淹沒，如果还沒有受人为开展的批評所压制，那么，它們就总是要流露出来。

若要逐步弄清楚几千年以来人类心理发展过程，那么，我們只能从古代人类手工的遺迹来加以判断。此外，还可从野蛮人的推理和婴孩思想的逐漸发展做出推断，在未有史料記載以前，我們只好根据古代人类制作物的残留遺迹来判断他們所已具有的知識，我們沒有别的方法来发现我們现在所知道的历史上最古文化——六千年前埃及文化——的基础。

埃及人看来似乎不曾有过希腊人所謂的那种学术生活。他們苦心編制出一套很复杂的死后生存的学說，他們在工艺上有过許

多的发明，而且他們因为要利用尼罗河水——他們借以为生的——涨落的緣故，不得不細心地去观察天象。西欧各国受埃及所賜的益处，毫无疑問地要比我們已能断定的多得多。但是，我們的关于时間之划分为小时、分、秒，以及圓周之划分为三百六十度的方法，都是从巴比仑人和亚述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和其后的西欧人对于研究星占学的热忱，也是从这些古代文明那里得来的。

就我們所能追溯所及，狭义的学术生活，似乎发源于紀元前六七百年住在小亚細亚的希腊人，特别是在米利都城。但是在泰勒斯、阿那克西曼特[①]和其他哲学家的哲学下面还連接着一块广大的基础。当这派哲学家探究着什么是万物的本原，他們提出的这个問題是十分詭辯和虛伪的，它代表着一种科学的抽象玄理。这种玄理只有当思想已是很成熟的时候才能产生。因而自泰勒斯时代以来，为了要維护对于这个科学的野心，哲学家似乎一直开展着殊死的斗争，因为这个野心，經常有遭受陈旧的和原始的思想破坏的威胁，这些思想可以納入实用主义派、神秘主义派和浪漫主义派中去。

爱奥尼亚派[②]哲学家同艾利亚派[③]哲学家，似乎专門在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問題上用心，如"一与多"的問題，"存在与不存在"的問題以及这些概念所提出的种种似非而实是的論点。但使我們感到惊奇的是，我們忽然发现雅典的詭辯派[④]已經具有完备的和成熟的知識生活；在許多地方，即是现代人們也难能同他們相比。不幸他們的著作大半都失传了，或者因为他們許多的理論，如

---

① 古代希腊哲学家（公元前611—547年）。——譯者

② 希腊哲学最初起源于小亚細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地方，最早出现者为泰勒斯派的天然哲学。——譯者

③ 希腊哲学之一派，为艾利亚地方的色諾芬所創，故名。——譯者

④ 也譯为智者，此派起源于紀元前五世紀中叶。——譯者

苏格拉底的理論，沒有写下来，仅是一些談話和口头辯論的东西。从他們所談論的东西所給予我們的种种印象，可以知道大部分的論点是从同他們为敌的柏拉图以及从亚里士多德的引文中得来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智力是如此生气蓬勃，他們理論范围是如此广闊；他們对哲学的洞悉力是如此深邃，以致我們专門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們，容易有这种感觉：觉得自他們生活的时代以后的一切思想史，都只是思想退化的历史。因而我們有必要来追溯欧洲思想史，倒不一定探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深信的和所发现的是什么；但必須要探討在他們活着的时代以及他們以后所普遍盛行着的是他們那些独特思想。他們是超乎其他思想家的人，是我們的导师，我們从他們那里取得知識遺产。我們知道：西塞罗[①] 和新学派的怀疑哲学自认为起源于柏拉图；而另一方面，普魯梯努斯[②] 和新柏拉图派[③] 中人的超理性学說和达到忘我境界的学說，也自认为淵源于柏拉图。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說，在近世批評家无論是研究文学的，或是研究哲学的、科学的、政治学的，都会对之表示惊奇和贊賞。同时我們也应該知道他是十三世紀煩瑣哲学家們的偶像；他們都利用亚里士多德錯誤的关于本质原理与最后的原由的理論以及他的站不住脚的干枯三段論法来做他們哲理的根据。

希腊化时期，在亚力山大和其他地方的学者，似乎在某些方面能很有利地继續維护希腊的传統。但是他們所添加进来的知識，

---

① 罗馬哲学家(公元前 106—43 年)。——譯者

② 亚力山大时期的哲学家(205?—270?年)。为新柏拉图派的創始人。——譯者

③ 此派为普魯梯努斯所創。其学說系融合东方玄学与柏拉图学說而成。——譯者

并不很多，他們的主要力量是用于訓詁、注释和文学批評之类的工作，因而对罗馬时代的思想家的吸引力并不很大。亚力山大派的著作大部分久已失传，只有欧儿里德[①]的«儿何学»，和托雷密[②]的«地理»、«天文»、«气象»等著作，被阿拉伯学者保存下来，并到十三世紀重新在西欧发现。

罗馬帝国末期，随着希腊思想凄惨的衰落，出现了一种新思想的热潮，这种新思想对于人类起源和人生活目的的論点，和前人大不相同。近代历史学的一个大发现，就是証明了我們所謂的"中世紀思想"，实在完全是在罗馬帝国末期，日耳曼人还沒有南下瓜分那个奧古斯都大帝国以前，已經完全被創立起来了。因为远在普魯塔克活着的时候，从雅典留下来学术生活的传統已經逐漸改变，导致了一种感情的革命。理智成为叫人怀疑的对象；理智的无能似乎已經得到証实。所以当时的知識阶級中，人往往并不到斯多噶派的恬淡寡欲的情欲抑制中去求自慰，而是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放蕩不羈和巫术的幻想与东方的玄秘主义中去求安慰。希腊主义所固有的純洁和中和，慢慢地让位于对理想的低估和超自然的信仰。普魯梯努斯认为理智生活中所能感到的，只是較卑下的东西。至于最崇高的眞理則是超自然的。若要实现我們的崇高希望，那就不能依賴理智，而只能依靠直觉。

哈那克[③]說得好：新柏拉图主义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崇高的，而且是足以感动人們的，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思想的破产。"藐視理智和科学（由于它們的降格而受人鄙視），終于导致野蛮之风；因为由此造成的結果是粗俗的迷信，而且容易蒙受各种各样的欺騙。

① 亚力山大的儿何学家，約生于公元前300年。著有«儿何原理»。——譯者

② 亚力山大的天文学家及地理学家。紀元后二世紀时人。——譯者

③ 德国十九世紀神学家。著有«信条史»七卷。以下引文系引自該书第一卷，337--338頁。——譯者

而且事实上，野蛮之风，真是继新柏拉图派繁荣时代之后便产生了。广大的群众在迷信中成长起来。基督教会接受了新的柏拉图主义的遺产后就不得不向它靠攏，并且同它调和。正当古代文化破产，堕入野蛮的泥坑时，在这段时期的欧洲史上就出现了某些野蛮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来說，过去的一千年的历史就和不存在一样。尽管那段史实已經模糊不清，但是只要我們仔細深入研究它的本质，那就可以看出古代的世界必然是自然而然地退化到野蛮状态，因为它是已經放弃了这个世界。它不再存有去享用、去支配和如实地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希望。由于另一个新的世界的被人发现，人們便放弃这个旧世界的一切东西。并且人們已不打算再想去弄清楚和理解这个旧世界，就去占有另一个新的世界了。若用将来的新世界的见解来看待事物，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被人看作是荒謬的，却成为智慧的；而那些原来被人看作是聪明的，則倒成为愚蠢的了。"

恰好是在这个时期，历史上的基督教从那些教父的著作里面取得它的教义信条。人們可以想见：最著名教父奥古斯丁曾經受过波斯人摩尼的学説①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誘惑。桑塔亚那說得好："基督教史詩"給新的学术生活提供基础，使它在以感情中心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使它尽可能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紀时雅典的知識，这种新思想虽然能够吸收那些显然体现于柏拉图的学說中的某些理想和玄妙的論点，但是它却不欣賞德謨克里特②以及曾接受柏拉图的机械宇宙观的伊壁鳩魯学派③，也不欣賞亚里士多德的学

① 摩尼(216—273年)波斯人。为摩尼教之始祖。其教义以明暗两神竞爭为主，教人弃暗就明，改过向善。——譯者

② 希腊哲学家(約生于公元前460年)。創立原子說。——譯者

③ 此派哲学为伊壁鳩魯(公元前341—270年)所創，故名。以求快乐为修德之目的。——譯者

說，亚历山大时代的那些科学家——如阿里斯塔斯[1]、希派古斯[2]、阿基米得[3]等人的对于世界知識上的各种貢献。假使这些科学家的研究精神和研究方法，能够得到推广，那么，我們现在的自然科学，也許早就发达起来了。苏格拉底同时代人所过的那种生气蓬勃的学术生活到最后非令人失望不可。因为这种生活是純学术性的；它要想通过純粹学术活动和探討中去研究眞理。它很少去具体地研究使我們感到苦恼的社会問題和經济問題，它不认識我們苦心研究科学的意义，也看不到把研究自然世界（有机世界也好，无机世界也好）所得到的知識应用于实用目的的可能性。

关于这个方面，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經院哲学的复兴，就其精神来說，它是希腊式的。誠然，那时候非常相信权威，而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以前，雅典人是不受它的限制的。托瑪斯·阿奎那所应用的材料和柏拉图不同，但是他同柏拉图之間的連續性，还是十分明显的。

十二世紀末年，欧洲出现了第一批大学。神学这門課是以彼得·龙巴特[4]的《集語》为依据，成为当时有系統的課程。当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經有了不太好的拉丁文譯本，于是旧日所讲授的那种对于早几个世紀留传下来的簡陋的七艺就被讲述希腊思想最卓越的代表的主要著作所替代了。除了法律和医学，十三世紀西欧知識界所研究的科目，还有两种：(一)异常复杂的神学及其一切精微的分派。(二）亚里士多德的邏輯学和他的《伦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动物学》，以及当时教会的注释家所編輯的关

① 公元前二世紀的天文学家。首創地圓及地球公轉自轉学說。——譯者

② 紀元前二世紀的希腊天文学家，始发现春分秋分之理。——譯者

③ 希腊数学家(公元前287—212年)。——譯者

④ 十二世紀的意大利人。——譯者

于自然现象的次要著作。这些經院哲学家将他們自己的观察同阿拉伯哲学家的观察結合起来，这些阿拉伯哲学家已經知道而且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其中最伟大的哲学家是阿弗罗斯[①]。但是阿拉伯入不如“伟大者”亚尔伯特[②]和湯姆斯·阿奎那更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因为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譯本，不是从希腊文譯过来的，而是从叙利亚文譯过来的。所以雷南对于阿弗罗斯的注释，曾經幽默地說：西欧的大学在研究一个希腊哲学家的哲理，曾經花費数百年的功夫研究一种拉丁文的譯本。这个拉丁文譯本是从希伯莱文譯出的，这种希伯莱文的譯文又是从一种阿拉伯人对于阿拉伯文譯本的注释譯出的，而这个譯本又是从一种叙利亚文的譯本譯出的。即使假定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譯本是异常完备的，但是十三世紀的哲学家要想超越所有困难，去理解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腊哲学家，这种可能性恐怕是很少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再兴，不但不能糾正中古时代錯誤的看法，提供知識进步的起点，反而对根本变更思想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障碍。崇拜权威的习惯，不仅沒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探討眞理的精神不仅沒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挫折。

十五世紀时，希腊思想在意大利再次流行了。在西欧方面，自公元500年以来，希腊文几乎消灭了。鲍伊喜斯[③]曾經将希腊人的主要著作譯成拉丁文，想把希腊人的知識留传下来，但是他沒有取得成功。显然，这是因为当时受教育的罗馬人已經不懂希腊文了，因而希腊人的一切著作也就势必要消失。当1396年克里梭罗

---

① 阿拉伯著名哲学家(1126—1198年)。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过許多注解。——譯者

② 經院哲学家(1190—1280年)。——譯者

③ 罗馬学者(470—524年)。——譯者

拉斯[1]在佛罗伦薩地方給好学的人讲希腊文以前，这数百年間几乎很少有人提及希腊人的著作。尽管人們沒有忘記荷馬[2]和柏拉图的名字，但是十二世紀的学者几乎不知道伊契魯斯[3]或苏福格尔[4]，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这些人。十五世紀的人文主义者，专心致力于搜集希腊文学著作的残本和拉丁文学家塔西陀和路克勒底斯[5]的著作。他們将希腊书籍譯成拉丁文，因而将这些古典著作在知識界中流传起来。

但是一般人认为这种对希腊和拉丁著作兴趣的复兴，也就标志着希腊主义复兴，这是錯誤的。十五世紀时，佛罗伦薩的书商委斯巴西恩斯編了各藏书家的书目，从这书目可以看出，当时买书的人毫无鉴别能力。曾經譯过柏拉图的著作的費西努[6]是一个热心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在庇果・伐拉・米兰陶拉[7]看来，犹太的卡巴拉[8]这种学問是蘊藏无穷的知識。总之，正如在十三世紀时亚里士多德不能引起学术革命一样，十五世紀时，柏拉图也不能引起学术革命。除了瓦拉[9]还多少接触过古典著作，因而稍具有批評的能力以外，所謂"新学問"实在不能說它已經走近批評的时代。很难設想十三世紀会出现馬基雅弗利或一个伊拉斯謨斯这样人物。但是人們也很难設想在十六世紀初，究竟有什么微妙的变化能够

---

① 希腊人，生于君士坦丁堡，1415年卒。他在意大利教授希腊著作。——譯者

② 古代希腊最早的詩人，著有《伊里亚特》及《奥德賽》两部史詩。——譯者

③ 希腊悲剧家(公元前525—456年)。——譯者

④ 希腊悲剧家(公元前496—405年)。——譯者

⑤ 罗馬詩人(公元前95—51年)。——譯者

⑥ 意大利佛罗伦薩人(1433—1499年)。他将柏拉图的学說与基督教合而为一。——譯者

⑦ 意大利人(1463—1494年)。經院哲学家。——譯者

⑧ 犹太教中之玄学，用以解释《經典》中的玄意者。——譯者

⑨ 意大利学者(1406—1457年)。——譯者

产生出这些人物？而且人們也不能随便說：这是因为有了人文主义的緣故。

新教徒的脫离罗馬天主教与思想的变迁并沒有什么关系。新旧教徒往往强调新旧教义的不同，致使我們忘記这两个体系在知識上的一致。实际上它們十分之九是相同的。最初的新教徒同旧教徒一样对于世界的观念，也是贊成教父的整套见解。他們对于历史的看法，对于人类起源，《圣經》及《圣經》中的預表、預言和神迹、天堂和地獄、天使和魔鬼等观念也是相似的。同旧教徒一样，当时的新教徒以为人們若要想得救，那就一定要相信三位一体的神①，而且一定要反对在私下談論理智，反对科学进步所提出的革新。路德和梅兰克松②曾經根据《圣經》反对哥白尼③。梅兰克松曾經热心地校訂了托雷密的《星占学》。路德曾再三尖銳地攻击理智，因为他承认在理智面前，有許多基督教的理論显然是荒誕的。喀尔文④极力主张人类本来沒有道德的能力，宿命論看来就是要麻痹人們一切作为。

新教徒并不比他們的对头——旧教徒更懂得自然；他們同样受魔鬼論和巫术的欺騙。所以宗教改革并不是由于科学的进步；它的成功也并不是由于对于批評精神的信仰。正如吉本所指出的一种玄理——“变质的原理”⑤——的丧失，可以完全由“原罪”、“贖罪”、“信仰”、“恩典”和“宿命”等学說来弥补，这些学說都是新

① 即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灵，三而一、一而三之理。——譯者

② 德意志新教領袖，生于萊茵河之伯拉丁那特。与路德交好。《奥加斯堡証言》即其手笔。——譯者

③ 波兰天文学家（1473—1543年）。首創太阳中心論和天体运行論的学說。——譯者

④ 法国宗教領袖（1509—1564年），創立喀尔文派。——譯者

⑤ 见第3頁注⑤——譯者

教徒从圣保罗的书札中引取来的。所以从知識观点来看，早期的新教主义还是中古时代宗教史的一个方面。

三

到了十六世紀末，哲学家蒙坦[①]很能表示出一种眞正希腊人的风格，这就使人們明了所謂"文艺复兴"时代的缺点和失望。他虽然沒有升到柏拉图理論那样玄妙的高度，但是他毕竟能够完全摆脫教条和权威，而且他的結論很具有推测性和人道精神。

到十七世紀初年已經出现了思想革命的开端，它使我們摆脫了希腊思想的范围。当时有一个人把这种变迁說得特别明白，那就是培根。他在«論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两书里，很尖銳地指出学术进步的障碍以及克服这种障碍的方法。他对于科学发明以及应用科学去改良人类生活的远景，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讲得透彻，或者至少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要說得有力量。他分析了权威的性质，并指出它的危险。他預见到我們通过实驗科学的研究，我們关于人类和世界的知識有无限增加的可能性。他在他那个理想共和国——新大西島——里建設了一个科学院，給这个机构一个最重要的地位。他还詳細地說明科学院內部的复杂設备。在他看来，知識是动的，而且是进步的。在他的著作中，他第一次明白地提出了有关我們近世人类进步的观念，他虽自己并沒有对于自然科学做出什么重大貢献，而且他于当时的科学家如伽利略[②]、哈威[③]等人的貢献，也不加认識。他甚至不贊成哥白尼太阳系的学說，而且有时也表露出对权威的崇拜。但是所有这些都說明人們

① 法国哲学家(1533—1592年)。著有书札与論文。——譯者

② 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1564—1642年)。——譯者

③ 英国生理学家(1575—1657年)。发明血液循环之理論。——譯者

的用意无論怎样好，但要驟然打破旧习惯，那实在是很困难的。

笛卡儿[1] 在反对崇拜古人方面，比培根更进一步。人所周知，他认为假使人們遵循他所制定的那种研究真理的方法，人們就能重新創建一套完整的知識。他的《方法論》那部书，基本上就是一篇摆脫古代和中世紀思想方法和中古的治学态度的宣言。同培根和伽利略一样，他敢于用自己的国語写出最精深的思想，从而承认知識阶級并不局限于那些懂得拉丁文的人。

笛卡儿的扫除旧思想建立新体系的計划，无疑是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新紀元；但是如同人們所早已預料到的，当他再去充实他虛空的心思时，他所添入的观念仍然主要地是那些旧观念。他无意識地只是找出一种新的借口来重新安插进許多旧思想。同培根的研究真理方法不能使他摆脫旧日的謬誤一样，当笛卡儿急于要証明上帝存在的时候，他就露出一种很强烈的保守趋向。尽管如此，他和培根虽然未能将迷信偶象的旧习完全鏟除，但是却已經把它打伤。而且我們现今知識空前的进步，以及关于人类和它的环境的論据空前增加，这不能不主要归功于培根和笛卡儿两人所提倡的新的治学态度。

在十七世紀西欧出现了大胆的批評精神，这种精神自从罗馬末年怀疑論派消逝以后就沒有再现过。这在对于被敎会支持的事情上，尤为显著。洛克[2] 等人发展了信敎自由的理論，神迹这样东西便成为一个极大的障碍；斯宾諾莎[3] 梗概地制訂一套深刻批評《旧約全书》的方法。培尔[4] 对于宗敎英雄的历史如大卫[5] 和奥古

① 法国哲学家(1596—1650年)。著有《方法談》等书。——譯者

② 英国哲学家(1632—1704年)。——譯者

③ 荷兰哲学家(1632—1677年)。著有《伦理学》等书。——譯者

④ 法国怀疑派哲学家(1647—1706年)。——譯者

⑤ 公元前十一世紀以色列国王。相传为著作《旧約全书》贊美詩之人。——譯者

斯丁等人——进行了无情的审查。到了十七世紀末期，布伦特[1]和柏奈特[2]給《創世記》前边几章写下引人发笑的注解。舍伯利的黑柏特[3]在他的《古代信徒的宗教》一书中，曾很早地对宗教进行比較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他反对上帝要使大部分的人类永入地獄的观念。牛頓証明：地球上运动法則可以用之于整个宇宙。这种学說給人的印象要比哥白尼学說远为深刻；而且十八世紀的自然神論者始終是把不可动移的法則当作上帝来加以頌揚。

近代天文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数学等科学基础都是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前就建立起来。那时，关于这些科学知識的范围和正确性已經大大超过古代希腊人和罗馬人的水平。从前建立在《圣經》和古典著作基础上的迷信和巫术最后衰落了、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自由批評的精神和对实驗科学及其应用的信仰——这一切都不断增加进步观念的力量和削弱对过去权威的信仰——这給以后一系列新的事业創立了必要的前提。

四

从以上所叙述的从古代到十八世紀中叶思想史的梗概，我們可以对现代思想的主要特点得出某些結論。即使是那些最醉心于希腊思想的人們，也不能不承认现代思想。毫无疑問，同古代相比，是含有許多新的因素。沒有人会怀疑：如火車头、縫級机、蒸气打谷机、电話、电灯等这类东西，都是古代所沒有的，但是許多有高度文艺修养的人們，却仍旧认为我們现在的艺术和文学，恐怕不见得能够超过希腊人，因而他們认为所有各种知識的活动，都已被希腊

① 英国人(1654—1693年)。——譯者

② 英国宗教史家(1643—1715年)。——譯者

③ 英国人(1583—1648年)。——譯者

人发明尽了；所有我們种种根本的科学发明，也差不多被他們預知了，而且他們的知識生活的理想，虽不能比现在崇高，但是至少总能同现在的相等。

我以为这种怀疑是由于人們看不到我們现代思想里所蘊藏的、具有根本性的新特点所造成的結果。现代思想至少有五个显而易见的新特点。其中两个特点，我們在上面已經談过了：（一）实驗科学主要是近代的产物，即用器械去細致观察自然现象，再用实驗去証实它們。希腊人沒有望远鏡、显微鏡、寒暑表，也沒有分光鏡；他們的知識至多不过是一种粗率观察的結果，而且有承认权威的趋向。經院哲学派学者們也許要問：既然亚里士多德曾經說过重物体下落要比輕物体快，那么，我們还有必要去亲身观察么？（二）我們近代由于新知識的发见和人类生活状况的改善而产生的进步观念，这显然为希腊人和罗馬人所沒有的。

到了十九世紀人类思想中又增添了三种因素：

（三）我們不知不觉地对平常人有了尊重，有了了解。我們关心他們的福利，願意容許他們去参政。所有这一切就成为一种所謂民主精神。只要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还存在一天，那么，民主的精神就不可能产生。正是由于对于平常人民有了理解，我們的那些为希腊人所沒有梦想到的近代社会科学才会发展起来，而且那些旧学問，例如心理学和伦理学，才会社会化。經济学产生于十八世紀，到了十九世紀，在与人类学大规模发展的同时，比較宗教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也有很大的发展。

（四）大力推动着我們去掌握这种社会观点的趋向是一种新的因素，这就是工业革命及其伴随而来的种种情况，即所謂产业革命。所謂产业革命是指有了机器和工厂制度之后，我們的經济生产和經济組織的方法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乍看起来，这些事情和学

术生活好像相去很远。試問新的紡織方法和更有效率的做鞋的方法，为什么竟会具体地影响我們整个的世界观呢？这是因为产业革命提供了两种出乎意外的可能性：一种是改革社会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促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这是近代思想中两种使人最为关注的事情。正如欧文[1]所指出的，由于有了机器，我們的生产能力提高了，正好像世界上大大增加了許多不衣不食而劳动的工人一样。假使在一个具有二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近代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可以等于从前二十万工人的工作量的話，那么，每一个工人的必需品和生活福利事业就平均需要九个人去帮助他。在一个平常人看来，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的結果是令人失望的。由于这种种原因（这里不能詳述），那些帮助他的人对他并沒有好处。尽管如此，經济革命为改革社会提供了可能性，这对于人类思想来說，却是最令人感到喜悦的問題。

再则，我們近代城市的发展要归功于产业革命；而城市生活同学术的变迁总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有理由去假定：城市的巨大发展一定会最后大大影响我們的思想。伴随这些經济变化而来的，就是世界商业的发达以及交通工具发揮高度的效能，这都使得全球人类团結在一种竞爭和合作的精神之中。恐怕无需許多年，全世界的人类都能讀能写，而且通过交通工具，能够了解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这种奇异的情状提供了人类四海一家的无限可能性。沒有几年以前，在一次国际邮政会議上，我記得曾有人提議要将在地球上任何两个地点之間的邮資一律减为二分美金。这个建議曾得到埃及、美国和新西兰的贊同。这个提議及其拥护者，一面代表最古的文化，一面代表在地球另一方的最新的文化。这足以使我

[1]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771—1858年）。——譯者

們消除这种思想，即认为我們思想的范围只能以希腊人的思想范围为限。

（五）除了上面所說的各种趋向以外，还有近代进化的观点。这个发见通称为进化論。它认为所有一切东西都是慢慢产生的，而且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从另一个东西产生出来的。这个学說要比任何其他新的思想更有力于推翻欧洲在上古和中古时期盛行的思想方法。杜威[①]教授曾經說过，达尔文将他的书称为«物种起源»，就体现了对旧学說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思想革命，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这个学說的全部意义，迄今以前几乎沒有人明白。希腊思想家对世界的发展，虽然并不是絕对无知，但是他們对于地球和人类的历史，却知道得很少，或者一点也不知道。一般来說，他們是建立了固定物种信念，即固定不变的物种的信念。这种信念还得到中古时代基督思想家的贊助。既然人們相信固定的和最后的物种是超群的这个学說，那么，人們就自然会把演变和来源当作是一种缺陷的和非现实的迹象。杜威还說：«物种起源»攻击了絕对永恒的那只方舟，而且把前人认为是固定的、完美的形式看成是发生的和发展的。因而就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終究必然要变更知識的邏輯，从而变更对伦理、政治和宗教的研究。至于柏拉图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的“精理”、基督教关于“創世”和“永久的眞理”的信条，都因此一扫而空了。只有当人类的思想有意識地对不变的、最后的和超群的东西都研究完了，然后才能去探討将来可能发生和可能变化的前人沒到过的荒境。由于人类的思想在从事这种新的冒险，他的兴味就必然从变化的內涵精义轉移到变化如何对目的有貢献或破坏的問題；从那种已經形成固定不变事物

---

①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1859—1952)。——譯者

的知識轉移到正在形成事物的知識；从善的最終目的轉移到直接增进公道和幸福。当现状管理得明智得法时便可产生这些东西；当现状管理得不明智得法时，則会破坏或抛弃这些东西。

这种“进化”的思想方法是我們所处的现代动力时代必然的結果。即使古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沒有給人們說明现在的动植物是由古代物种发展来的，但希腊人和中古时代的哲学家的思想則总要在科学知識全面进步和产业革命面前让位。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进化順序的实例；但是即使沒有这些，从前那种以固定物种和要素为基础的哲学，同依賴亚里士多德的理論，把它看做是一种追求眞理的好方法的哲学是注定要破产的。因而有机进化学說的发现，实在是哲学革命的結晶，而幷不是哲学革命的开始。

如上所述，在材料的积累和用以建立思想的材料的正确性方面，在研究和解释这些材料所用的批評和历史的方法方面，在反对阻碍知識进步的荒謬的哲学假設和空洞的相反的理論，在利用知識去增进人类的幸福方面，都是近代人的思想，岂不是现代远远超过希腊人么？确实，亚力山大时代希腊哲学家从阿里斯塔卡那里懂得了地球有自轉和环繞太阳公轉的道理，幷从阿基米得和希罗[①]那里，获得了重要器械的图样，而且他們还知道伊璧鳩魯派所主张的人类漸进的学說；但是他們都不能够懂得这些思想的重要性。正如杜威所說的，他們立誓要专門研究不变的、最后的和超群的东西，所以他們的思想总有一个最后的止境。至于我們的思想則似乎沒有止境的。我們沒有理由可以說我們所做的已远远超过最初的发现和最簡陋的知識应用。我們充滿希望的研究的前景似乎是

① 古代希腊数学家（公元后二世紀初生于亚力山大）。以試驗凝結空气著名，幷預见蒸气压力的道理。——譯者

无穷的；新的知識的影响似乎也是无法估量的。

我們对事物思想的范围要比前人广闊得多；我們知道眞理不但是像古代希腊一个重要学派已經看出的那样，它是相对的；而且这个相对性是以我們知識的經常增加为条件的。西塞罗宣称：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哲学家們还沒有发见过的观点；因此聰明人应該接受当时在他看来最合理的意见。西塞罗的这种怀疑态度固然不无可取，但是我們现在必需說一說我們的情况。我們的經过愼重思考出来的意见是建立在人类和人类环境的事实上面的，随着我們对于这些事实的知識不断增加，我們的意见必然会不断改变。我們要在希腊人所发现的事物所固有的相对性上，还要添加能动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是科学知識飞速进步的結果；因而，这就必然会使我們一切的結論都是暫时性的結論。

在人类从事有意識的社会改革事业的过程中，思想史似乎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的变化一定要配合着感情的变化，而且它是取决于学术上的指导。思想史这样东西是一种消除成见和打破保守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它不但通过对现在問題产生的經过进行說明来使我們明确我們的义务和責任；它并且还可以促进人类的学术自由，这是进步的根本条件。

第五章　普通人应該具有的历史知識

一

假使有人問历史家，近代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是什么？他可以回答說：近世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們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識和兴趣。我們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願，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們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以上这几句話的正确性，我們不能在此地加以說明，而且也不必再加以說明。因为我們都承认这个眞理了。我們现在应該研究的，就是对于那一大批将要过早地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的青年男女們应該用什么方法去教育他們。但是教育这件事，从来就不十分注意做普通事的普通人。因为从前以为受教育的人們，一定都是有閑的、不必自己去謀生的人們。

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希腊人。他們建立了一个传統，把教育看成是“自由的”，是以“自由艺术”为基础的。所謂“自由艺术”就是对于那班有奴僕侍候的而且有余暇的自由人而設的那些学科和訓练。假使一种特别的研究、带有一些实用的意味，它就失去它的自由性了：因为这种特别研究、只有奴隶才配去做。这种教育的观念、事实上一时很不容易清除。因为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我們并不十分觉得社会上有什么变化。希腊人并沒有和我們一样的民主精神，也沒有如我們所了解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生活上的应

用。奴隶制度早已消灭了；古代奴隶所担任的职务、已經經过了一种革命了、已經如此的复杂了、而且已經可以利用科学发现的进步去发展它了；因此近世的工业和古代簡单的手艺已經大不相同。现代的工业是非常有趣味的，而且非常被重视的。我們沒有权利可以和希腊人一样，将工业放在教育范围以外。我們沒有理由可以继續保持那种偏见，去反对有实用的科学。我們不应該再被传統的观念所局限，认为"自由的"和"有用的"应該分开。在今天，我們正应該大胆地、毫无保留地，立刻将我們的教育和现在大多数在公立学校讀书的学生們的实际生活同他們将来所要担負的任务，密切地結合起来。

根据存在我的心中的上述信念，我想要說明历史学在将要于毕业后即到工厂中做工謀生的青年男女們的教育中的地位。当我最初开始教授历史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我实在不十分明白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这主要地是因为当时我沒有十分明了人类过去对于我們的意义。后来我慢慢的觉得我們的知識和思想完全是依賴过去的；而且只有过去才可以解释我們自己的现状和我們的事业。历史是我們对过去的知識。我們要追問历史，就像我們要回忆自己个人的行为和經驗一样。不过我們对自己过去的回忆是常常随着我們的态度和成见起着变化的。我們往往調整我們的回忆来适应我們当前的需要和希望，而且还往往利用它来分析我們现在的問題。历史也是如此，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經常变化的。各时代的人都有权利去从人类历史里面选出和当时特別有关系的事实。所以馬特林克① 曾經指出："随着我們知識的增加，那些看起来好像刻在石碑上或銅器上的，永远不变的历史事实，一定

① 比利时著名文学家(1862—1949年)。——譯者

要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一定可以复活起来，跳入运动之中，給我們提供一种較宏远而且具有胆量的意见”。

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讀者特别注意。因为现在普通所謂教科书、很少是适合于我們的目的的，所以工业学校里应該采用一种什么历史教本，我实在沒有具体主张。因为历史这門学科，我們沒有像算学一样的那种明确的組成部分。虽然普通历史学家編訂历史教科书的时候，以为他們已經将各种最重要的事实都包括在內，好像化学家或地质学家編他們那种自然科学教科书一样。但是历史学具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历史学所研究的是异常复杂的东西，不像化学那样有一定的现象。我們有許多所謂史学名著，其中专門叙述的往往只是君主和教皇、朝臣和政客、爭夺領土和王位的战爭、君主和国会所制訂的法律。但是这些事实，只是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历史学家可以描写一个罗馬人的农庄，或者一个簡陋的蒸汽机，或者比較圣托瑪斯·阿奎那和路德的神学主张，或者他可以追述哥特式建筑[1]的来源、或者埃及日历[2]的来源、或者描写亨利八世对安娜·宝琳[3]的宠爱，或者說明俾士麦[4]对于社会党人的态度，或者說明新石器时代的手斧。上面所举的几件事，已經可以表明人类的兴趣和事业是如何广大无边，复杂万状。以上的历史

① 哥特式建筑，最初出现于十二世紀。其特点为尖頂，幷以巨窗代替旧日高大黑暗之墻，墻外围以扶壁。故窗虽大而无傾塌的危险。——譯者

② 埃及最初和古代东方其他各国都用阴历。自紀元前4241年后(此外又有其他說法)，始改为阳历，分每年为三百六十五日，每年十二月，每月三十日，岁終五日，庆祝年节。托勒密王朝时代，始有每四年加一日而成閏之法。自紀元前一世紀罗馬大将凱撒采用埃及日历，旧日希腊、罗馬古历遂废。——譯者

③ 安娜·宝琳是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的第二个皇后。她幼时曾服务于法国宫中，归英后充亨利八世的宫女，后亨利废王后凱塞琳，立她为后，后又为亨利处死。——譯者

④ 俾士麦(1815—1898年)，德意志宰相(1871—1890年)。——譯者

事实，有的包括在我們教科书之中，有的并不包括。

試問过去的事实旣然如此的丰富，现在我們有什么保証可以說編写通俗历史課本的人們已經将人类經驗中最重要的最有关系的事件提綱挈領叙述下来，以备教授青年之用？我以为我們到如今还沒有这种保証。从前伏尔泰說过：历史这样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大家同意的故事”。他这句話是对的；因为所有編輯历史教科书的人，当他选择历史事实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地将从前那些陈旧不堪的历史教科书作为标准，而且教师們和公众們也希望如此。

一直到近来，历史学家所选择的綫索还是政治。差不多无論什么东西都分述在君主的朝代下面；各个君主的政策和战爭都是他們最喜欢論述的題目。这种传統已經建立很久了。从希腊、罗馬以来，如修昔底德、波里比烏斯、李維、塔西陀等历史学家就是如此。本来政治史是一种最容易編写的历史；因为政治史所叙述的主要的不是状况，而是事实。所以按照年代順序排列起来，非常容易。而且当时的君主和朝廷比现在的国王和朝廷重要得多。在当时，战爭是被看作一种貴族娛乐。对于当时的讀者，政治史当然是格外重要。有許多主张注重政治史的人，认为这种历史可以做武人政客的指导，以为他們讀了历史，可以知道怎样去統兵打胜仗，或者怎样在內忧外患的风浪中决定国家的大計，轉危为安。

但是，现在我們的兴趣是在继續变化之中，因而我們要求历史所解答的問題也大大改变了。我們近来有許多历史教科书，大胆地删除了許多沿袭已久、但无关重要的事实，而且企图把书中的記載同现在的需要联系起来。但是我以为这种推陈出新的方法还可以再进一步。即是在我們最好的教科书里面，仍旧包括着許多不值得青年男女注意的事实，而忽略了許多最值得叙述的事实。

我再說明一下：假使有一位眼光远大、富于同情心的人，因为

大受现代面临的各种問題的感动——例如像馬特林克一样——并沒有看过现在各种标准的大小历史著作，而对于人类的过去却了解不少；假使他忽然被引入眞正的历史材料里面去，明白了所有人类过去思想同活动的遺迹，不但包括文献上的記載，而且还包括建筑物、图画、服装、工具和装飾品。假使他着手去編一部教科书，要将最有兴味的而且很有关系的事实記載下来，以备将来服务社会的儿童之用。你想他还会包括爱哥斯派泰米战役①、賽米特战爭②、罗馬人围攻努曼梯阿③、尼罗的罪恶、弗雷特雷克·巴巴罗薩④的侵入意大利、亨利八世的六位太太⑤、三十年战爭⑥种种事实么？可以断定，当他想一想数千年来人类的事业、思想、困难和希望，他必然不会把以上所說的，我們普通教科书里所包括的那些事实全包括在內的。

假使写历史的人，不专門注重战爭、围攻和国王的行动，假使他写历史的目的不是想教讀者去做好的軍官和政治家，恐怕他一定要选择一些政治以外的事情作为綫索。他可以說人类对于世界

① 为古希腊雅典同斯巴达战爭中之一海战。紀元前405年，雅典海軍为斯巴达将利山特袭击，复沒于此。——譯者

② 罗馬人同塞姆人战爭凡三次，第一次在公元前343—342年間。第二次在公元前326—304年間，罗馬人大胜。第三次在公元前298—290年間，罗馬人又获大胜。——譯者

③ 古代西班牙半島上之重鎮，罗馬人于紀元前133年将它攻陷，毁其城，从此西班牙半島隶属罗馬。——譯者

④ 中世紀时期德国皇帝(1152—1190年)。当他在位时期，德意志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达到了极盛时代。

⑤ 英王亨利八世(見前)前后凡六娶。1509年娶阿拉貢之凱塞琳，生公主瑪利嫁西班牙王腓力浦二世。1533年与凱塞琳离婚，再娶安娜、宝琳，即女王伊利莎白之生母，于1536被处死刑。是年英王再娶琪恩·賽莫努尔，即英王爱德华六世之生母，1537年卒。至1540年，英王又娶克莱夫斯之安尼，不数月即离婚。是年再娶凱塞琳·霍华德，閱三年又被处死。1543年又娶凱塞琳·派尔，死于英王亨利八世之后。

⑥ 三十年战爭发生于1618—1648年間，西欧主要国家多被卷入。

的知識、人类的义务观念、生产活动、建筑的性质和样式，实在比人类在某时期所制訂的法律和他們所进行的战爭更加有意义。所以要討論在工业教育中历史学科所占的地位，我說过我絕不主张采用那些普通历史大綱。我主张我們应該暫时放弃普通对于历史的庸俗观念，而将这个全部問題，重新加以研究。

我們先要問問我們自己，当我們想到工业学校里面的青年男女的需要、能力、兴趣和他們将来的职业，究竟他們最迫切需要哪些过去事实，以便把他們培养成将来在生活和工作中，成为一些有知識的、有能力的、而且幸福的人物呢？要好好的回答这个問題，我們首先要确定学生們所处的地位和工业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第二，我想提出一些工业学生应該知道的、应該記得的，而且我以为最可以增加他們知識的那些人类过去的事实。我认为这些知識对于他們更为有用。

二

工业教育当然是一种专門教育。它的直接目的是尽快地把十三岁到十六岁的男女儿童培养成为技术工人。关于这种专門教育，我們此地可以不必多說。但是工业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专門訓练一些工作效率很高的技术工人、满足雇佣者的要求、因而可以比沒有受过专門訓练的工人获得較高的工資和較快的升級。现在从事工业生产的这个阶級是一个巨大的阶級。社会显然应該对这个阶級的后备队予以极大注意。这班未来的工人应該知道他們的地位虽低，但对于进行世界的工作却担負着重要的責任。应該明白他們地位的将来；应該对于他們的地位充满无限希望。

我們应該承认，近世工厂里面的状况并不是令人愉快的。在里面工作的人們往往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很忧郁的。从表面看

来，所謂工业就是时时刻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声音嘈杂、污秽不洁的地方、永远重复着一种簡单的工作。正如威可夫所說，每一个工人都在那里做一种特别的工作，但是他始終不知道他的工作的意义。結果他們“对于工作的进步并不感觉是自己的光荣，他們和資本家并沒有共同的利害。他們沒有責任感的快乐、沒有事业心，只是把自己的劳动看成是一种干燥无味的苦工，专望着放汽笛散工和領取工資两件事”。假使他这句話是对的，那么，我們怎能希望工人觉悟他們的劳动具有社会的和工业的价值呢？又怎能希望他們明了他們的責任和設法改良他們自己的状况呢？这就是工业学校的組織者应該好好去解决的問題。

现在我以为他們要想解除工业上现存的流弊，他們不能不求援于历史——不过，我所說的历史并不是普通教科书里面的历史，而是那种足以說明我們的工业生活和它的重要性的过去人类的經驗和成就的各个方面。惟有历史可以說明工人所使用的那种机器的存在。机器这种东西是人类发明的鏈条最后的一环。自从人类发现火石以后，已經經过几千、几万年的工业进步。那几块火石是人类最早的工具，而且或者就是人类机械发明同社会进步的开始。工人可以从历史里面了解现在的分工制度是怎样来的（在这种分工制度中，他是身受其害的），他会知道现在分工制度的巨大社会意义，他会知道何以现在的制造品作得如此之快，卖得如此之賤，生产得如此之多。假使他們知道了这几点，当他們年长的时候，就能想法子去改良自己同工人的地位，不至減少工业的产量，調和經济效率和工人的福利——这本是工业生活里面一个重要的問題。

試举一例，从一个局外人看来，分工制度发生以后，工序已經变得非常簡单，何以沒有一种相对的趋势，使工人对于制造品的整个生产过程，能够有一系列貢献，这岂不是愚笨而且不幸么？单調

无味的工作，可用随时合理交换工作的方法去加以挽救，使工人的全部体力和心力有合理使用的机会。现在工业上所存在的許多流弊，假使工人具有更高的知識、更富于同情、而且更加机警，那么，他們很容易通力合作，来扫除这些流弊，而不至于在經济上产生重大損失。

历史这門学問，不但可以使工人得到一个社会进步和社会的未来的观念，并且可以对他提供某些事物的背景，使他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里把这种知識利用起来，又可以丰富他的想像力，把他的思想扩大到工厂以外。在这里我只能列举几件人类发展史里最重要的事实叙述出来，这事件足以激起青年男女的注意，而且以后可以使他們对人生得到一种新的认識。我們可以先說这个熟知的事实，即世界上能够工作的并不只是人类。人类假使沒有工具，他的工作能力比不过蜘蛛同蜜蜂或黃蜂。有几种鳥类能够为它自己和它的家庭造很复杂的巢。关于人类的祖先，照现存的人类相近的动物看起来，只能用树枝造粗糙的平台。当我們人类刚用后腿走路，前腿当手的时候，他的脑力才經过种种变化，使他們的脑筋超过最高級的类人猿。在这种长期的变化过程中，在人类文化的发达上，有两种极有力量的因素：那就是語言和工具的发明。

最初的人是一个比黃蜂还要粗笨无能的工人，但是他有一种长处，就是假使他很聪明，他不但常常能做他祖先沒有做过的事，并且能够将他們的成就传給他們的子孙。黃蜂工作的技巧是怎样发达起来的，我們还不知道；但是直到如今它始終一样，——同人类的文化不同，既不进步，又不退化；这就是因为这一代的黃蜂并未接受前一代的教育。假使现在有一个嬰孩，絕对的不使他受教育，不使他模仿他周围的人們，那么，他的文化程度恐怕比狒狒高明不了多少。总而言之，人类的一切成就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經过

历代的积累。文化的积累，并用通过广义的教育来传播它，这是人类最大的特点，也就是人类最大的义务。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部分，我們所接受前代遺产的大部分是和我們所用的工具密切地联系着的。我們可以根据人类使用的工具追溯到数千万年前人类的历史。說实在的，最古人类只有通过他們所制造的几块火石才把他們遺迹遺留下来。法国人类学家曾經根据工具的种类和精粗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分出許多时期。照这样看起来，人类的历史就从人类的工业开始的。现在，广义的工业的发达的程度恐怕还可以作为一个試驗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和研究文明变化的綫索。

大約当七千年或一万年以前，欧洲最后冰层退去①之后，就有所謂"新石器时代"②的文化出现，有种种經过磨光的石器、陶器、农业和家畜。这个逐渐使用金属工具以前的时代，好像新旧世界都經历过。这是在埃及、巴比伦文化还沒有发生以前的时代。四百年前欧洲人所看见的美洲土人的状况还是如此；现今在世界的各地还有这种原始文化继續存在。要向儿童們生动地說明人类文化发展那一个中間过程，应該沒有什么困难的。这个时期的文化，从类人猿的眼光看起来是如此复杂；但是从希腊、罗馬人的眼光看起来却是如此簡单。

最近关于古代埃及文化的許多发现証明了：在公元前四千年以前已經有一个超过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那里出现。当时已經有了一种写起来很快、形式很美的文字发达起来，开始用銅制作器皿，而且将它淬制坚固以后，还可以用它制造工具。古代埃及人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辛勤劳动、非常实际的人，对于商业頗有兴趣。所

---

① 最后冰层北退时，約在公元前15000年。——譯者

② 此期約在紀元前7000—2000年間，在此时期，人类开始能制造磨光石作工具，并且发明制陶的技术。——譯者

以在他們所留下来的图画里面，最突出的是司賬的人。埃及的艺术和当时的环境和工业有密切的关系。布莱斯提德[①]曾經說过："埃及人的匙柄上刻有荷花，他們的酒斟在荷花式的深蓝色杯子里；他們臥床的四柱是用象牙刻成牛腿形，他們房屋的天花板上刻有星辰，下面有形像棕树的柱子架着，柱子的上端刻有低垂的树枝。"

至于希腊人的工艺也可以很容易地和他們的美术和人生观联系起来。这样，可以对希腊人的特点要比普通只讲政治和战爭的历史教科书里面所說的更加显著。我們现在还有許多希腊时代留下来的可爱的花瓶、酒杯、大盘、手鐲、耳环、鏡子等物。我們对希腊人的家具以及他們的神庙和剧院便可以形成一个极好的概念。

希腊人虽然比以前我們所知道的人重視美的东西，但是一班有閑阶級对于体力劳动却是非常鄙視。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手工业生产完全由奴隶去做。奴隶阶級常常用战俘来补充，人数很多，足够制造所有的必要商品。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的有名的一章中說：奴隶制度是符合于自然的，因为世界上常常有一大部分人除了做奴隶以外，并无其他用处。虽然他也承认有許多人应該是自由的，因为运气不好，以致淪为奴隶；有許多人是天生的奴隶。高尙科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用，他們的尊严就是为此。只有那些不用手去劳动、有暇用心的人才可以研究高尙科学。辛尼卡[②]竭力反对各种实用的技术是由特殊天才的人所发明的那个观念。他說这都是最下流的人們的粗野設計，而且应該由奴隶去做。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也曾說：好像

---

① 美国著名埃及学家(1865—1935年)，著有《埃及史》、《古代埃及史料汇編》等书。——譯者

② 古代罗馬哲学家，曾任皇帝尼罗的师傅，属于斯多噶学派，于公元65年为尼罗所杀。——譯者

所有可能的而且有用的技术都早已发明了，再也沒有了。所以在古希腊时候，哲学家的意见同奴隶制度的存在联合起来贬低工业的地位。因此，有人用他的手和脑去做有用的东西的时候，就要被人家藐視。越是不做有用的东西，他愈有希望上升到一个人，和一个哲学家的高尙地位。

罗馬人的工业是从希腊传下来的，后来又流传給中古欧洲，在这过程中根据当时社会风尙，生活习慣的变化有了一些改变。到了十二世紀时期，城市兴起了，各种手工业行会同时也发达起来。各行业的师傅們在政治上也逐漸获得較为重要的而且尊貴的地位。普通的手艺人也已經不是奴隶或农奴了。因此，自希腊罗馬以来，对于手艺方面那种輕視的态度于五六百年以前在西欧一带已經消灭了。这种工业恢复的开始，在当时的以职业为姓氏那种习慣上得到了反映。当时人对于下面这种姓字已經不觉得耻辱了，如裁縫、轆轤匠、織工、五金匠、漂布工、桶匠、酿酒匠、箍匠、烛匠、弓矢匠、陶器匠、制角匠、鞣皮匠等。

自十三世紀以来，大家才知道工业有时可以用新的发明去加以改革。例如熔鉄的方法发明以后，鉄器可以鑄造了，不必像从前那样非鍛制不可。炼术士想找出一顆金丹来，能将黃銅变成黃金，或者将黑鉛变成白銀，以使人們长生不老。他們忽然发现了一些意外的物质，因此就奠下近世应用化学的基础。但是在十八世紀以前，在工业上还沒有显著的变化。当路易十五世时期[1]，发明家虽然很多，但是西欧方面的人还是使用旧日簡陋的方法紡紗織布。貨物的运輸还是全靠很迟緩的笨車，从伦敦到罗馬的书信，費时之多还是和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一样。

---

① 法国国王（在位年代 1715—1774 年）。——譯者

但是当时有思想的人已經逐漸发现了两个眞理。第一是那些平常的、普通的、平淡无奇的事物的重要性。第二是我們可以利用我們对于普通事物的知識来提高人类的幸福。上古和中古的思想家对于物质世界都沒有注意。他們远远地离开自然界，如培根所說："专在他們自己的理想和謬见里面翻来复去。"他們不在那个大世界里面去寻求眞理，而专在他們的小脑袋里面去寻求眞理。当有些第一流的人物放弃了眞、美、善和三位一体中彼此的关系这类問題，而去研究牛乳怎样在热的气候里面容易变酸，或者研究何以通过玻璃杯看到的东西特别放大等問題，他們的态度就已經从旧的过渡到新的方面来了。

在十七世紀以前，欧洲人还沒有大规模地用我們近世的研究精神去做細密的观察、实験和計算。从此以后，知識累积的增长和利用知識来增进人类幸福的进步，实在是史无前例的。关于近世无数的重大发明和这些发明对于我們生活所引起的革命变化和我們的进步观念，我們此地即是加以概括的叙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历史事实比从前所謂正統的历史书中所記載的君主、武功、条約、国会的討論和立法更加具有吸引力和重大意义了。

并且，如果我們将这些事实清楚地表示出来，那么，关于蒸汽机所引起的巨大变化一定可以激起青年的兴味，因为机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比自古以来所有君主和国会的一些命令更加重大得多。1704年，英国人紐康門[①]发明了一种蒸汽机，用来抽水很笨重，效力不大，人們对它并未抱着很大希望。但是后来成为世界史上一个最大的革命力量。使用这个蒸汽机抽水，工人們能够控制矿坑中的水，使它不再成为采取煤和鉄的障碍。有了鉄才可以造新机

① 英国著名发明家(1663—1729年)。——譯者

器；有了煤才可以运轉新机器。既然有了煤、鉄和蒸汽，所以无論新的或旧的产品都可以空前地增加。而且既然有了煤、鉄和蒸汽，就可以把各种物品輸送到世界各地去。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工厂出现了，以工厂为中心的城市兴起了。于是人类的工具重新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和标志。近一百五十年来的变化，比过去五千年来的变化还要巨大。正如过去人类用了一根木棍同一块火石作工具，人类就开始了知識的发达；近期有了蒸汽机，于是人类的活动、利益和社会及道德問題就开始扩大起来，不知何日才达止境。

正如我們所深刻而悲惨地感觉到的，工业革命虽然增加了我們的幸福，扩大了我們的知識，因为交通方便的緣故，使我們世界各地更加容易到达，彼此接近，但是工厂里面工人的情况恐怕比希腊、罗馬的奴隶更加恶劣。不过，我們不能过分地希望西欧一方面产出一种物质状况上的空前变化，另一方面又要免除了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流弊。长时間的劳累，单調无味的工作，重复那些因分工制度而带来的瑣碎工序，这种分工制度虽然提高了效率，但是降低了兴趣。再加以微少的而且不稳定的工資和种种联带而来的恶劣状况，这都是现代工业上的严重缺点。

对于这些缺点，以下的情况使我們有迅速改良的希望，那就是我們现在已經有了一种社会公平的观念，即对于經济和社会措施的更加重視和对民主教育的热心。中古时代那种沒有思想的慈善事业到现在已經成为一种有組織的社会事业，这种事业是由人类的同情和科学的研究結合起来的产物。假使机器发明产生了一种新的奴隶制度，那么，机器发明也能产生一种消毒品。因为有机器的发明，对人类的貧困——即无衣无食无住所——有完全废除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人类拥有足够的蒸汽、电气等等能供給人类生活上的需要。如果加以适当的分配，就不会有人还缺乏日用必需品。

更加重要的是和工业革命同时产生的尊重劳动的看法，这是亚里士多德所不明白的。托尔斯泰[①]这班人不想有一种脱离劳动的一种完全无缺的生活，反想将劳动同余暇結合起来成为一种快乐的理想生活。生产的劳动，如果在适当的状况下，有計划地去进行，而且工作的期限要适合于工人的体力同其他生活上的責任，那对于身心性格都会产生最好的結果。我們虽然还沒有达到这个快乐的地步，至少我們再不会藐視劳动，我們也不以为体力劳动是耻辱的。

我們现在再研究以上所說种种問題和工业教育的关系。工业教育本身就是我們以上所追溯的长期历史过程的最近产物。据我看来，我們上面所述的那些事实，就是我們急需使工业学生知道的事实。这种教育可以使他們具有一种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不但可以使他們成为最好的工人，而且可以使他們对于他們的工作有个明智的理解，使他們协力帮助清除他們所遭受的那些工业上的流弊。怎么样能够将上面所述的种种的历史的研究很容易地、永久地而且很自然地印入学生的头脑之中呢？这种研究不但可以滿足接受工业教育的学生們的特殊需要，而且可以提供一种最好的、唯一的方法去扩大他們的眼界，提高他們的道德知識水平和对于进步的热心，这种热心只有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才能产生。

① 俄国著名文学家(1829—1920年)。其名著有《安娜·卡列尼娜》和《战爭与和平》。——譯者

第六章 “罗馬的灭亡”

一

历史学家写书时往往对于时代的起点和終点，感觉困难。为了他自己和讀者的便利起见，他常将历史分为几个时期。旣然选定了起点同終点以后，他就极力地說明分期的标准很有理由。他知道得很清楚，假使他是一个近代史家，尤应知道他这种分期的方法，实在勉强得很。他一般地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为了要替分期的方法进行辯护，因此他对历史分期的不科学性就諱莫如深。这就是普通历史学家的正规办法，他要把历史发展的連續性和在叙述上的条理性調和起来，因而他就隐瞞了他对历史的眞实性的冒犯。我們对于旧日的历史学家可以加以原諒，因为“历史的連續性”这个观念，本来是近代的产物——十九世紀的产物。从前历史学家都以为英雄人物，著名战爭或上帝的干預，常常驟然来打断人类事业的进展。这种观念，只有当历史学家专門注意过去特殊的事件才能維持。但是一旦历史学家要来注意全部关系人类利害的事情和对人类具有永久性的事业，而不是去注意那些偶然的和过渡性的事件，他就会看出人类一般的变化一定是迟緩的，——非常迟緩的。

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經說过，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所有高等文明体系都是异常复杂的。假使我們想到五世紀十世紀或十八世紀时候全部人类的兴趣，就会知道一个人、一次战爭、或者一个条約断不能立刻将当时宗教的、知識的、美术的、科学的、語言文字的、工业的、商业的、法律的、軍事的、政治的、思想和习慣統統改

变。一次战爭，或者一个条約也許可以改换一个国家的君主；一种很厉害的瘟疫也許可以影响他們的經济状况；但是在历史上看起来，沒有一次驟然的变化改变了大部分人类的习惯、风俗和制度。

历史連續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的惰性和缺乏思想。这两种心理的特点很可以說明为什么虽然在一个范围里面发生了一个驟然的变化，但是有許多旧的东西仍旧遺留到新的时代。最显著的事例，就是法国虽然經过一次大革命，但是許多十八世紀法国政治的特点仍旧存在于现在法国政治生活里面。

从上面几件事实看来，我們对于传統的"历史分期"方法，不能不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方法，以前的人虽然贊成，但是到了现在，实在沒有可以辯护的理由。

无疑地，我們自小就养成这个观念，以为罗馬灭亡以后，中古时代就开始了。經过一个长期的黑暗，人們发现了希腊、罗馬人的著作，人类好像从冬蟄中醒来。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它为引起近世精神觉醒作了准备。至少新教徒是这样相信的。继起的危机就是引起大众注意的法国革命。我們普通所用的教科书和高等学校的历史課程还是根据这种分期的方法。

每个有思想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这种分期方法的缺点，他很知道要断定中古时代起源的困难。特别是近世史应起于何时，那就更难确定。至于"革命"，我們好像还是在革命之中。但是普通历史学家往往不知道这种分期所引起的恶果。上面所指的那些"时期"，不但需要加以批評，而且表现对于过去一个完全錯誤的看法。

近世历史学家慢慢地知道，全部西欧的历史的分期以中古初期和中古末期間那个分界为最明显。当十二世紀时，欧洲人对学术兴趣的觉醒推动了大学的建立，罗馬法的复兴，教会法的編訂，基督教会初期著名神父神学理論的整理，此外还有城市生活的发

达，商业的扩充，哥特式建筑的兴盛，和优美的方言文学的发达。

到了十三世紀的初期，欧洲学术界的注意慢慢地集中到古代最大的哲学家①。他的著作重新传播于西欧学者的面前。所謂文艺复兴，它的成就实在不能同十二世紀及十三世紀的成就相比較。虽然当十四、十五世紀的时候，在意大利諸城市发生了一种和昔日大不相同的有趣味的文化和惊人的美术。但是，这种文化和美术的出现使我們对于那个时期的变化估計过高。当时的貢献对于一般的变化的影响并不太大。照我們要建設历史继續原理的人看起来，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家、哲学家，甚至美术家，都表示出在学术上一种非常保守的精神。他們很少能够超出古代的迷信，对于世界知識貢献很少，而且常常受到新柏拉图派神秘主义的迷惑，如費西努、皮科② 和魯克林③ 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前边曾經說过，我們可以讀古人的著作，但是我們的心理态度，不一定就因此变成希腊的。我們可以断言，当我們对于中世紀时代的知識和我們对于自己时代的认識提高之后，我們就会感觉到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期，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点，就逐漸消逝了。但是现在許多历史学家还把文艺复兴时代看作一种光明的精神照耀着欧洲，感动了这个著作家和那个画家和建筑家，而其余的人則留在中古黑暗里面。

对于要断定近代史开端的人有三个历史事件可以拿来作为很好的起点：第一是 1453 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第二是 1492 年新大陆的发现，第三是 1517 年路德张貼他那篇攻击贖罪券的論綱。但是这三个事件，实在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重要。有人以

① 指亚里士多德。——譯者

②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1433—1499 年)。——譯者

③ 德国著名人文主义学者(1455—1522 年)。精通希腊文及希伯来文。——譯者

为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件事逼迫着希腊学者逃到西欧去教授希腊文，以資糊口，因此恢复了古代学問的知識，并引起文化的提高。这种看法是經不起我們細加研究的。希腊学問的复兴，在君士坦丁堡沒有陷落以前五十年，在意大利方面已經进行了。当时奧里斯帕和費里托[①]这班人已經从拜占庭带了許多希腊手写本书籍，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已經在那里辛勤地进行翻譯。虽然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有少数希腊学者逃到西欧去，但是我們看不出西欧方面人文主义的进展因此就受了什么影响。所以从学术的和文学的观点看来，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件事实并沒有什么重要意义。

至于美洲的发现，我們要知道美洲并非眞正发见于1492年，因为哥仑布直到死的时候，还以为他是由水路到达了印度。一直到1610年，亨利·哈德森[②]还希望要从哈德森河达到太平洋。按照现代我們的看法，一个新半球的发现一定会引起眼界的扩大。但是哥仑布的航行的重要性，在欧洲人心目中，认識得很慢，以致在数十年間并未引起重大影响。

至于路德关于懺悔的意义那篇經院哲学式的論綱标志着世界史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虽然在此以后十五年至二十年間，北欧方面有几个国家脫离了罗馬教会，并且反对罗馬教皇的統治，但是路德那篇論綱虽不能說他不是这种状况的一个推动力量，但是对瑞士和英、法諸国并沒有发生什么直接的影响。

二

在普通历史教科书同标准的历史著作中，历史的分界最显著

---

① 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1398—1481年）。曾在君士坦丁堡学习，精通希腊文。——譯者

② 英国著名航海家与探险家，于十七世紀初年在北美探险，約死于1611年。——譯者

的莫过于"罗馬灭亡"这个事件了。大家都认为"罗馬灭亡"这件事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紀元。日耳曼民族侵入了罗馬帝国、自奧古斯都开始的罗馬帝国的皇統于公元476年断絕了。普通人以为西罗馬帝国的瓦解是欧洲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的开始。这种意见虽很自然，但却是很錯誤的。日耳曼民族的侵入虽然引起許多重大的結果，但是这些結果都是逐漸发生的。实在說起来，在中世紀初年，欧洲方面并沒有什么新奇的变化。失去的旧东西虽然很多，增加新东西的却是很少。許多中世紀时代的特点——如僧侣、圣人和神迹；寓言与象征；七艺；罗馬基督教会和它的特权以及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等等——在410年阿拉列克攻陷罗馬以前已經很发达了。所以"罗馬灭亡"这件事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极为肤浅的分界，仔細研究起来，就要失去以前历史学家所給予的那些重要性。历史的連續性比当时的变革显著得多。下面所述的就是公元五世紀时期的詳細情形，可以表明传統历史分期方法的危险性。

当公元398年狄奥多西大帝死去时，罗馬帝国还是統一的。当时帝国有一种很复杂的官僚机构担負統治責任。我們如今还有一张当时的职官表流传下来。百年以后，帝国的西部已处于瓦解状态。当时罗馬帝国里已經有法兰克、阿尔曼尼、伯坎底、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等族的国王統治着大小不等的国家①。

我們要詳細追溯罗馬帝国瓦解的过程已經是不可能了。实在說起来，当时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如此紛歧、如此緩慢，以致即使我們对于五世紀的事实，好像对于十九世紀那样清楚，也不能将当时的革命說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革命本身是曲折的、晦暗的。但是，我們就連最突出的、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还很不明白，对于当时的

① 这些都是日耳曼人在西欧所建立的国家。——譯者

情况也很模糊。过去許多著作家如吉本、霍德金等人竟将当时的許多人物同事实詳詳細細地叙述出来。他們同其他著作家竟对帝国“灭亡”的原因，作出許多解释。我有一个朋友，近来为了好玩，曾經将各种历史教科书里面关于帝国灭亡的原因搜集起来加以統計，居然得了五十个。这些理由当然都是猜想之詞。就連那几个一般承认的理由，如帝国人口的减少，日耳曼族的勇敢善战，与精力的充沛等等，据古朗日[1]說也都是毫无根据的。

本章的目的是：第一，要把关于五世紀的史料性质簡单地研究一下(所有这些資料在美国較大的图书館中，很容易找到)。第二，要說明当时著作家所见到的罗馬帝国瓦解的表面过程。我对于395年所謂罗馬皇帝狄奥多西把帝国分为两部那件事要特别說明一下。再說一說公元410年阿拉列克攻陷罗馬以前的事情。最后再說明公元476年所謂“西罗馬的灭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三

第一，关于此时期的史料，最可信的当然是《狄奥多西法典》和它的补充，即所謂《新法》以及《查士丁尼法典》[2]中所保存的法律条文和政府命令。这几种法典里所載的命令，一部分是頒发于五世紀的。他們很可以說明罗馬帝国的組織和它的积弊；其中并且往往載有官吏的姓名，有时还記載事实。可惜这种命令都采取一种华丽的、讲演式的文风，因此我們要明白它們，不能不費一点功夫。

---

①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1830—1889年)。著有《古代城市》及《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等书。——譯者

② 东罗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他于公元527年命特里鮑尼等人編纂罗馬帝国法典，結果編成《查士丁尼法典》、《法令汇編》、《法学阶梯》及《新律汇編》等书，合称《罗馬民法法典》。——譯者

关于五世紀的历史，当时沒有很好的著作家，像朱理安皇帝的名将阿密尼那斯·馬西里努斯[①]那样能够将四世紀以前的事实記下来。这是一部很好的历史，一直記到378年皇帝瓦連士敗死于阿德里亚堡为止。过了一百五十年的样子，才有一个好著作家普洛科庇烏斯[②]将查士丁尼对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波斯人的战爭記載下来。他的著作至今犹存。在他們之間，我們知道有好几种历史著作，但是完全传下来的，大部分都是研究教会的东西。我們对于阿密尼那斯以后三十年的历史，不能不依賴邹西穆斯[③]。他是罗馬帝国东部的一个官吏(伯爵)，他的著作好像是在五世紀的后半期写成。他的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已經失去了。所以阿拉利克陷落罗馬以前的事情忽然中断了。他痛恨基督教徒，他把当时种种的不幸都归咎于罗馬人抛弃了旧日保护国家的那些神，而信仰基督教。

有几个較好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的残篇流传下来，其中最著名就是福提烏斯。他本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主教，生活在九世紀后半期。他一生的困难很多，但却利用余閑的功夫将他自己的藏书編出一种簡单的提要。所以我們现在至少还有一种当时著作的提綱。例如奥林庇道魯斯[④]所著的历史是从狄奥多西死后說起的，这就是邹西穆斯历史的蓝本。另外有一个提綱的纂輯者，就是很有学問的皇帝君士坦丁·波菲罗吉尼杜斯[⑤]。他曾經下令将所

① 阿密尼那斯·馬西里努斯(約330—390年)。曾著《罗馬史》迄378年皇帝瓦連士战歿。——譯者

② 希腊历史学家，著有《皇帝查士丁尼战史》。公元565年卒。——譯者

③ 希腊人(408—450年)。著有《罗馬皇帝本紀》一书，自奥古斯都起至公元410年止。他把罗馬国势衰微归咎于放弃罗馬人的旧教。——譯者

④ 五世紀希腊历史学家。著有《西部帝国史》，用希腊文写成。——譯者

⑤ 君士坦丁·波菲罗吉尼杜斯，东罗馬帝国皇帝，(即君士坦丁七世，在位年代913—959年)。著有历史及政治的书籍。——譯者

有最好的历史著作中值得保存的材料，都搜集起来，汇为一編，分为五十三卷。这部大书现在已經残缺，其中有两卷关于重要使臣往来的記載是重要的。举一个例：关于五世紀一段最好的历史保存下来了——即普里斯古斯叙述他去拜訪匈奴王阿提拉[1]的一段記載——就是这个热心学問的皇帝的功績。还有一段也是他保存下来的，就是六世紀的时候馬尔丘士所說的奥多瓦卡[2]于476年派使臣到君士坦丁堡那件事。

有几个教会的历史学家自中古以来到现在还是有名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奥罗修斯。他在少年时代曾受到奥古斯丁的鼓励，著了一部世界通史，他的目的就在于攻击深信异端的民族。他說他的宗旨是搜集过去历史上各种天灾人禍——如战爭、疫疾、饥饉、地震、水灾和种种大罪恶——条分縷晰地来說明在基督教沒有传入欧洲以前，当大家还是崇奉异端神道的时候，世界上并不比以后幸福。他那部《七卷反对异端史》最后的十余頁是叙述五世紀最初十八年間的事情。他所說的事实，他以为人人都知道，他的唯一目的是証明敬畏上帝的人一定得到幸福；相信旧神的人就要遇到死亡。所以我們对于他的著作不能过分重視。他的著作的可信程度和今天那些职业传教士的聳人听聞、浮夸浅陋的說教差不多。

关于五世紀的头六十多年間，我們有几个希腊教会历史学家，那就是苏格拉底[3]、苏邹密努斯[4]和狄奥多利[5]等人。他們最注意的是异端、僧侶、神迹这类东西。关于当时的事实反而不十分注

① 匈奴王，公元451年为罗馬联軍击败于沙龙。——譯者

② 本系蛮族，后入罗馬任禁卫軍官，废奥古斯都魯斯，自掌大权。公元493年被东哥特王西奥陶里克刺死。——譯者

③ 四至五世紀东罗馬教会史家。著有教会史，述406—439年間事。——譯者

④ 五世紀东罗馬教会史家，著有《希腊教会史》。——譯者

⑤ 安提阿克教会史家(390—457年)。——譯者

意。对于当时的政治史，叙述得尤其少。

在中古时期的編年史里，虽然編纂的人很喜欢給我們一种历代执政官的名单，而且有好些年代沒有記載，但我們有时也可以搜集到几段很簡单的記載。但是从普罗斯波[①]的著作里面，我們可以得到一种提示，他生在五世紀，他的編年史叙述到454年。至于馬西利那斯在查士丁尼时代所著的历史，蒙森已經把他的残篇搜集在一起。不过这一类的史料异常模糊而且难讀。

还有基督教圣徒的传記，虽不很經常但有时也提到当时的事情。埃努丢斯約在公元505年所作的«帕維亚主教埃庇汉紐斯传»里，就常提到理西美[②]、奥瑞斯提斯[③]、奥多瓦克这班人和当时扰乱的状况。当时的史料如此缺乏，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竭力去利用各种暗示，甚至不能不利用当时人的詩和当时人所作的頌贊。在六世紀初年，有一个克劳底安[④]曾經写了一篇极好的六音步的頌揚斯提利古[⑤]的贊。但是他的論調不但太偏，而且因为他这篇文章原来是一种韵文，所以不能将眞实的事迹叙述出来。我們普通以为阿拉利克从蹂躪希腊归来以后，罗馬政府曾經命他作一个罗馬官吏，这种說法就是从克劳底安的两行詩里得来的。

在五世紀后半期，有一个很有名的著作家，叫做阿波利那利斯·西多尼烏斯[⑥]。他前后贊美过好几个罗馬皇帝，第一个就是他的岳父阿維杜斯。他所提到的事实，沒有克劳底安那样明白可

① 高芦人，生于五世紀，著有編年史。——譯者

② 罗馬蛮族軍官。公元456—472年間統治意大利，曾立皇帝四人。——譯者

③ 班諾尼亚人，是皇帝罗摩罗斯·奥古斯都魯斯之父。后为奥陶瓦卡所杀。——譯者

④ 公元四世紀时期著名希腊紀事詩人。曾著«斯底利克武功頌»。——譯者

⑤ 汪达尔族人，任罗馬軍官。皇帝奥多西死后，他統治罗馬西部。403年在拉維那被刺死。——譯者

⑥ 生于公元430年，卒于487或488年，472年为主教。——譯者

靠，也沒有那样簡明清楚。但是现在仍保存許多西多尼烏斯的信札，讀了一遍，就可以知道五世紀后半期的法兰西虽然有伯坎底人、高芦人和法兰克人，但是有人仍旧可以进行文学的研究和在美丽的农庄中避暑。除了他的信札以外，我們还有教皇利俄一世[1]和埃諾丢斯这班人的书札保存着。

四

我們现在将罗馬帝国分裂这件事研究一下。普通以为罗馬帝国自从公元395年狄奥多西死后，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传給他的大儿子阿尔卡狄烏斯，西部传給他的小儿子荷諾里烏斯。这个观念印入普通讀者的脑中如此之深，教科书里面复述这句話如此之普遍，我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去細加叙述。我所以从两种最通行的教科书里面引出后边两段文字，并不是因为他們比別的課本錯誤还多，实在是因为他們最可以代表那种謬誤的观念。

"自狄奥多西死后，其二子阿尔卡狄烏斯与荷諾里烏斯再度将帝国分为两部。从此罗馬帝国事实上就永远分为东西两部，欧洲历史上遂有东西二帝国之称。东帝国存在了千余年，而西帝国不到一百年就亡了。"

另一位作者，在用大字印的"帝国的最后分裂"的标題下，叙述如下："狄奥多西在位之日是罗馬帝国最后的統一时代。自公元392年至395年，他是唯一的皇帝。他临崩之际，将帝国分給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卡尔狄烏斯及荷諾里烏斯。长子年十八，分得帝国东部；次子年十一，統治帝国西部。这是罗馬帝国最后的分裂——这是大国分离趋势的結果。东西二帝国在历史上的分裂从此开始"。

[1] 公元440—461年間罗馬教皇。——譯者

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其中最严重的錯誤有三点：（1）罗馬帝国并沒有分裂过，它始終是一个国家；（2）狄奧多西并沒有作过罗馬唯一的皇帝；（3）东西二帝国在历史上的分裂并不是从狄奧多西开始。当时人对于阿尔卡狄烏斯和荷諾里烏斯承继他父亲的帝位这件事，并沒有感觉奇怪，因为阿尔卡狄烏斯在他父亲未死以前，已經作过十一年的皇帝；荷諾里烏斯也已經作过三年皇帝。在当时法典里面还保存下許多命令，都是用父子的名义发布的。关于帝国分裂这段事实，說的最詳細的恐怕要算奧罗修斯所著的历史了。他不过說："在罗馬建城后1149年，皇帝阿尔卡狄烏斯（他的儿子狄奧多西二世統治东帝国）和他的弟弟荷諾里烏斯开始共同統治帝国，只是各有各人的都城。"邹西穆斯說的更加明白："皇帝狄奧多西旣分意大利、西班牙、凱尔提卡及利比亚給他的儿子荷諾里烏斯，自己在去君士坦丁堡途中得病而死。"

奧罗修斯所說的当时狀况非常正确，因为他根据当时的习慣和狄奧多西法典以及查士丁尼法典来說明的。从公元161年，瑪尔庫斯·奧列里烏斯皇帝[①] 命維魯斯来协同他統治帝国以后，直到戴克里先皇帝为止，帝国的法律往往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皇帝的名义頒发下来。自从戴克里先以后，数帝并治的局面更加普通；帝国的命令也往往用两个、三个或四个皇帝的名义发布。

罗馬帝国里同时有两三个皇帝进行統治，这件事在我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名詞上的矛盾。但就罗馬人的眼光看起来，并不如此；因为他們自古以来就慣于有两个行政官或保民官統治全国，他們的权力和地位全是一样，不过在責任上稍稍有点区别罢了。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皇帝，他們都是最高統治者。他們之間

① 罗馬皇帝（在位年代，161—180年）。——譯者

的关系和从前那种行政官的关系一样，仍旧用非正式的方法来决定，那就是：儿子当然服从父亲，青年无名的当然附属于年长有名的。

假使我們能够将阿密尼那斯·馬西利努斯所說当时选举皇帝那件事实参考一下，我們就可以明白当时的状况。我們知道皇帝犹里亚努斯[①]于公元 363 年在巴比伦陣亡了，承继他的人約維阿努斯几乎是当选之后就死了。

因为有种种不幸的事情，使两个皇帝忽然在那短时間都死了。当时軍队向皇帝約維阿努斯的尸体——預备送到君士坦丁堡去——举行葬礼以后，就向尼西亚[②]开拔，同那地方帝国的文武官吏研究一种应付危局的方法。当时虽有些人怀有妄想，大家都以为非选一个很有威严的，很有智慧的人来继承大統不可。

当时有一种謠言說：一部分人想提出斯古塔里第一区的保民官埃揆提烏斯来做皇帝，但是当时一班有势力的人們不贊成，认为他太粗野；他們的意思很願意举約維阿努斯的族人詹努利努斯来作皇帝，他本是在伊利古木地方[③]作軍需官。但是大家也反对他，因为他现在距离太远。于是大家一致地选举了天命攸归的瓦楞提尼亚努斯[④]来继承大統，因为他的資格旣好，而且所在又近。他本来是斯古塔里第二区的保民官，曾留任在安西拉地方，原定他应随后登位。当时对于皇帝的选举，既然沒有人反对，所以立刻派人去請他快来即位。中間有十天功夫，罗馬沒有皇帝。

瓦楞提尼亚努斯到达之后，穿上皇帝的袍服，戴上皇冠，大众欢呼他为皇帝。但是他想演說的时候，四围的兵士忽然大声疾呼，

① 罗馬皇帝(在位年代 361—363 年)。——譯者

② 城名，在小亚細亚，为两次宗教大会之集会地，因此著名。——譯者

③ 地名，在今亚德里亚海东岸一带地方，即希腊半島之西部。——譯者

④ 公元 364 年即位，375 年卒，以善战著名。——譯者

要求他立刻推举出第二个皇帝来。瓦楞提尼亚努斯回答說:“你們要选举一个同事来同我共負皇帝的責任,本来有許多很好的理由,我当然沒有疑問。而且我自己是一个庸碌无能的人，对于国家大計，我一人当然担当不了。……我希望运气来帮助我，可以找出一个很聪明的而且极和平的人。”

瓦楞提尼亚努斯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也想到他自己所負皇帝的責任太大，所以决意不再延宕了。他得到大家同意之后——实則沒有人敢反对——就带着他的弟弟瓦連士(364年即位，378年卒)到了城外近郊，宣布他是罗馬的皇帝，代他穿了皇袍，加了冕,两人同坐車子回到城中去,然而事实上他的弟弟好像是他的僕从一样。

在这个时候,罗馬国內战云密布,四边的蛮族都要向他們最近的地区侵入。阿尔曼尼人蹂躏了高芦[①]和拉提亚[②]地方；同时薩瑪提人[③]、揆地人又騷扰班諾尼亚地方[④]。还有庇克特人[⑤]、薩克森人[⑥]、苏格兰人和阿塔古提人也常来进攻不列顛。此外奥斯托利安人同摩尔人[⑦]等蛮族又进击非洲；此外还有哥特强盗常常劫掠色累斯[⑧]一带地方。

冬天过了,两个皇帝和衷共济地——一个是正式选出的,一个是形式上的同僚——經过色累斯到了尼西亚，他們将軍权分而为二。此后再到了色米烏木地方又将政权分而为二。瓦楞提尼亚努

① 古高芦,在意大利北部及法国大部一带之地。——譯者

② 在今瑞士。——譯者

③ 原居亚洲西部,后又移居黑海及东欧一带,与斯拉夫人混合。——譯者

④ 罗馬省名。在今奥地利、匈牙利一带地方。——譯者

⑤ 凱尔特人的一支,居苏格兰。——譯者

⑥ 日耳曼人的一支,其中有一部分自德意志移入英国。——譯者

⑦ 居住在非洲北部阿拉伯种人之总称,自七世紀后,信奉伊斯兰教。——譯者

⑧ 在欧洲东南隅,东濱黑海,南濱爱琴海,北达多瑙河。——譯者

斯前往米兰[1]至于瓦連士則回君士坦丁堡。

不久瓦楞提尼亚努斯正在高芦从事战爭的时候，忽然生了病，当时就有人提出一个官吏名叫魯斯提古斯·茹利安努斯的来承继他作皇帝。但是，同时又有人主张拥戴一个步兵的軍官塞維魯斯。

“但是这些計划都沒有实现，因为当时瓦楞提尼亚努斯的病，經医疗后已經好了；而且他自己知道是死里逃生，所以就想传位給他的儿子格拉齐安努斯[2]。因为儿子快成年了，于是就預备传位的事，軍队也收买好了。格拉齐安努斯到达之后，他父亲为了要大家欢迎他，所以将他带到一个空曠地方，站在一个高台上面，四周围着一班貴族和官吏，牵着他儿子的手，演說一番，将未来的君主介紹給軍队。”

七年之后，瓦楞提尼亚努斯就死了。“当时經过詳細討論之后，議决請他那四岁的儿子——亦名瓦楞提尼亚努斯——来继他作皇帝。这个小孩当时和他的母亲朱斯提娜住在摩罗西搭鎮，离都城有一百多哩。当时各方面对于这个議决一致的贊成，就派他的叔父塞克利去請他即位。不久孩童皇帝果然坐肩輿到都城来了。在他父亲死后第六天，他就宣布为新皇帝。当时有許多人以为这次选举皇帝时未得到他們的同意，格拉齐安努斯一定要发怒的。但是事后的一切忧虑都是不必的，因为他是一个聪明而和气的人，他和新皇帝异常要好，而且很用心地撫养他。”

以上几段引文，很可以說明当时选举皇帝和增加皇帝的方法实在很不正式。我們要注意的是，要知道当时并沒有将帝国分裂为二的企图，皇帝虽然不止一个，但是他們所关心的还是一个統一帝国的共同安宁。

---

① 城名，在今意大利北部。——譯者

② 在位年代，375—383年。——譯者

狄奥多西和他两个儿子統治帝国的时候，情形就是如此。当时并沒有人想分裂帝国；虽然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新罗馬①以来，国都有了两个；但是国家只有一个。虽然有两个上議院，虽然有两个組織完备的皇宫，虽然有許多皇帝，但是罗馬帝国始終是一个統一的国家。凡有新选的皇帝，一定要恳求他的同事承认他。从狄奥多西以后，每个皇帝每年选出一个行政官；所有国內的法律也是由几个皇帝会銜而且同意頒发的。

所以，从习慣上看起来，狄奥多西死后那种分治的办法并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分疆而治只是为了行政便利起见，并沒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并沒有建立一个"西罗馬帝国"，所以根本沒有476年"西罗馬帝国灭亡"这回事。

五

狄奥多西死后，罗馬帝国里有三个最有势力的軍官，他們都是日耳曼人或半日耳曼人——斯提利古是汪达尔人，盖那斯和阿拉利克两人都是哥特人。阿拉利克协助过狄奥多西最后的战爭。要明了这几个人的特殊地位，我們只能研究邹西穆斯所記載的狄奥多西死后几年間他們活动的情形，因为这部书关于此时期的記載最为詳細。我們虽然沒有理由可以断定他所說的种种黑暗的阴謀都是可信的，但是关于当时一般状况是明显的。他的記載很可以改正我們普通对于蛮族同罗馬人种种关系的謬见。

我們要知道，日耳曼人和杂居在帝国以內的各种蛮族——甚至匈奴人——并沒有很明显的界限。只要他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差不多沒有人去过問他是属于那个种族的。狄奥多西以前数百年，罗馬国內的状况同现在美国紐約城的状况差不多。对于外国

① 即君士坦丁堡。——譯者

人并沒有因为他是外国人而加以种种不利，也并不故意地加以种种限制。因此当狄奥多西时代，日耳曼人移居到罗馬帝国里面，正如现今各国人移入美国一样。他們同罗馬公民混杂起来，好像外国人同美国人混杂起来一样，他們急于做一个美国公民。罗馬人对于蛮族亦并沒有什么界限，而且当时的蛮族也很願意为罗馬帝国去攻打他自己的族人，他們并沒有表示出什么民族的感情。我們对于当时下級社会各族間的通婚虽然不十分清楚，但是上层社会的人并不反对异族通婚。我們可举几个例子：狄奥多西的侄女嫁給斯提利古，斯提利古的两个女儿前后嫁給荷諾里烏斯。阿卡尔底烏斯曾經娶过法兰克的酋长班托的女儿攸多克西为后；后来狄奥多西的女儿普拉西底阿又許配給阿拉利克的內弟阿塔勒夫。

邹西穆斯向我們說：狄奥多西大帝即位后，立刻同重要的蛮族領袖妥协起来，异常的优待他們，甚至于請他們来同他宴飲，他被认为是哥特人的朋友。他同他們要好，曾經派阿拉利克和盖納斯做他的将軍，而且将一部分东哥特人迁住在夫利吉亚[①]肥沃的地方。我們在这里应該注意的是，他这种办法实在是遵循着帝国的习慣，并沒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我們要明了当时全部情形，恐怕要以公元410年阿拉利克攻陷罗馬那件事为最好的一个說明。

当时在各蛮族的軍官之間的争权夺利已經有好些年了。他們在当时政治上的地位同现在美国市政里的外国政客差不多。斯提利古、盖那斯和阿拉利克三个人，各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种种活动。狄奥多西死后，阿拉利克馬上就侵入希腊，在那个地方斯提利克曾經稍稍抵制他。他就向北去，在罗馬軍队中得了一个官职。他究竟任什么职务，我們不清楚，因为克劳底安只說阿拉利克是負責管理軍械的。斯提利古很活跃，而且有野心，他打敗拉达盖苏斯和他

① 小亚細亚中部高原之名。——譯者

的蛮族軍队。但是他为了要实现后来的計謀，他故意教汪达尔人同苏維汇人渡过萊因河侵入高芦地方。至于阿拉利克，他于公元402年曾經侵入意大利，但是被斯提利古的部将扫鲁斯击敗。不过罗馬政府里面的人沒过几年（公元408年）的功夫，就嗾使皇帝荷諾里烏斯杀死斯提利古。邹西穆斯說：自斯提利古被杀以后，在罗馬城中的蛮族被杀的很多，因此其余的蛮族就組織三万軍队，并且請阿拉利克和他們联合。

但是阿拉利克不願意开战，因为他只要有官职，有相当的权力和进款就滿足了。他当时准备和罗馬皇帝讲和，将他的軍队退到潘諾尼亚去。不料优柔寡断的荷諾里烏斯不允許他的条件。于是阿拉利克就派人到上潘諾尼亚去，召他的內弟阿塔勒夫带領哥特人和匈奴人回来，他自己率領軍队向罗馬城挺进，将罗馬城包围起来。城中的市民求他解围，就送上五千磅黃金，三万磅白銀，四千件綢衣，三千条紅毛毡，三千磅胡椒。阿拉利克于是再宣言他自己願意同皇帝和罗馬城联盟去反对他們的共同敌人。于是蛮族部队都退出罗馬城。但是当他們撤退时，罗馬城中的奴隶，沿途便加入蛮族軍队之中，数目达到四万人。我們从这件事实可以看出罗馬帝国里面的所謂"日耳曼人"分子，实在复杂。

荷諾里烏斯不願意同阿拉利克讲和，但是他的宫內大臣朱維烏斯为人較为謹愼，"他决意派使臣到阿拉利克那边去，請他到雷溫納[1]来，向他說明罗馬政府願意同他讲和。阿拉利克接到罗馬皇帝和朱維烏斯的信以后，他就进駐阿利米努穆，該地离雷溫納不过三十哩。朱維烏斯本来在埃庇魯斯[2]已經认識阿拉利克，而且同他很要好，立刻去欢迎他。当时阿拉利克所要求的，只是每年要給

① 意大利东北海滨城市，为罗馬帝国西部国都凡三百五十余年。——譯者

② 在古代希腊的西北部。——譯者

他多少黃金，多少谷物，而且要允許他同他的蛮族可以住在威尼喜阿①、諾利古穆②和达尔美喜阿③这几处。朱維烏斯当面将这几个条件写下来，同他自己的私信一齐寄呈罗馬皇帝，劝皇帝任命阿拉利克作騎兵步兵的司令官，以为如此可以减輕阿拉利克所要求的条件，締結和約。”

不料荷諾里烏斯仍旧拒絕批准这些条件。阿拉利克因为不能在罗馬政府中得到一个較好的位置，发怒起来，决心再进攻罗馬城。但是他听得罗馬皇帝已經招集了一万匈奴兵援助罗馬，阿拉利克后悔他自己作事太鲁莽，因此他派他所占領地方的各个主教去规劝皇帝，敎他們向罗馬皇帝說：“他們自己并不想作罗馬官吏，只願住在常常受人騷扰的諾利古穆一带地方；至于一年給他多少谷物，完全听皇帝的便；黃金也不要了；而且他很願意和罗馬人联盟来抵抗帝国的敌人。”这些条件鄒西穆斯以为是很合理的了，但是荷諾里烏斯竟不正式应允。这种强硬的态度实在表现了他的愚蠢。

普通只看过“民族大迁徙”这类书籍的讀者，对于罗馬人早就雇用匈奴人来当兵这件事实，一定要感到惊訝。就是对于阿拉利克命敎士同罗馬皇帝办交涉，如此客气，如此审慎，也一定要感到惊异。实在說起来，阿拉利克住在罗馬帝国里面恐怕已經多年了，他同其余的罗馬官吏实在沒有蛮族或非蛮族的区别。只要能够得到一个同斯提利古一样的地位，他显然就很滿意了。

阿拉利克旣然受到荷諾里烏斯不接受他的条件的耻辱，他就再度进軍包围罗馬城。他将罗馬同非洲的交通断絕了，而且要求

① 在今意大利东北部。——譯者

② 古罗馬的一个省，在今奥地利南部，沿多瑙河一带地方。——譯者

③ 在今南斯拉夫西部沿海一带之地。——譯者

罗馬市民同他联合去攻击皇帝。当时皇帝已逃往雷溫納。

邹西穆斯叙道:“罗馬的上議院召开会議討論应付的方法。他們对于阿拉利克的要求,一概承认了。他們欢迎他的使臣,而且請他到罗馬城里来。同时并遵照阿拉利克的命令,請罗馬城的市长阿特卢斯穿上紫色皇袍加冕,即皇帝位。阿特卢斯于是任命兰帕底烏斯做宫內大臣,任命馬西阿努斯做罗馬城市长,任命阿拉利克同从前統带达尔美喜阿軍队的軍官名瓦連士的做司令官,并任命其他种种文武官吏。”

阿特芦斯并且宣言要征服全世界,罗馬人听得这句話,“非常的欢喜,以为不但得着許多熟悉政务的官吏,而且对于特图魯斯被任为执政官一事,尤其滿意”。但是不料阿特卢斯不能維持罗馬同非洲間的交通,城中粮食的来源断絕,因此阿拉利克立刻废黜了他。阿拉利克将他带到阿利米努穆城中,褫夺了他的皇冠和紫袍,将袍冠送还罗馬前皇荷諾里烏斯。

照上面所述的看来,阿拉利克侵入罗馬的时候,并不是带了一般西哥特蛮族来横扫帝都,他实在很想用和平方法去实现他的目的。当他对于他自己所选择的皇帝沒有办法的时候,他还是願意同荷諾里烏斯重开談判。上面邹西穆斯所叙述的詳情,恐怕是根据当时一个希腊的历史家奥林庇多魯斯的著作而来的。他叙述到此地,忽然中断了。后来阿拉利克为什么再围罗馬,我們就不知道了。

以后来吉本对罗馬陷落那件事,用去了好几頁的篇幅,作了詳細的叙述。他这段文章大部分是出于他自己的想像。关于这件事实,我們从当时人的史料中所能得到的知識是很少的。奥罗修斯当时是一个青年人,他要証明基督教并沒有促进罗馬城的陷落,相反的,基督教实在保护了罗馬城中的許多人。他曾經举了一两个

例子，証明哥特人对于当时的礼拜堂很是尊重；而且他說蛮族烧了几座房屋后，第三天就退出去了。他在这事发生不到十年以后写道："这件事虽然过去沒有几年，但是到了现在，罗馬城中除了少数断井頹垣以外，沒有人会想到罗馬城中曾經发生什么变化。"

阿拉利克占据罗馬城后五年，罗馬城的市长魯提琉斯·那瑪夏努斯作了几首詩，贊美罗馬的荣耀：以为罗馬城雄踞泰伯河上，好像世界上一个美丽的皇后。他对于最近罗馬的扰乱幷无伤感，幷且預言說罗馬城将来一定为永久的大一統的帝国。

过了一百年，到查士丁尼时代，有个历史家普洛科庇烏斯在他所著的《汪达尔战記》那部书里面，叙述了阿拉利克攻陷罗馬城的事实，同上面邹西穆斯所說的完全相反。他說：有許多人說阿拉利克曾經以三百个美少年送給罗馬城中的貴族，这班青年当他們的主人吃完晚飯入睡后，就将城門打开。但是他說另外有人說：开城門的人实在是一位上議院議員的太太名普罗白，她看见城中一班可怜的貧民，差不多要到人相食的地步，所以叫他的奴仆在夜間将敌人放进来。

吉本自己說："从普洛科庇烏斯那段不太可靠的記載，提出了一种似乎可信的情形。"这种作法的結果当然是靠不住的。普洛科庇烏斯关于此事的两段記載，不但不确实，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此地还可以提到我們常常听见的荷諾里烏斯和他的母鸡"罗瑪"。① 那段故事，也就是从普洛科庇烏斯来的。这段軼事虽然沒有多大历史上的根据，但是因为它异常有趣，所以值得永远記載下来。

阿拉利克不久就离开罗馬南去，他要去維持罗馬同非洲的交

① 鸡名。——譯者

通，因为罗馬依靠非洲的食粮供应，但中途就死了。继他而起的是阿塔勒夫，他娶了原来作为人质的荷諾里烏斯的妹妹为妻，先后在意大利和高芦进行了种种和阿拉利克一样的政治上的阴謀詭計。阿塔卢斯再度被立为皇帝，再因失敗而被废。所以奥罗修斯說这个懦夫是哥特王的一个傀儡，他們立他，废他，又立他，又废他。奥罗修斯还記載着阿塔勒夫曾說过：

“最初我竭力主张应該把罗馬的名字毁掉，它的領土应該变成哥特人的帝国，并叫作哥特帝国。我希望“罗馬尼亚”这个字也該变为“哥特西亚”，而且阿塔勒夫应該成为皇帝。但是照我的經驗看起来，这班哥特人放纵惯了，不会遵守法律。沒有法律，就沒有国家。所以我现在采用一种比較稳健的方法：就是用哥特人的精力来恢复而且增加罗馬的名誉，我希望由此取得光荣，永垂史册。并且希望后代的人当我是一个恢复罗馬的发起人，因为现在我不能变更帝国的国体。”

六

邹西穆斯和奥罗修斯的記載都到此为止，关于五世紀的史料，就异常缺乏了。所有的編年史里的記載都十分簡略。普洛科庇烏斯的著作，因离当时已远、很不可靠。但是以后蛮族首領同罗馬皇帝往来交涉的情形，和斯提里古及阿拉利克时代差不多，这是很清楚的。至于那西哥特人諸王能够維持罗馬旧日的政体和法律，这也是很显然的。关于伯坎底王国[1]的事情，我們所知道的很少。至于北非洲汪达尔王国[2]的历史，大半都是正統基督教徒所著的

① 在今法国东南部，亦属于日耳曼族。——譯者

② 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439年攻陷北非迦太基，即定都于此，建立汪达尔王国。——譯者

居多，而这些基督教徒又是最反对当时蛮族所信的那种阿利安教派[1]的，因此对汪达尔人偏见很深。

在意大利方面，从斯提里古以后，最重要的軍官莫过于“执政”阿伊喜烏斯[2]这个人。他曾在匈奴王宫里面供职多年，并且作过匈奴雇佣兵的将領，而且很有資格去組織联軍，于451年在东高卢地方击敗阿齐拉。他的继任者是利西美尔，也得了执政的称号，在政界中好像紐約城中的政党老板一样，有很大的势力。

从公元455年无能的瓦楞提尼亚努斯三世死了以后，西部罗馬的皇帝一个紧跟着一个以惊人的速度继位。据說馬克西穆斯就是杀死瓦楞提尼亚努斯三世的凶手，不到几月他自己也被杀了。在这一年阿維杜斯来作短期的罗馬皇帝，他就是西哥特王狄奥多利克二世[3]所支持的。但是当时汪达尔人已經要从非洲来攻罗馬城，必須选出一个能干的人来做皇帝。因此作为后台老板的利西美尔就同意选出馬吉利安做皇帝(在位年代455—461)，他本来是个很好的軍官，而且曾經与利西美尔同过事。他尽力去澄清当时的吏治，因此群众拥护。但是后来利西美尔见他声望过高，不滿意他，所以在461年，就請西維魯斯来代替他。西維魯斯在位不过四年，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們无从考究了。西維魯斯死后，利美西尔不再另选皇帝。二年以后罗馬东部的皇帝利俄才同安西米烏斯联姻起来。我們在恩諾底烏斯所著的《埃庞法尼烏斯主教传記》里面，可以看出新罗馬皇帝和那利西美尔的关系。据恩諾丢斯說：利西美尔在帝国里面的地位仅次于安西米烏斯。利西美尔认为安

---

① 基督教的一派，創立于阿里烏斯，当时日耳曼蛮族都信仰之。——譯者

② 罗馬帝国末期名将，公元454年罗馬皇帝派人将他刺杀。——譯者

③ 东哥特国王的建立者(455—562年)，493年推翻奥多亚克，遂統治意大利。——譯者

西米烏斯是一个滑头，而安西米烏斯又以为利西美尔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蛮族。到了472年，利西美尔另外又立了一个皇帝奥利琉斯来对抗安西米烏斯。但是就在这一年，两个皇帝都因病死去。

翌年有个新的候补皇帝出现，这就是哥利西里烏斯这个人，他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軍官，而且又有伯坎底国王的援助。同时住在达尔美喜阿的一个軍官茹利烏斯·尼波斯得了罗馬东部皇帝西諾的允許自称皇帝。照編年史所說，哥利西里烏斯在罗馬附近的波都斯地方作了主教，尼波斯作了皇帝。利西美尔死后，又有一个很有經驗的蛮族領袖俄利斯提斯来作执政官，这人本来作过阿齐拉的秘书。此时罗馬西部虽然已經有了两个皇帝，即哥利西里烏斯和尼波斯，但俄利斯提斯却要立自己的小儿子为皇帝，这就是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魯斯。同时东部的皇帝西諾也正在那里驅逐一个劲敌。

我們要明白所謂西罗馬灭亡这件事的关系，不能不将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魯斯被废黜的情形說明一下。因为普通都以为罗穆路斯的废立这件事，就是"西罗馬帝国"的灭亡。现在让我們先来討論公元476年种种事实的材料。我們知道现在我們所有的材料沒有一种是当时亲眼看见的人記載下来的；大半都是后代的著述，或者是远地的传聞。其中最有名的是狄奥多利克的大臣卡西多卢斯所写的。但他生于公元476年以后。他于此事发生后四十年，在他所著的《編年史》里不过說："紀元后475年这年尼波斯逃往达尔美喜阿，俄利斯提斯将皇帝的权力授給他的儿子奥古斯都魯斯。"在公元476年那段下面写道："本年俄利斯提斯同他兄弟保罗都被奥多瓦克所杀。奥多瓦克称王，但他不穿王服，亦不用王徽。"照上面所述的看起来，显然卡西多卢斯并沒有看出这几件事可以看作是"西罗馬的灭亡"。

关于此事，最完备的記載是保存在一种意大利編年史的残篇里。这是六世紀中叶的人所著的，作者的姓名我們无考。我們所知道的不过正如蒙森所說，那位作者显然是一个幼稚、简单、文理不通的基督教徒。书中关于此事記載如下：

“当皇帝西諾在君士坦丁堡統治帝国时，执政尼波斯忽然到了波都斯，将哥利西里烏斯废黜。哥利西里烏斯后来作了主教，而尼波斯就在罗馬作了皇帝。不久尼波斯到了雷溫納，但是他惧怕执政俄利斯提斯，因为他带了軍队来追他，所以尼波斯就由海道逃到薩罗那，在那里住了五年，被他的部下刺杀。”

“从他离开罗馬不久以后，奥古斯都魯斯被立为帝，在位十年[!]。奥古斯都魯斯沒有做皇帝之前，他的父母叫他罗馬路斯。他的父亲执政俄利斯提斯立他做皇帝，但是奥多瓦卡带了西利地方的人，忽然来和执政俄利斯提斯打仗。在庇西查地方将俄利斯提斯杀死，不久又将俄利斯提斯的兄弟保罗在克拉西斯[雷溫納的海港]附近松林里面杀死。他便占据了雷溫納，将奥古斯魯斯废黜。但是他因为皇帝年輕貌美，就生出一种怜爱之心，赦了他的性命，并且送給他六千枚索里达。他还送他到坎培斯去，同他的家人安然度日。他父亲俄利斯提斯本是个潘諾尼亚人，因为随阿齐拉来到意大利，而且作了他的秘书，所以慢慢的做了罗馬帝国的执政。”

普洛科庇烏斯是查士丁尼时代的著名历史家，他在大約作于公元550年左右的著作里所述关于上述事迹，比較詳細。但是他沒有說他的材料从何而来，而且他搜集材料的时候，离那件事已經七十年了。他在他的那部《哥特战紀》里面写道：

“当西諾統治着拜占庭的时候，西方的权力为奥古斯都所有，罗馬人給他起了个綽号，称他为奥古斯都魯斯，因为他即位的时候，年紀很小。他父亲奥利斯提斯是一个很謹愼的人，任攝政王。

从前罗馬人曾經为阿拉利克和阿齐拉所敗，所以和西里、阿兰尼以及其他哥特部落結成同盟，罗馬軍队的威望因此大为降低，而蛮族的威望則因此提高。他們在名义上虽称作同盟，实际上是受蛮族的支配。蛮族如此嚣张，甚至在罗馬人屢次退让，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之后，他們竟想瓜分全部意大利可耕的土地。他們要求俄利斯提斯拿出三分之一的土地，当俄利斯提斯不允許之后，他們就立刻将他杀死。蛮族里面有个皇帝的禁卫官，名叫奥多瓦卡的向蛮族說：假使他們派他作指揮，他就承认他們的要求。他僭位以后，并沒有伤害皇帝的身体，而是仍允許他作一个庶人。他想使蛮族对他忠心，所以将意大利所有可耕的土地的三分之一給蛮族，他僭位凡十年”。

十世紀罗馬皇帝君士坦丁·普菲罗金尼都斯下令搜集的历史材料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叙利亚历史家馬勒古斯著作的残篇。这部历史是从公元474年叙到480年，他著书的时候是六世紀初年。其中有一段叙述罗馬上議院派人到东罗馬皇帝那里去要求他任命奥多瓦卡作执政，这个头銜是从前一般担任罗馬政府后台老板的蛮族領袖所拥有的。下面一段文字具有許多重要意义，而且可以表明吉本等著名历史家是如何不謹愼，几乎近于不规矩了。

馬勒古斯的原本是希腊文，现在譯述如下：

“……奥多瓦克强迫上議院派使臣到皇帝西諾那边去，告訴他說他們已經不要他們自己的皇帝了，有一个共同的皇帝統治帝国的两部就够了。因为奥多瓦卡很熟悉政治和軍事，所以他們已經选举他出来保护他們的利益。他們悬求西諾賞他执政的称号，而且命他管理意大利方面的政治、軍事事务。罗馬上議院所派的使臣，就将这种陈請书带到君士坦丁堡去了。

“在这些日子里，尼波斯也派了使臣来向西諾道賀［因为当时

西諾已經将他的劲敌巴西里古斯推翻了〕,同时請求他来援助尼波斯,对他提供金錢、軍队及其它必要物資,以恢复他的地位,因为尼波斯所受的困难和西諾一样。尼波斯就派使臣前往,陈述此意。

"但是西諾回答罗馬上議院使臣的話是:他們从东部接去两个皇帝,一个被逐,一个被杀。在这种情形下,他們应該知道有什么办法。只要那个皇帝还是存在①,那么,除了欢迎他回来,沒有别的办法。

"他对于奥多瓦卡所派来的代表說:奥多瓦卡要想取得执政的称号,最好是向皇帝尼波斯去要求;不过假使尼波斯不願意給这个头銜,那么,他自己再来給他。他对他們将奥多瓦卡夸奖了一番,他說奥多瓦卡显示了維持罗馬秩序的傾向,所以他希望奥多瓦卡能够欢迎封他为执政的那个皇帝。他并且写了一封信給奥多瓦卡,說明这番意思,而且尊称他为执政。"

西諾一句也沒有提到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魯斯,因为他沒有正式被承认为皇帝,只是他父亲的推荐的候补人而已。我們已經将公元476年那件事实的全部材料加以說明了。现在再看吉本著作中的第三十六章是如何将馬勒古斯的記載加以复述的。

"奥多瓦卡决定废除这个无用而且糜費的职位〔皇帝〕。但是传統的压力很重,要实现这种主张需要见識和魄力。他迫使不幸的奥古斯都魯斯向上議院辞职,这是上議院最后一次表示服从君主的行动,它的自由精神和宪法形式了。上議院遂一致議决致书于拜占庭皇帝西諾。西諾是利俄的女婿及继承者,在不久以前,方平定了叛乱而复辟。他們向他陈述意大利方面已无另立皇帝之必要,皇帝一人已足以統治保护东西两帝国而有余。因此以上議院

① 指尼波斯。——譯者

及人民的名义，議决将統一帝国的首都由罗馬移至君士坦丁堡；而且上議院宣言此后放弃选举皇帝之权利。他們认为，奥多瓦卡在政治、軍事上的經驗已足以巩固罗馬共和国(他并不感到羞耻地重复这个名称)，請求皇帝任命奥多瓦卡为执政，命他負責管理意大利方面的事务。

“上議院所派遣的代表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并未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小心的西諾既知[尼波斯]大势已去；遂不再坚持使他复辟。唯一皇帝之名称以及在罗馬各城鑄像滿足了他的虛荣心。乃与奥多瓦卡互通音訊，而且感謝他接收了皇帝的徽章、宝座及宮內的装飾品等物，这正是奥多瓦卡願从国民的心目中轉移出去的东西。”

从上面这段文字看，吉本所述虽然自称取材于馬勒古斯，但相同的地方很少。而且在馬勒古斯原文里面，沒有提起共和国一辞，即使果然提到，吉本也应該知道希腊文所謂的共和国，并不是我們所謂的共和国，因为当时共和国一辞不过就是国家的意思罢了。

最可怪的是，吉本称西諾“接收皇帝之徽章及皇帝宝座和宮內的装飾品”。“奥多瓦卡願从国民的心目中轉移出去。”无論何人讀了，都以为奥多瓦卡将罗馬皇帝的徽章等物移至君士坦丁堡这件事是眞的了。誰知道这話实在沒有一点根据。在意大利編年史里面說：从公元493年狄奥多利克杀了奥多瓦卡以后，他就同皇帝安那斯塔西烏斯讲和，皇帝就将从前“奥多瓦卡所送到君士坦丁堡的那些王宮装飾品，一概交还了。”至于这些装飾品究竟是什么东西，沒有人知道。但是我們断不能說这种装飾品就是皇帝的徽章，而且吉本、霍德金所說的东西被送往东罗馬这件事，我們从馬勒古斯的記載中找不到根据。

现在我們将上面所說的五世紀的大事总結一下。从当时流传

下来的稀少的史料研究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普通人对于罗馬帝国西部分裂的种种观念显然沒有根据。

（1）狄奥多西大帝决不是罗馬唯一的皇帝。

（2）他并沒有将帝国分給他两个儿子阿卡尔底烏斯和荷諾里烏斯。

（3）欧洲史上从沒有“西罗馬帝国”这个东西，至少在查理曼以前。

（4）罗馬人和蛮族并沒有什么种族感情上的界限，而且即是在上流社会里面，也常有互通婚姻的事情。

（5）阿拉利克并不是一个蛮族的領袖，带了大队的蛮族来横扫世界的首都，他实在是个很謹愼的政客，慣常从事于长期的談判。

（6）公元410年时，罗馬城虽然暫时被阿拉利克所占領，但是并沒有受多大的損失。

（7）公元476年时，并沒有西罗馬灭亡那个事件，因为根本上就沒有可亡的西罗馬帝国，而且那一年也沒有大事发生。

（8）罗穆路斯·奥古斯都魯斯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罗馬皇帝。

（9）奥多瓦卡并沒有将皇帝的徽章送到君士坦丁堡。

第七章 “1789年的原则”

一

自从法国国民議会发表了那篇闡明革命的性质、范围和利益的著名宣言以来，时間已过去有一百二十五年了。国民議会在完成了六七个月的工作之后，宣称：“旧的、腐败的国家在国民議会的主持下已經更新，重获自由”，并且数百年来一直被人們曲解的和輕視的人权又重新建立起来了。从前在法国公法中规定［少数人所享受的］无数特权永远被废除了。宣言宣称：“现在哪有一个名实相称的公民胆敢回顾过去，希望在我們周围的废墟上再来恢复从前的旧制度？”

但是竟然还有不少人竟敢回顾革命以前国民議会所藐視的那种旧制度，他們对它不仅表示留恋，而且还流露出向往的心情。的确，就在现代还有一个［法国］作家名叫查理·厄里考特，在全級会議一百周年紀念会上还在贊美旧制度，认为在旧制度下全国国民过着安乐和諧的生活；直到了革命来到的时候，人民由于中了革命的魔道才叛离了上帝和国王，灾难深重了。按照查理·厄里考特的說法，法国的旧制度是能够使社会的各个阶級的特性得到最高的发展，他們能够共同合作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第一，首先就是僧侣，他們是聪敏、可敬和虔奉上帝的人。其次就是从前的暴君，现在则是有礼貌的、受人尊重的国王了。再次便是軍人，他們现在成为文雅的貴族、荣誉的灵魂。接着是資产阶級，他們是富裕的、有威严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最后是人民，他們篤信宗教，和藹可亲；他們生活中虽有些小麻煩，就积攢錢財，唱歌跳舞来排遣，而当

他們遭遇到严重的不幸时，就想到死后天堂的快乐。

可是，这个幸福的、信奉基督教的、君主政体的法国，驟然出其不意地以强大的暴力突然攻击教士和君主。它现在竟然要消灭它以前所崇拜的指导者，反而专誠崇拜一个新女神——这个新偶像就是我們所謂的革命。①

乍看起来，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对于一个查理十世时代获得最早印象的极端反动保皇党分子的意见予以十分重視。但是厄里考特只是那些重要的有学問的著作家之一。他們这些人为了反动派的利益，一直在致力于描写恐怖时代的可怕事迹和混乱状态。再則，只有这些历史学家才能說明共和党人的态度，他們对于頑固的仇敌所說的話是决不容許袖手旁观，輕易放过的。

现在巴黎市政府拨出款項叫人研究本市的历史，其用意并不止于它对科学发生兴趣，或是为了叙說这个城市的光荣传統。它所以要搜集和出版革命时代巴黎公社的种种文件，其目的是在于表明巴黎城在推动"人类解放"的"不朽的光荣"。这些文件要表明巴黎的代表們建立起一个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新社会；他們用德行、爱国主义、克己精神去反对背叛、弃信和誹謗——这一切都是自私自利的貴族常常来煽动人們去反对高尚的公民的手段；而能使他們成为殉道者，而不能使他們成为叛徒。我們若是平心靜气地来研究巴黎公社在建立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过程中的作用，那么，我們就感觉到上面的話就同厄里考特所描繪的旧制度下的幸福是一样荒謬可笑的。

总而言之，现代的法国人同他們的1790年的祖先一样，或者热爱这个革命，或者憎恨这个革命。近来有一位法国著作家曾說

---

① 见所著《法国革命史 1789—1889》(1889年巴黎版)第1頁。——譯者

道：直到如今为止，还沒有人能在叙述法国革命时，和叙述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一样，既不加以咒罵，也不加以辯护①。这句話虽是不很公允，但是比起奥拉德所說的話却更近眞实。奥拉德曾說：他和他的朋友們是用像叙述希腊、罗馬史的那种精神去叙述法国革命史的。但是如果要叫法国人用像叙述克雷翁②、布拉西达③、尼西阿斯④和阿里斯托芬尼斯⑤时所持有的那种公正精神去叙述法国革命中的人物，如丹敦⑥、克罗特⑦、拉斐特⑧、德莫林⑨，那就不知道还要經过一个多久的时間。

如今在法国的重要著作里面，正如同在一百年以前一样，还存在着許多党派偏见，所以法国革命正好証实了都克維尔⑩所說的話。他說法国革命就其性质而言，虽然是一場政治革命，但是它的方式却是一場宗教革命，因为法国革命激起人們强烈的仇恨，这种仇恨同由宗教改革伴随而生的厌恶情緒几乎相同。这种党派的偏见永远存在的原因，一部分可能是由于法国人的性格，但是大部分却还是因为法国革命沒有完滿地解决法国革命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如中央政府的性质，教会与国家之間的关系等等。而且法国

① 见賽夫培尔所著《法国1789年后的社会与知識运动》第113頁。——譯者

② 古代雅典之民党領袖，于紀元前422年为斯巴达将物拉西达斯所败，陣亡。——譯者

③ 古代斯巴达名将，在南希腊战爭中頗著战功。紀元前422年卒。——譯者

④ 古代雅典名将，反对阿西庇阿提斯远征西西里政策。——譯者

⑤ 古代雅典喜剧作家，著有戏剧五十四种。紀元前384年卒。——譯者

⑥ 法国革命中雅各宾領袖之一，1759年生，1794年被杀。——譯者

⑦ 法国革命中之激进党人，1755年生，1794年被杀。——譯者

⑧ 法国人(1757—1834)，出身法国貴族。1777年曾參加美国独立战爭。1789年法国革命时，任护国軍統領。恐怖时代逃亡在外。1830年再參加法国革命之役，并再任护国軍統領。——譯者

⑨ 法国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領袖之一(1762—1794年)，1794年被杀。——譯者

⑩ 法国学者(1805—1861年)。著有《美国的民主》及《旧制与革命》等书。——譯者

接二連三的几次宪法的革命虽然进行得并不像普通人所設想的那样彻底，但是这些革命却一个接一个地使得各个政党打起精神，从而使保守党和激进党的心里永远满怀着希望。所以第一次革命就成为以后每次辯論时局問題的背景，人們也就常常提到对 1789 年的原則作为依据，这些有不同志趣、目的和信念的人，对于 1789 年的原則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法国革命或許是历史学家最难研究的問題。如果人們想研究它，那么，在力图使现在能够明了过去的道路上就会到处遇到困难和陷阱。关于法国革命是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这类問題，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疑問。至于要問法国革命是在什么时候終止的，则它好像直到现在还幷未終止。就某些事实来說，資料实在多得叫人迷乱，而对另外一些事实来說，材料又太稀少，甚至于一点也沒有。我們必須对各式各样的党派偏见——宗教的、政治的、哲学的见解都加以研究。法国革命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发生关系，包括本国的和外国的君主、朝臣、各种国民議会和无数的委員会、各地的革命机关、公社政府、派出的代表团、逃亡的貴族、宣誓与不宣誓的传教士、俱乐部、演說家、报紙編輯、小册子的著作家——它对这些人所从事的事业都发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历史上还沒有见过像法国革命那样在 1789 年全級会議以后的短短十年或十五年期間，在涉及人类利益如此众多的領域內，发生如此众多的、已經实现的或計划要实现的变化。伴随着政治的、社会的、經济的、宗教的和教育的这些根本改革而来的是最空前的群众激动和紛乱、內战和对外战争、防御和侵略、对外交涉活动等。事情如此复杂，变化如此遽然，使人不可能将法国革命中全部事实有条有理地記載下来。所以卡萊尔曾經說："法国革命的意义眞是同談論革命的人們一样多。"在他看来，"法国革命是一种公开的、激烈的叛乱，无政府的精神从下

层爆发起来，打破监狱，用它的不可約束的和不可估量的澎湃汹涌的力量将世界上的万象都包罗在高度的狂乱之中”。泰因[①]把法国革命比作一个失常的紳士，这个人体质虛弱，但外表正常，性格溫良，因为喝了一种新酒，忽然跌倒在地，口吐白沫，疯狂起来，肌肉拘攣。”虽然卡萊尔和泰因所作的比喻都是严肃认真，沒有忽視法国革命的深刻意义，但是那些比他們头脑較差的人則往往被当时的紛扰和高談闊論所迷乱，好像这些东西就是法国革命的本身。最近二十五年来，历史界有了一件最重大的成就，那就是人們已經将法国革命时代放到它的适当地位上了。英文讀者不得不把这件事情归功于摩斯·斯提芬斯教授[②]，因为他闡明了摆脫束縛的无政府精神，并且使它回到应有的地位。这件事如果同近来俄国境內所发生的巨大的混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法国革命史里面的个人总是异常突出、引人注目的。如瑪丽·安东奈特、德·朗巴勒公主[③]、馬拉特、夏洛特·高代[④]、德莫林、丹敦、圣鞠斯特[⑤]以及小太子等人，在法国史讀者的心目中是亲切的，讀者往往容易着眼于巴士底獄的陷落[⑥]和九月杀戳事件，而对于制訂法国第一次宪法的原因以及制宪的原則反倒不很注意了。

现在正是我們应該对于法国革命来个全面估价的时候了。我們应該把法国革命看做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經济的根本改革。

---

① 法国批評家和历史家(1828—1893年)。——譯者

② 英国人，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著有«法国革命史»。——譯者

③ 瑪丽·安东奈特的摯友(1748—1792年)。——譯者

④ 法国革命中刺杀馬拉特之女凶手（1768—1793年），因此于1793年被处死。——譯者

⑤ 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領袖(1767—1794年)，1794年与罗伯斯庇尔同时被杀。——譯者

⑥ 1789年7月14日，标志法国革命的开始。——譯者

夏山在他未完成的著作《革命中的天才》(1864—1865年版，只出版了两卷)一书中，一开始就显然抱有这种见解。他想写一部眞正的历史，将个人的、軼事的、偶然的和想像的情节略去不提，而注意当时具有永久性的成就。他认为“革命”这件事并不是摆脱束縛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的爆发，而是改革家把他們的理想化为行动的道路，即以平等的制度去替代特权的制度；以自由的国家去替代专制的政府；以人民的主权去替代神授的君权；以公正去替代偏私。夏山认为“这部历史实际上并沒有取得它似乎失去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我們要替这样的历史著作进行辯护呢？我們早就渴望知道法国革命的眞正成就。但是我們如果要明了法国革命的成就和它的历史地位，我們必須将法国革命史同法国的旧制度联系起来，同时还要同法国召集三級会議以前五十年的欧洲历史联系起来。从前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們在研究法国旧制度的时候，往往着重叙述当时政府的貪污腐化和資产阶級的投机倒把。用这些事固然也可以解释当时一些过于偏激的恐怖分子的态度，但是这些东西却不能說明看来似乎是驟如其来而实是永久性的改善的原因。假使我們不去研究1789年以前的那些多少是失敗的改革的无法抗拒的要求，那么法国革命必然始終是一个謎。人們在将来总有一天会把法国革命看做是一种符合于新的、已經起了变化的环境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和全面性的改革。为了叙述法国和西欧的这次再生的历史，我們必須注意造成革命的酝酿过程，这是将来研究法国革命的人应有的抱負。

到现在为止，只有少数人能够把发现与闡明法国革命眞正伟大的、永久的結果的問題摆在自己的面前，无怪乎广大的讀者以为法国革命并沒有产生什么結果。可是只有一个人倒是例外。沃拉特先生在他所著的《法国革命政治史》中提出革命运动中两个主要

原則，即“权利的平等”和“人民的主权”。他把他的全副精力和广博的知識都用来叙述这两个原則的变化过程，从1789年讲起，一直讲到1840年为止。我們讀了这部书就好像摆脫了精神錯乱的状态，而进入了条理清楚、目的明确的境界。

在法国革命的那种戏剧性的插曲背后隐藏着具有根本性的社会政治改革，这种改革不仅可用以說明十九世紀法国史，而且还可用以說明欧洲各国自由制度的发展。我們設想五百年后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回顾法国革命的时候，他們也許会抛弃了那些法国革命中的戏剧性的故事，而突出革命对于欧洲的眞正貢献。这些未来的历史学家必然将要把1789年的原則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

柏克[①]痛罵法国第一次国民議会和它的“笨拙而妄誕的政治玄学”为“好像艾俄路斯的风暴[②]横扫地面一样”。以后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学家都詆毁法国那篇《人权宣言》，把它看做只是法国人性情輕佻的一个例子。西培尔[③]认为从那篇宣言的条文中可以看出以后法国的种种危机。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当时法国人应該多作一些具体改革，而不应該浪費宝貴光阴来进行空洞无物的、学究式的爭辯。在某些情況下，法国人从政治策略的观点出发，也像外国批評家一样痛罵那篇宣言。但是就另一方面来說，当这篇宣言初次宣布的时候，它不仅激起了当时广大群众的热情，而且在以后的法国宪法中还屡次以不同形式出现，直到1848年为止。就是欧洲大陆各国宪法中的类似的宣言，差不多都以这篇宣言为范本。

---

① 英国政治家(1729—1797年)，著有《法国革命的回顾》一书。——譯者

② 希腊风神。——譯者

③ 德国历史学家(1817—1895年)。曾受业于兰克，任慕尼黑及波恩两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法国革命史，1789—1800年》、《威廉一世时代德意志帝国建立史》、《第一次十字軍史》等书。——譯者

在研究《人权宣言》的来源和原型的过程中有两个趋向:第一,是使人将重大的責任放在卢騷身上;第二,是使人回想起美国的先例,关于这一点,在国民議会的爭辯中人們常常含糊地提到。西倍尔认为法国《人权宣言》的根本思想来自美国《独立宣言》。霍賽尔和斯提芬斯都认为法国《人权宣言》是以《美国联邦宪法》的神話般的权利宣言为范本,他們假定美国宪法之前,是先有这一宣言的。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說明法国宪法的思想是如何逐漸发展起来的;在第一次宪法的前面加上一个簡单的說明来申述宪法所依据的一般原理是如何自然而然产生的。现在我們不該再以說明恐怖时代为主要目的去研究法国第一次现代立法机构了。我們应該用当时議員和他們所代表的人民的观点去观察他們的事业。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們就不能不将国民議会宣告制訂宪法时的情况,加以叙述。

二

大家都知道:早在1789年5月初,法国封建时代的三級会議即所謂全級会議在凡尔賽召开。这次会議与前次三級会議相隔已有一百七十五年之久了。尽管議員們还穿着古老式样的制服,同从前所规定的一样;但是从上次会議以来,这个团体却已經經历了巨大的变化。君主的命令并不能够再創造出数百年前的那种精神了。尽管有保守分子的极力反对,但是这个会議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內起了不可避免的变化,它以现代人民代表的議会的姿态出现了。

当时在法王左右为他謀图的那些朝臣已經感觉到这种危险的傾向,他們慫恿路易十六下令叫三級会議暫时休会。休会的理由是路易十六将于6月22日亲莅会場,因而不得不叫木匠将会場修

理一下，为这次庄严的会議作好准备。

第三等級的代表們看到会場既被工人們占据，于是就集合在凡尔賽宮的网球場上，在那里通过了如下的議案：

国民議会认为这个会議的召开就是为了制定王国的宪法，实行秩序的整頓和維护君主的原理。这个会議无論在何处开会，人們不能阻止他們继續討論。国民議会认为它的会員在哪里集合，哪里就是国民議会。本会議决所有議会的会員立即郑重宣誓：无論在何种情况之下，他們将团結一致，决不分离，直到将王国宪法制定出来，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为止。

这个議决案的重要性在于这是第一次正式明确地宣布了国民議会的使命。前人的記載往往把这个著名的宣誓解释为这是由于木匠侵入会場所引起的料想不到的結果。卡萊尔說："这是工人們的錘打声、鋸木声、工作时的呼唤声的結果"。实际上，6 月 20 日的宣誓虽然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它不过是在議会代表們沒有被逐出于会場以前的事态的很小的进展。

早在三天以前(即 6 月 17 日)第三等級代表們就自称为"国民議会"了。同日，这些代表們还宣布了一个誓言："我們宣誓并且保証将以热心和忠誠来完成我們应尽的义务"。据說宣誓的"有六百人，在周围参观的群众有四千人。这次宣誓激起了的最强烈的威情，造成了气派堂皇的場面。"显然，网球場誓言的新奇之点就在它明确地宣布制訂宪法是議会的重要任务。

全体代表一致承认制訂宪法是議会的眞正目的，这就是足以說明当时广大人民认为发布这样一篇宣言的时机已經成熟。我們要問：法国人是通过什么步驟才得到这个明确的信念，认为救国的方法是取决于宪法的制訂，即第一次在网球場誓言、正式发表的信念？

当时法王和大臣对于召开全級会議的目的是十分含糊的，因而在1789年1月24日发出的召开全級会議的信件中的説明也是含糊的。那个文件称："我們急需征得忠順臣民的意见，帮助我們克服我們所遭受的一切困难，如关于国家財政；并且按照我們的願望来建立政府各个部門的永久不变的秩序，因为这些部門是关系到我們臣民的幸福和国家繁盛的"。"在政府各个部門中建立永久不变的秩序"。这句話在这个簡短的文件中提了三次之多，它是全級会議同国王合作期望达到的重大目的之一。当时的財政大臣奈克于召开会議以前一个月在給国王的报告虽然被看做是反映国王內心目的，但它实际上对此問題仍是含混其辞。奈克并沒有提到宪法二字，他只是似乎认为全級会議将会在日后定期召开，国家的秕政将会被革除，政府机构将会得到改革。政府方面也沒有再提出进一步的改革計划。但是在网球場誓言三天之后，法王就亲莅会場，在会上提出三十五条詳尽有趣的改革計划。

但是，政府方面所提出的改革方案虽是十分含混，而当时国內一般領袖人物已經有了一套具体方案，而且差不多在全級会議还沒有开会以前，那种要制訂宪法的观念却已成熟了。其中有一些最重要的观念，以后被用作宪法革命的根据。这些观念早已体现在十八世紀时的各高等法院的«抗議书»里面。法国高等法院早在革命以前已制訂出一套宪法的理論，他們还不遺余力地将这种观念向广大群众传播。

由于法国政府里面，立法同司法的职务是如此密切相联，这就无怪乎巴黎的那个高傲的高等法院要扩大它的义务和势力来监督立法。这种傾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根据法国早先就有的习惯，司法机关对于君主提交来登記注册的文件是可以提出抗議的，而且还可以要求复議。高等法院对于这种参与立法的特殊权利进

行了异常严肃的維护。他們所提出的理由不仅根据先例，而且还根据公道和权宜措施。因此，当法王和大臣們要强迫司法机关违背它的意志来将国王的命令进行登記注册时，严重的危机就往往发生。这时，法国的君主制的专制性和立法法案的真正性质的問題就十分突出地暴露在国人面前。

法国司法机关虽然承认法王是最高的立法者，但是为了要支持他們偶或对君主意志的反对，他們就提出一套宪法理論。他們自称是王国的“根本法”的保护人。他們声称他們有維护王国宪法和监督破坏根本法紀的职責。这种宪法本来也沒有明确规定，也沒有成文法典。但是司法机关却正确地指出：认为只有继續遵守某些古老的习慣，法国才能保持它的合法政府。他們有一次居然对路易十五說：“就是諂媚奉承本身也不敢硬說在个个案件中，君主的意志就能成为法律”①。但是法国高等法院好像很明白它們的主张至多也不过是建立在摇摇欲墜的基础上，因而他們始終不敢将法国的“根本大法”罗列出来，他們只是把这种含糊的主张用严正的言辞反复地提出而已。

尽管高等法院所主张的一套理論并不十分明确，但是从1716年5月以后却有許多传播很广的“抗議书”，这些“抗議书”使全国人民越来越深刻地明白政府的腐败和专制的危险。从此以后，大臣同高等法院之間常起冲突。尽管这种冲突是十分重要的，它能造成群众对政府的不滿；但是在这里我們却不去細說。现在，我們应該专門来讲一讲十八世紀时法国高等法院怎样通过“抗議书”激起了限制君主权利的要求。

下面所引的一段文字就是在网球場誓言之前七十年所发表

① 1771年7月不列他尼高等法院的抗議书。——譯者

的，里面包含有他們要求的大綱，这些要求后来在法国高等法院的宣言里分别得到发展。

“陛下，我們虽然承认您是唯一的主人、元首和立法者，并且承认法律因为要根据时代的不同、人民的需要、秩序的維持和国家的統治不得不加以改变，而且为了統治国家起见，您不得不按照向来的方法，用新的法律去代替旧的法律；但是我們始終认为我們有責任請您注意那些永久不变的法律，这些法律是和王国一样的古老。对您来說，保卫这些法律和保卫它的王冠一样重要……正是因为这些法律是永久的，您才作了我們的主人和元首。这些法律的永久存在使得我們希望这个王冠，在您这个长期的、公正的、光荣的朝代以后，将要传給您的后代。

“近来人們清楚地看出：这些古老的法律的維护对法国有莫大好处。同时也看出，您的高等法院的責任是严格遵守这些法律，它們这样作是符合于陛下的利益的，因此它們必須保护这些法律，不使它遭受任何攻击。”

高等法院声称：“就是路易十四也认为高等法院是‘王国根本法的眞正保护者，即是最专制的君主也曾认为高等法院所执行的注册法令的手續是实行一件新的法律的必要条件’”。①

由此可见，法国高等法院的地位，特别是巴黎高等法院的地位，几乎与法王本人等同了。他們的存在都是根据同样的根本法或宪法。为此，司法官认为：“王国中最重要的和最神圣的宪法”不仅规定国王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还规定法院有协同君主的立法权，国王和法院都得感謝这些凭此国王成为国王不可抹煞的法律。②

① 见弗拉麦蒙特編：《抗議书汇編》第1卷，第88頁。——譯者

② 1763年6月的《抗議书》。——譯者

所謂1753年的大抗議书曾詳細地談到君主的意志同国家法律之間的关系。这篇抗議书明白地提出了君主的意志要服从于法律，而且他們还引用路易十四时代的各种政治学著作里的話作为理論的根据①。这篇反对种种圣典的“抗議书”使得因为罗馬教皇所发布的那篇“烏尼根图斯命令”而引起的一場长期爭执从此終止。以后的“抗議书”又是关于法院同政府之間的其他方面的冲突。当时深得人心的司法机关由于对于时代的精神非常敏感，在他們的宣言中往往增添一些民主的、或者至少是群众性的色彩。于是在他們规劝国王的抗議书里，“国家”、“人民”、“公民”等这些名詞就逐漸增多起来。我們很容易看出，法国的国民反对无限的君权趋向正在发展。我认为把宪法原則說得最为明白透徹的是1771年7月不列他尼地方高等法院所提出的那篇无名的“抗議书”。“抗議书”宣称:

“随时变化的律条和国家宪法所依据的根本大法是很不相同的。就随时变化的律条来說，司法机关的义务虽然在于影响和启发君主，但是他們的意见最后还是要听从您的智慧的决定，因为只有您一个人才有管理国家一切事物的权力。但是管理国家并不就是要去变更国家的宪法……所以我們不能不将下面两种情况区分清楚。一种情况是立法机关有劝告的权力，这种权力足以启发君主，进行統治。国家統治的范围虽很广泛，但它毕竟有一定的范围。另外一种情况是对君主的权力的限制，君主的权力不能超出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宪法含有必須反对专制行为的权力。”

这段立法机关的“抗議书”所提出的理論显然是很片面的，但是它同后来人們那种将宪法和一般律条加以区别的观念却十分接

① 见弗拉麦蒙特編:《抗議书汇編》第1卷，第521頁。——譯者

近。“宪法”这个名詞不仅在法国革命以前就为有思想的法国人所熟知，而且现代立宪政府的观念在那时也已接近形成了。

在法国三級会議停止召开以后，法国的高等法院就隐然以国民代表自居，这或許就是他的要博得国民的同情，提出他們主张的根据。1787 年 7 月 16 日巴黎高等法院提出“抗議书”請求政府召开三級会議声称：“只有代表国民的全級会議才有权力給君主以必要的經費。”这个要求却获得了对于行动的意义持有相反看法的新党和旧党的一致通过，这可以說是終局的开始。

美国早期各州的宪法无疑地对法国某些有思想的讀者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澄清了他們的观念。1778 年所出版的最早的美国各州宪法的汇編就是供法国人閱讀之用的。过后不久，美国国会又重印了二百部送往法国。特戈特①、馬布利②康道賽特③等人曾經写过評論美国制度的著作。我认为无用置疑，法国国民議会里进行辩論时常常提到的美国人权宣言，并不是指美国的联邦宪法，也不是指美国的独立宣言，而是指先于美国各州宪法前言中那些关于国民权利的詳細闡明，尤其是馬薩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宪法。

美国的經驗也許可以对已經得到很大发展的法国宪法改革运动提供精确性，并增添新的力量。除此之外，我們不能說美国的范例还起过更大的影响。眞正能够說明 1788 到 1789 年間法国各阶級人士为什么对于他們的权利要有一种书面的担保的原因，不能从外国的影响去寻找，而是应該从当时法国的状况和許多事件的过程中去寻找。1788 年 5 月法国政府企图废除旧日的司法机关，

---

① 法国政治家(1727—1781 年)。——譯者

② 法国著作家(1709—1785 年)。——譯者

③ 法国哲学家(1743—1794 年)。——譯者

引起了一般人的激动。巴黎高等法院遂試图将宪法的原則詳詳細細地列举出来。他們指出：国家的“根本大法”，包括下面几个原則。

（1）唯有全級会議才有权給与君主經費；

（2）公民除非立刻送交正式法官听候审理，有权拒絕非法的逮捕。

这两条已提了人权和公民的权利，后来为議会所批准。此外，还有其他的提議，其目的在于宪法上规定君主和大臣們不能废除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享有在各省检查的君主的意志，对于那些合乎各省宪法和国家宪法的精神的律条进行登記注册的各种特权。

巴黎高等法院对于地域主义的呼吁虽然是不适当的，但是在当时是成功的。自从前一年加洛納将財政状况宣布以后，法国政府就失去了人心，现在政府又力图废除各地的法院，这就激起了各省許多事态严重的起义。在陶斐內地方“抗議书”不仅引起了全級会議的召开，而且还对全級会議的精神和性质发生了重大影响。

1788 年的起义实质上是法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各省反对政府只不过是要保护各省在次年即被永久废除的陈腐特权；但从实质看来，这种斗爭是反对专制主义。十分清楚的是，不仅要对无数弊端进行改革，而且对于君主的专制权力也要尽力加以限制，因为朝廷的大臣岂不是想凭君主的命令，用最卑鄙的手段来废除监督的机关，以便改变国家的全部組織么？因而，双方爭执之点，最初虽在保护省的权利，但实质上則是全国性的。

三

自从法王决定召开全級会議以来，国內自然是出了无数的小

册子，特别是到了1788年的下半年，出版得更多。这些小册子的作用同现在报紙上的社論差不多，有的討論代表人数的問題，有的討論国会里面表决的方法，但是也有討論全級会議在国会里所担当的任务。西爱威斯所写的那本书是很有名的，因为他在国民議会里始終占着重要的地位。另外有一本无名的不署名作者的小册子，那是在网球場誓言的前一年出版的。书中将制訂宪法的必要性說得异常明白。有人說这本书就是后来六月二十日以前国民議会里面最激烈分子拉鮑·圣艾底埃納所著的。书中写道：

"只要你的这种专制政府还继續存在，只要你还暂时信任的朝廷大臣們还想推翻现存的秩序，还想变更或废除他們先人所制訂的法律和条文，那么，你要想改革弊政和改善你自己的处境都是徒劳无益的，而且是不会有永久的結果。"

作者在叙述一部完好的宪法原則时，虽然常常提到瑞士和美国的宪法，但是很显然的是，作者认为英国的宪法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他說，宪法里应該规定要有两院制的立法机关，要有政权分立，要有內閣責任制，要有生命財产的保障，要有出版的自由等等。他这一套大綱显然大部分是从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一书中抄来的，但是在我对于当时的許多小册子进行研究后，上述的那本书好像很是例外的。苏莱尔曾經說过："法国人希望民权的自由要比希望政治的自由急切得多。"我們可以看到当时所有的著作大多討論的是財政的压迫、现存社会和现存經济的流弊，很少談到政治的改革和宪法的改革。

在人民建議书里面，也显然有这种同样的倾向。根据古老的习惯，各选区的貴族和教士以及各城乡的平民都可以訴說他們的苦衷，并提出进行改革的建議，所有的建議书都表达一种普遍的願望，那就是要求废除旁波的专制政府。我們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

例如有某地的教士团所提出的一篇建議书，第一条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該建立在含糊不明的历史传統上，而应該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那就是主持公道，維护人民福利。"这篇建議书还說全級会議不能行使任何職責，"除非已是正式承认和决定国民的权利，必須制訂出具有这些权利的宪章，并将这些权利用文字正式地不能改变地記录下来。"这几句話虽然讲得很含糊，但是这些建議书都代表了一般人民最低限度的要求。当时人們似乎都觉得只有制訂出宪法，将国会召开的日期规定下来之后，人民期望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假使个人的权利經过明白規定，而且正式地不能改变地用文字写下了，那么，人民参与商討国是，行使立法的权力便可以限制政府的压迫。当时人們认为这种办法并不含有要进行根本改革的意义。事实上，在貴族所提出的几篇建議书里面，他們也希望要使他們的特权得到保障，他們把这些特权看做是"根本大法"。他們认为这些特权一經規定，将来就不会再有人对它提出問题。泰納认为当时一般貴族，包括孟德斯鳩在內，都說法国已經有了这种宪法。他的这种說法虽然有几个事例体现出这种见解，但是在当时的建議书里却沒有得到証实。

有几个城市的建議书对于維护人身权和保障財产权作了明确的規定。例如里昂城司法区域的建議书里說道："由于专制的权力是为国家禍患的根源，所以我們首要的希望就是要制訂出一部眞正的国家宪法，将国民的权利明确規定下来，而且要制訂出法律来維护这些权利，因而我們請求对国家宪法做出决議，并送交国王批准。这种宪法的最主要的目的应該这样規定，一共有十四条，最后并附以說明，鉴于沒有一部良好的宪法，社会就不能取得幸福，因此里昂城认为在全級会議还沒有制訂出宪法以前，全級会議的代表就不得討論其他議案。"

在各种建議书里，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把两种不同的要求十分自然地，不自觉地混淆一起，也可以說是溶合在一起。第一种就是要求在所有政府各个部門同公共秩序制訂出一个不能改变的条例，另一种就是要求制訂出一部永久維护王权和国民权利的法国宪章。"国民权利"这四个字屡次提及，有时还同王权二字相提并論。但是归根結底，国民权利是不能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上面。难道有了不可剝夺的社会个人权利以后，就可以永远抵制君主专制的流弊和侵犯么？人們希望：如果国民的权利和"民約原則"一經明确而正式宣布，那么，法国的政府的基础就可建立在这些权利和原則上面。南得和墨萊两地的貴族进一步宣称："政治的原則应該同道德的原則一样都是絕对的东西。"所以他們要求"发布'权利宣言'，所謂'权利宣言'就是由国民代表以国民的名义提出一个議案，将有理性的、有知識的并具有道德观念的人类权利宣布出来，这些权利实际上在各种社会制度建立以前早就具有的。"

关于制訂人类天賦的政治权的宣言，再也沒有能比納摩尔地方的第三級人民建議书里所提的要求更为迫切的了。他們要求在全級会議一规定出人类和公民天賦的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后，法王就得制訂一篇宣言。这篇宣言要在全国司法机关里注册登記，要在全国教堂每年张貼几次，而且还要插入所有供儿童閱讀的书里。身为司法官和行政官的人們都要記住这篇宣言。这篇建議书里，同其他的建議书一样，包括巴黎建議书在內，提供了一篇詳尽的权利宣言的草案。

最后的这篇建議书制訂得最晚，直到5月5日全級会議开会时才作成。担任制訂建議书的委員会里很有几个名人，他們討論的結果就提出了在国民議会制訂宪法以前的一套最完备的宪法草案。这篇建議书的第一部分专門談論宪法方面的文章里面写道：

"在国民权利宣言沒有宣布以前，在宪法的基础沒有取得同意和稳固以前，巴黎代表不得允許政府頒发补助費或借貸国債。"在宪法草案前面附有的一篇权利宣言，它同后来国民議会所議决的那个宣言很相像，建議书宣称："这篇权利宣言应該成为一篇国民的宪章，并做为法国政府的根本。"我曾看过許多当时的建議书，其中对于权利宣言为宪法必要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再也沒有能比納摩尔的建議书里說得最明白了。这个建議不仅为后来国民議会所采納，成为附在所制訂宪法前面的一篇人类与公民权利宣言，而且后来那篇宣言里面的条文同这篇建議书的条文十分相似。我們看看 **1791** 年法国的宪法就可以知道那篇建議书所提的宪法条文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有以下几条：

"法兰西王国之內，立法权应属于国民与君主，行政权則仅属于君主一人。"

"全級会議除非常会議以外，每隔三年应召开一次。閉会时应宣布下次开会的日期与地点。"

"凡犯有企图阻挡全級会議开会之罪者，应以国家叛徒論，犯叛国罪。"

"在全級会議休会期間，政府只能发布临时条例，作为执行上届全級会議議决案之用。这种条例如果还沒有得到下届全級会議的通过，就不得成为法律。"

此外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說明建議书的草案同后来宪法相同的地方。这篇建議书宣称：现在全級会議根据上述原則所制訂的宪法必須成为国民的資产，除了立宪机构以外，不得随意加以变动。这就是說除了国民或由国民为修改宪法而选举的代表以外，不得随意加以变动。

法国人深信权利宣言是不难說明的。法国一般国民不懂重新

建立政府是有巨大困难的，而且也很少知道在宪法制訂之后，宪法一定是一篇很长的法律文件。至于法国人民虽然渴望有一种根本改革，但是他們对于改制的复杂性是不十分注意的。他們最希望获得的就是民权，至于参政权，他們則并不急于要掌握，只要能够防止旧制度不再复活就行。他們所知道的不过两三件事：就是君主和大臣們的滥用公款，以致造成国家的財政极度困难，朝廷官吏近来想擅自废除陈旧的但大体上还得民心的高等法院，以便巩固他們的专制权力，推翻宪法的保障。政府的好些措施显然是侵犯人类最显著的权利。最后，旧制度的混乱已到达足以阻止工商业的发展。即使从来沒有讀过卢騷的著作和馬薩諸塞州的宪法的人也都明了当时的弊政。拉路歇勒地方的貴族对为什么全国国民要求制訂宪法并确保民权的原因說得非常明白：

“我們认为国家的各种赋税正在强夺人民的财产；各种专卖事业正在阻碍国民的活动；政府的拘人密令正在剝夺人民的自由，使有罪的变成无罪的，将无罪的人关进监獄，而使有罪的人消遙法外。特派委員們任意停止法律发生效力，推翻法院。每个大臣都把前人制訂的办法改变了。由此看来，香比翁先生的話說得很对。

“古典的精神、对抽象理論的爱好、以及旧制度等，这些都可能影响某些建議书的制訂；但是制訂宪法这个观念并不来自哲学，也不来自高度的狂热；实际上它是来自当时广大人民所遭受的疾苦。即使沒有《民約論》，这种观念也一定会被当日时势的逼迫而传布开来。这种要求旣然很可以从当时实在混乱的王国情况得到說明，那么，我們为什么要对这种要求产生恶感呢？”

法国人早已感觉到他們的政府制度的腐败，迫切想通过限制君主的特权来保障他們的自由。他們自然而然地一定会想到制訂一种成文的保証，以使国家的主要根本大法确定下来。当时法国

人之所以强調要有一篇人权宣言，就可說明当时法国人着眼的是要制訂出一种英国式的宪章，而不是要制訂出像1791年所制訂的那种精密的宪法。米拉鮑曾經說过:“现在大家都知道法国国民所預备的这个已經开始的革命并不是因为国民的知識已經普遍提高，而是因为国民已經感悟到当时的弊政和政府的腐败。人人都知道要破坏什么，但是却沒有人知道要建立起什么”。

四

在簡括地叙述了1788年的危机和各种建議书所表示的公众精神后，国民議会的态度也就十分明白了。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級曾經宣称他們的使命在于确定国家复兴的原則。7月9日，它的制宪委員会做了第一次报告，这是一篇好报告。它将宪法即政府的制度同权利宣言区分得很清楚。报告书里說道：要制訂一部完好的宪法，“我們就必須承认天賦公道所給予个人的权利，而且不能不注意所有作为各种社会根据的那些原則”。委員会并主张为了要使大家牢記宪法的目的，宪法前面必須附有一篇人权宣言。这篇宣言不得同宪法分开頒发。为的是深怕沒有宪法的具体条文附在后面，人权宣言的条文未免太空洞了。

由此看来，人权宣言的制訂就是为了满足普遍人們的要求，所以当时代表中很少有人不贊成的。8月4日，国民議会全体一致議决要在宪法前面附有一篇权利宣言。关于这篇权利宣言內容的討論，我在这里无需叙述了。8月26日，这篇宣言已經被最后确定下来。为了制訂这篇宣言，他們曾花費十四天的功夫。这些时間难道是白費的么？或者比白費还要无益么？难道代表們专門在研究含糊的抽象理論，而牺牲国家的利益，使国家的禍患变本加厉么？或者宣言的这些原則，全面来看，难道不是正确、全面，不是理

想的么？难道它不是以国民的多年經驗做依据，适宜于为将来制訂伟大建設的规划么？

为了回答这些問題，让我們再三地讀一讀那篇宣言，这是一篇簡短而有教益的宣言。

“組成国民議会的法国国民的代表們深信对于人类权利的无知、忽視或藐視，是造成国家灾害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为此，我們决定将人类天賦的、不可剝夺的和神圣的权利在庄严的宣言书里逐条宣布，使社会的成員們可以經常看到这篇宣言并能够永远記住他們的权利和义务；使立法机关的行动和行政机关的行动随时可以与各种政治制度的目的加以比較，可以更加受到人們的尊重；使公民根据下面朴实不变的原則提出申訴，便于維护宪法，增进全民的幸福。为此，国民議会在上帝面前，承认并宣布人权和公民权如下：

第一条　人类生而自由，而且永远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的权利。社会地位的差别只能是建立在全民利益的基础上面。

第二条　所有政治組織，其目的皆在于維护人类天賦的和不可剝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第三条　所有主权的根本都是属于国民全体。团体和个人除非直接接受国民的委托，都不得使用任何权力。

第四条　自由只在于不妨害他人的自由条件下自由行动。因此个人在行使他的天賦权利时，除了有确保社会上其余成員享有同等权利之外，沒有任何限制。这些限制只能由法律来决定。

第五条　法律只能禁止那些对于社会有害的行动。不能阻挡人們去做法律所不加以禁止的事情，不能强迫人們去做法律所沒有规定的事情。

第六条　法律是公众意志的体现。每个公民都有亲身或派代

表参加立法的权利。每个人应受到同样的保护或懲罰。对于全体公民都必須一样。所有公民既然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他們除了道德和才能有些差别之外，他們就該根据不同的能力不加歧視地有权充当所有显职和官吏，經营各种事业。

第七条　对任何人除了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續外，不得加以控告、逮捕或监禁。无論何人，請求、传达、执行或主使执行非法命令，都应受到懲办。但是，无論何人，根据法律被传或被捕时，应該立即到案候审，因为抵抗就是犯罪。

第八条　法律只能规定那些絕对的和显然必要的刑罰；无論何人，除根据犯罪以前所通过的和宣布的法律处以刑罰外，不能受罰。

第九条　无論何人，在其未曾宣布有罪以前，都是以无罪論。假使认为有必要加以逮捕，除了那些保全人身所必要采取的措施外，所有严厉的手段都应严加禁止。

第十条　无論何人，不得因为发表他的见解，包括他的宗教见解，而受他人的干涉，但是这些见解的发表必須以不扰乱法定的秩序为条件。

第十一条　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換是为人类最可宝貴的一种权利。因而人人都可以有言論、著作和出版的自由。但是必須对濫用法律所规定的自由負責。

第十二条　人权和公民权的确保不能不需要建立国家的軍队，这种軍队只得維护公众的利益，不得維护那些受托管理軍队者的个人利益。

第十三条　全国国民必須繳納公稅，作为維持軍队及行政費之用。这种公稅应該依照公民的财产合理分配。

第十四条　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派代表議决繳納公稅的用

途，而且有权规定征税数目的多寡，分摊和征收的方法以及征税期限的长短。

第十五条　社会有权要求每个官吏汇报他的行政情况。

第十六条　一个社会假使对法律的遵守并无保障，三权鼎立并不明确，那就是根本沒有宪法。

第十七条　既然财产是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权利，那么，除非經过法律上的决定，为了公共需要而加以征用外，无論何人的財产不得被人剝夺；即使有这种必要时，也必須事先給产业主一种公平合理的賠偿。

上面所說的 1789 年的原則岂不是可以代表现在欧洲各国政府的最普通的原則么？但是这些原則在十八世紀时除了英国以外，所有欧洲的政府都是忽視的。塞格諾博斯先生曾經說过："十八世紀当一个法国人在研究各种政治問題的时候，在他們看来，当时大部分的制度都是一些与理想和人道相违背的弊端"。如果我們对于人权宣言的看法不受那些漫不經心的、持有敌对态度的批評家的影响，也不受当时在国民議会里的西爱威斯等人辯論的影响（这些辯論的无聊实在是近代国会討論中所少见的），那么，我們岂不就会把这篇宣言看成是一篇改革腐敗政治的珍貴的、簡明的抗議么？我們岂不是看到在宣言的每条条文背后隐藏着国民多年的疾苦，国民都希望获得維护宪法的全面保障么？

显然，这篇宣言是折衷各种建議书的結果，它反映了各种建議书复杂的內容。有人认为只有先把人类的权利一一列举出来，人才能成为在社会里生活的人；有人认为只有締結了"民約"，人才能获得人权；也有人认为只要制訂出那些有关于改革当时制度的一般原則就行了。看来持有最后一种见解的人終于取得了胜利。当議会进行討論的时候，主张最后这种见解的人虽然在議会里进行

辯論时不能同那些专讲理論的人們那样突出地引人注目，但是最后那篇宣言草案显然要比从前的几个草案更为优越，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議員們的常識，因为他們能够将狂热的代表所发的空論抑制下去。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在1791年的宪法中，这篇人权宣言的下面即紧跟着关于旧制度中許多最严重的弊端的废除，再下面接着就附有一篇受到宪法保障的天賦的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在当时議会中最伟大的政治家米拉鮑看来，这篇宣言在理論上就是“对于一般原則的說明，它适用于各种社会和各种政体。”但是为了要挽救当时已經陈旧、搖搖欲墜的政治組織所发表的这些原則，这就絕对有必要将这些原則，使之服从于并适合于当地的許多情况。他說这篇宣言的目的并不在要教国民記住那些来自书本和抽象的东西，而是在于教国民記得他們自己所經历过的事情。因此这篇为政治机关所不能背离的人权宣言只是要表达它的观念，而不是努力去对人們讲授一种科学。

他說：“这就是最主要的区别。既然自由决不是一种来自哲学演繹的理論的結果，而是来自日常經驗和由重大事件所引起的推理的結果，那么，我們对于事物了解得越清楚，我們也就越接近于对自由的推理。……这就是美国人制訂权利宣言的方法。他們故意将理想放在一边，但将政治真理宣布出来，其目的在于要明白这些真理，其中自由这个东西只有国民才把它看得最重，而且也只有国民才能够維护住它。”

第八章　用历史眼光来看保守精神

一

人类开始有历史已經很长久了。最初的人类不过是非洲森林里面类人猿中的一种，能够用两条后腿走路，两条前腿慢慢的变成灵巧的臂和手了。这种新动物有一个好的、大的脑袋，能够用手做許多的事情，这就产生了一种傾向，使他利用他的手作出許多新奇的事情。他偶然将火石块投入火中，他看出火石裂成几片，这些石片可以作雕刮之用。这大概就是他所最早制造的工具。他的形状怎样，究竟是不是同现在的类人猿一样，遍身生毛，栖于树上，我們无法去断定。据法国的著名考古学者德·墨提萊的推測，在河边堆积物中所发现的最古的石器，大概制作于二十四万年前。假使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們，那就还要加上二十五万年，那么，我們可以断定，世界上的人类至今至少应該有五十万年[①]。虽然我們不能确定史前期的准确年代，但是对于生物学和史前考古学有研究的人，断不会将这个时期加以縮短。假使我們将各种岩穴里面的遺迹研究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远古的人类在很长时期，除了斲削石器的技术、各种石器的形式、骨器的装飾以外，人类在其他方面幷沒有进步。一直到了一万年以前，所謂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有了陶器、农业和住宅。北美的土著，当十五世紀欧洲人前往时，还是处在新石器时代。

① 见德·墨提萊所著《史前史》(1901 年出版)第 363 頁。——譯者

因为这些关于人类过去的事实都是近年来的发现，所以它們到如今还沒有将我們的思想根本地改变一下。来尔的名著《古代人类》那部书本(1863年出版)第一次将人类很古这个学說对英国讀者发表出来。从前奥古斯丁为了要証明犹太的先知年代最古，遂駁斥《几个說謊的人》中所說埃及人考察天文已經有十万年之久那句話。他嘲笑說："上帝造人类距今不过六千年，埃及人考察天文怎么会有十万年之久呢？"① 这位著名的教会长老的計算后来到了十七世紀克伦威尔时代有一个大主教名阿歇尔，又加以縮減。他說所有世上动物的造成和人类的祖先亚当的出现是在紀元前4004年10月28日的星期五那一天。亚当虽然是一点經驗也沒有，但是上帝却叫他来訂正全部的动物名詞。那天还沒有过去，上帝又造了一个夏娃来安慰亚当的寂寞。两人的結婚那件事情是第一个礼拜最后的举动。虽然有几个哲学家和研究初期教会的宗教家对他这話表示怀疑，但是十七世紀的新教徒因为他說得确凿，倒很相信他。直到后来的达尔文、赫胥里② 一班人类学家出来，才将我們的历史观念根本改变了，到如今才不过五十年。

为了要明了人类历史非常悠久的学說对于我們现今所处的地位、我們同过去的关系、我們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些問題的重大影响，我們可以用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說明现代历史的概念。我們假定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压縮到十二小时之中，而我們假定现在是正午的时候。人类的历史，为了便利起见，就少算一点，假定它为二十四万年；那么，每一小时代表二万年，每分钟代表三百六十二年又四个月。关于十一时三十分以前，我們一点記載也沒有。我們不知道那时候有什么人和什么事，我們只能推想那时候地球上是有人

① 见他所著《上帝之城》第18章，第40节。——譯者

②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1825—1895年)，創立进化論。——譯者

的，因为我們现在寻出他們的石器以及他們所画的巨象和野牛等图画。到了十一时四十分的时候，埃及和巴比伦文化的遺迹才开始出现。希腊的文学、哲学和科学，我們习慣上所指为“古代”的，到如今不过七分钟。培根写«論学术的进展»的时候，离今不过一分钟。人类发明蒸气机，离今不过半分钟。我认为这种压縮式的表解，并沒有費解之处。因为这种計算法比全部的画像容易領会、容易想像。人类历史的全部画像是如此的超出我們經驗之外，以致实在不易領会。

依照上面的說法，我們可以得出两点明显的断語：第一，就是我們所謂古人例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希巴鳩斯、魯克萊提斯等人，实在是我們同时代的人。他們虽然在阿歇尔大主教的眼目中看起来，无論怎么远，他們总是我們同时代的人物。我們沒有理由可以說他們的脑筋比我們坏，或者比我們好。只有在知識方面稍有不同，因为自从他們的时代以来，知識一直是經常增加的。第二，我們可以看出人类的进步，最初非常慢，差不多过了几万年，看不出有什么进步。到了后来，一天加快一天。居住在堆积层里面的我們的祖先，用一种石器作拳斧，用了有十万年之久，也許很为滿意。据約翰·路卜克爵士的推測，这种拳斧用途的广大同现在小孩所用的折刀差不多。到了后来，他們慢慢地知道用火石和骨头制造刮刀、鉆子、箭头、叉头和粗針等物。但是我們到了十一时半的时候，才发明陶器，而且开始有了家畜。至于使用青銅和鉄来制造器皿和工具，那就更晚了。而且青銅时代的人对于石斧还存有一种虔誠的心情，一般的僧侶在金属工具发现后，还用石刀来宰牺牲。

据我們所知道的，能够自由思考的人要以希腊人为最早。希腊人在伦理学、哲学、邏輯学和数学等各种学問方面表现了人类的

思考能力。但是他們对于周围普通事物的重要性，却并不注意。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实用的技术都已經被发现了。他认为这种技术应该由奴隶去做，而哲学家則应該专門研究理想生活的原理，即善、眞、美。在亚历山大城，我們所謂实用的科学，虽然有点进步，但是当时的状况实在不方便。人类应付需要的方法在罗馬时代也并沒有比亚里士多德集希腊思想大成以前好得多。教会的伟大神父如：雅魯姆[①]、奥古斯丁、安勃罗斯[②]等人，虽然沒有說物质的东西絕对是坏的，但是至少他們对于物质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他們所注意的是灵魂和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超出知識之上的。同时代的新柏拉图学派学者們主张最高的眞理是从先觉而来。理性所能发现的，至多不过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当时新柏拉图学派的人們和基督教徒都专門研究神迹、魔术和神术来增进人类的宗教兴味，他們絕对不去研究上帝所造的世界。这就是中古时代初年所接受的遺产。当时，大部分教会初期神父时代的学說都被忘記了，教科书里面只保留了一些一知半解的、杂乱无章的、錯誤百出的希腊知識。他們认为自然世界至多不过是一种比喻，所有矿物都具有一种德性和魔力，同化学物理无关。以传說中獅子的习惯来比喻耶穌的死而复活；以鵜鶘的习惯来比喻我們的依賴过去。十三世紀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学說被重新发现。各大学里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說十分尊敬。当时多米尼克派僧侣“伟大者”阿伯特[③]和托瑪斯·阿奎那又对这些著作做了詳細的解說。但是他們的解說对于自然的研究和应用知識来增进人类的物质享受反而产

---

① 罗馬帝国末年神学家(331—420年)。——譯者

② 罗馬帝国末年神学家(340—397年)，曾任米兰主教。——譯者

③ 中世紀德意志著名經院哲学家(1193?—1280年)。托瑪斯·阿奎那的老师。——譯者

生了一层障碍。因为所有亚里士多德的錯誤和后人的解說中的錯誤，从此以后，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据我們所知道的，罗哲尔·培根是第一个表示深信实驗科学具有伟大的前途的人。他說当时的大学与其咬文嚼字地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的坏譯本，还不如将所有这些著作焚毁了好。他說，亚里士多德固然知道許多东西，但是他最多不过是种了一棵知識的树，有許多枝叶还沒有生长出来。“假使我們人类还要继續无限地生存下去，我們断不能希望对于所有可以知道的东西都有了完美无缺的知識”。他又說，有知識的科学家应該懂得老农和老妇所知道的簡单朴素的东西。罗哲尔·培根生于六百年以前，虽然有許多地方还局限于当时的見解，但是他却是第一次說明了未来人类的幸福在于研究普通的物质的东西。他預言說：将来实驗科学能够使人类可以不用橹桨去搖船，可以不用牛馬去拉車，而且速度还大大增加；可以发明飞机，同鳥一样在空中飞行；造桥可以不用支柱，跨在河上。

当他說这些看起来好像幻想的話的时候，如果用我們压縮的时代表来計算的話，距今不过二分钟。离今一分钟的时候，才有人重視他的話。在新教徒領导人的心目中沒有什么我們所謂进步的观念。路德把理智看成“是一种美貌的蕩妇”，它蠱惑我們的心灵，使我們不能明了上帝在圣經里面所启示的眞理。梅兰克吞曾經很热心地校訂了一部古代星占学。喀尔文說人性是恶的，并且是腐敗的，它本身絕对沒有改过向善的能力。但是离今一分钟的时候，出现了庞波那兹①、布魯諾②、法朗士、培根和笛卡儿等人，他們推翻

① 意大利哲学家。——譯者

② 意大利哲学家，因堅信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論，同旧說展开斗爭。1600年被天主教会焚死。——譯者

了中世紀經院哲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破砖烂瓦所建立的堡垒。他們主张运用理智，反对盲从古人。笛卡儿在《寻求眞理的方法》这部名著中的最后說，他著这部书所以不用他的耶穌会教师們所用的拉丁文，而用本国的法文写的緣故，就是为了讀者能够开动自己的脑筋，而不去死啃古人的书本。在此以前，培根的名著《論学术进展》也是用英文写成的。他老年时所著的《新工具》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在这两部书里，他研究他所謂的"人的王国"。奥古斯丁却只知道有上帝的王国和魔鬼的王国。培根首先将实驗科学的伟大前途用他优美的英文加以宣传。他說："古人是值得尊重的，我們人类应該根据他們的成就去发现最好的方法。但是旣然发现以后，就应該前进。正如古語所說：古代产生新世界。这些时代是古代，因当时世界本来是古的，并不是由我們自己向后計算起来，才算是古的……

"还有一种錯誤，同上面所說的有密切联系。那就是存有这种幻想：以为古人的意见和派別，經过分析整理以后，最好的被保存下来，而其余的都被抛弃了。所以假使有人要想从事于新的研究，就往往遇到被前人所抛弃的东西。好些东西因为被大家所抛弃，因而也就被忘記了。广大的群众，或者最聪明的人似乎对于浮在表面的东西允許它通过去，而对于实在的精深的东西，反而加以阻止。因为实在說来，时間这样东西，好像是一条河流，它将輕的、浮的东西带下来，而重的、实的东西都沉沒下去……

"还有一种錯誤，就是过分重視人类的心灵和人类本身的研究，而忽視对自然的探索和对經驗的观察。他們专門在他們的思想里面翻来复去。对于这班为人普遍认为是最高尙、最神圣的哲学家們，赫拉克利图斯曾經說过一句很公平而利害的断語：'人类往往不在大而普通世界里面求眞理；偏要在他們自己那个小世界里

面求眞理。’由于他們不屑于一顧上帝所創造的东西，因而也不願去研究它了。

“但是最大的錯誤却在将知識的最終的目的弄錯了。因为人們希望获得学問和知識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有的是为了好玩；有的是裝飾門面，爭取名誉；有的是为了同人进行爭辯；而大部分人則是为了从中取利和自己的职业。很少有人肯为了人类的利益和应用去运用他的天賦的理智。大部分人好像把知識看做是一张臥床，用来休养自己的研究精神……或者把它看做是一个商店，为了发財致富而并不是把知識看做是一个增进人类幸福和发揚上帝荣耀的仓庫①”。

培根批判了人們的崇古思想，他指出，这实在是根据一种錯誤观念。古人旣然生在我們之前，当然不能希望他們在知識和經驗上和我們一样。培根要求当时在大学里的人們不要再去崇拜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注解者，不要去在他們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里面翻来复去；而是要去研究周围世界的实在东西。要研究这种东西的目的在于希望增进人类的幸福。培根同摩尔一样，也写过一部«烏托邦»，书名«新大西島»。在他那个烏托邦里，有个中心的机关，那就是一个国立的科学院，在科学院里面进行种种的实驗，目的在于用科学发明来增进人类的幸福。后来有人批評培根，說他自己对于科学并沒有什么眞正的貢献②。这种批評也許是公正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他自己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宣传員。他是一个吹鼓手，宣布我們时代的开始。

培根所著的«論学术进展»出版于1615年。我們可以說：人类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求进步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学說从

① 见所著«論学术进展»第1卷，第5章，第1—11节。——譯者

② 德拉波所著«欧洲思想发达史»中，即有此种論調。——譯者

少数思想家心中明白地产生的时候，到现在不过三百年。把这个伟大的观念普及于社会，培根的功劳最大。这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它給我們开辟了一个无穷的远景。

人类可以有意識地推动进步这个观念，不但是很新，而且只能在一种动的社会环境里面才能发展起来，而且是和历史发展的眼光同时发展的。希腊的思想家就沒有这种观念。希罗多德虽然知道希腊的文化淵源于埃及，柏拉图常常提到埃及，但是他們始終并不明白我們所說的进步。亚里士多德虽然知道希腊哲学是从爱俄尼亚哲学发展起来的，但是他始終沒有表示他曾想到人类能够无限地去发现眞理，而且他也并沒有培根的那种兴趣，把自然科学的結果应用起来以增进人类的幸福。魯克里喜阿斯[①]是西塞罗时代的一个伊壁鳩魯派哲学家，虽然他曾猜想人类經历过石器时代、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但是他的哲学思想中并沒有进步的概念。他认为：假使人类看出宇宙是一种原子偶然結合的結果，有一定的种类，服从一定的規律，他們当然就可以认識宇宙。但是魯克里喜阿斯认为认識宇宙的目的无非是不再怕神和怕死。他始終在他的机械的宇宙观里面，并沒有发现人类进步这个东西。他反而有一种退化观念，认为宇宙的将来必有一天完全瓦解。总而言之，希腊罗馬的哲学家和中世紀时代的神学家一样，都认为文化是一种停滞不变的东西。

奥古斯丁和他的弟子阿罗修斯給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他們认为从伊甸园起一直到阿拉利克攻陷罗馬城止，所有的历史无非說明上帝和人类的关系。但是他們不但不明了人类有悠久的历史和过去的进化，而且对于将来的进步，他們也絕对沒有看到。

---

① 罗馬詩人(公元前95—31年)。——譯者

因为在当时这些热忱的基督徒的心目之中，沒有一件世俗間的改良是可以和死后那件事比起来更加重要。他們认为，到那时候无論何人总要永登天堂，或者永入地狱。因此，在十七世紀初年以前，欧洲人所努力追求的，就是竭力去达到过去所规定的标准。无論什么制度和信仰，只要經过长久的时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现在的东西如能同过去一样好，那就幸运极了。自从布魯諾和培根等人出世以后，权威和习慣势力才开始衰落，虽然还有那些自以为是拥护上帝的安排的人們出来反对他們，把他們看作不信宗教者、自由思想家和唯理主义者。

打破权威的思想，发展得非常快。这种思想是一种新思潮，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到了十八世紀，发展得更快。意大利法学家貝卡利亚①，当他提倡修改残酷的刑律的时候，就預料到有一班守旧人士一定要說他所要废除的是古代传下来习慣。他請他們注意过去这样东西，始終是一个謬誤的大海洋，它偶然露出一点眞理来。在法国大革命初年，在一种最不利的情况下，康多塞② 曾經有一篇有名的文章，說明人类的进步是无穷尽的。他想将人类走向眞理和幸福的步驟說得非常明白。他說："这种关于过去人类和现代人类的观察，可以引出确定新进步和調和新进步的方法。这种进步仍旧可以希望继續前进，这就是我工作的目的。他的結果是要根据理想和事实来証明人类能力的完成是无止境的，人类的完成是眞正无穷的。这种完成的进步，既然离开所有限力而独立，除地球不能永續以外，是永无止境的。"

把人类的眼光从过去轉向未来的学說，在十九世紀由于科学

① 著有《論犯罪与刑罰》一书。——譯者

② 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1743—1794年)，著有《人类精神的进步》一书。——譯者

发明，它的力量更加壮大。这些发明証明了：第一，科学的发现使人类关于世界和自己地位的知識，比从前大大增加了。第二，人类应用他的知識来改进生产方法，使得古代的制造、运輸和交通的方法，显得粗笨陈旧。第三，达尔文、莱尔、柏泰斯[①]、赫胥里、摩提莱、赫克尔[②]同其余的一班人，主张在未有文字記載以前，人类已經証明自己具有惊人进步的能力。他們认为人类不但可以由野蛮进入文明，而且能够从动物的地位变为人类。人类的祖先不但是用四足走路，和动物共同野处，而且根据达尔文的推測，人类的祖先或者是住在水中的一种还沒有脊骨的蝌蚪。罗哲尔·培根、法朗西斯·培根、笛卡儿、貝卡利亚、康多塞这班人都竭力主张人类的知識是可以无限地增加，而且可以利用他們的知識来扫除旧日的偏见和习慣，来增进人类的幸福。十九世紀的人們已經証明了人类的知識是千万年来学习的結果，人类的生活状况是千万年来改良的結果。但是以前的人类进步都是不自觉的。到了现在，进步这个东西才第一次变为一种有意識的努力和追求。所以在人类历史的十二小时中，无論有了哪些进步，只是到了十一点五十九分的时候，人类才来自觉希望进步。到了现在，人类才知道他是能够自由地进步的，而且是正在进步的过程之中。这件事，照我看来，是历史給我們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訓，也是对我們的行动最重要的指針。

二

假使我們前边所說的社会改良已經被大部分思想家看作是人

① 法国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1788—1868年)。——譯者

② 德国生物学家(1834—1919年)，著有《宇宙之謎》、《人类发展史》等书。宣传达尔文主义。——譯者

生中一件最有关系的事情，那么，历史的最高价值，岂不是就在于能提供給我們一种进步的技术么？我們对于历史岂不是应該特別注重那些与社会改良有关的事实么？历史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經常被一班守旧的人們利用来証实他們的主张；至于激烈派則往往不注意历史，他們或者认为这是守旧的人的武器，就加以抛弃。就是到了现在，急进派人士們还沒有看出对历史的眞实理解对于他們是有何等价值。实在說起来，历史应該是他們的武器，他們应該从守旧派的手里把它夺取过来。历史的鋒芒，在过去一百年中，磨厉得更加銳利了。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說明如何去利用历史这个銳利的武器去击退守旧派。

据我所知道的，普通人对于守旧和急进两种性格，并沒有加以滿意的分析。人們普遍认为：所有男女一生下来就有保守的和急进的区別，而且就我們的动物性看来，我們的勇气、精力和自信力都大不相同。但是据我看起来，即是最极端的人物和今天最野蛮的人的区别，完全是因为教育的緣故。即是近日已經絕种的塔斯美尼亚地方的土人，虽然还处在旧石器时代，他們的文化也是經过多年的发展的結果。现在那些眞正沒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甚至連造句的能力和用貝壳削木棍的能力也都沒有。照这样看起来，大部分所謂守旧派和急进派可以說是广义的教育的結果，包括他們自小和文明人接近所得的一切东西。我认为近世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会同意这一点的，即至少凡是自由研究这个問題的人們一定会承认所謂天性这样东西，大部分实在是教育、直接的和間接的教育、有意的或者大部分无意的教育。

现在，那些保守的人們常常反对一切改良措施，他們认为改良就是对人类天性的改变。他們自翊懂得人类天性的特点，认为人类天性既然不能改变，那么，一切改良的措施显然就不能实行。蒙

坦曾經对这論点加以駁斥。他說：我們假使看看那宏伟光明的自然界，就可以看出它的复杂的现象是如此普遍地、长久地存在着；所以某一个人或甚至他的王国同自然界比較起来，不过是一个針头而已。但是现在我們有一种新的理由可以引用了。无論现在动物学家对于特性遺传的学說贊成与否，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断定文化的分子可以一点一点地进入我們的血液里来。文化这样东西，或者是由模仿而来，或是由教育而来；假如沒有模仿和教育，文化就要消灭。这一点塔德已經証明了。我們虽然将我們父母、祖父母、同远祖的能力继承下来，但是除了通过模仿或竞賽以外，那种能力在他們的身体机能上，断不会生出什么影响来。可见急进派要想改革的，和守旧派要想卫护的东西，并不是人类天性的那些特点，而是人类教育的人为的結果。因此，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于保守派的人类天性这种說法可以将它根本推翻。只要同他們說：人类的习慣、制度和感情始終是复杂的，而且研究胚胎学的人可以証明保守派誤以为永久不变的天性，实在是人为地得来的，是不能遺传的东西。而且我們假使能够証明像蝌蚪的无脊椎的水虫可以演变成臥在树上的类人猿的动物，类人猿的动物可以演变成削石的工匠，能够在洞穴上画牛鹿的像，从削石匠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能够說明石洞中充滿了保守派那段动人的故事的柏拉图；那么，人类天性是固定的說法，是否能成立呢？

从科学和历史看来，把某个时代人类的行动和思想看成是体现人类天性是正常的和不变的原理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历史和人类学都可以証明后代的一切都由前代继承而来。就是在进步最快的社会里也是如此，而且我們有理由断定，假使一个社会的环境沒有什么变化，而且沒有外来的扰乱，这群人的文化也就会永不变动。我們上面曾經說过，进化思想最近已为少数思想家所接

受。最近五十年来，人类的思想和制度、知識的性质和范围所发生的变化，若同数千万年积累的遺产比較起来，当然是很少的。为了将我們对古人的依賴的性质和范围弄明白，我們可以想一想：我們的語言、文字、法律、以及政治、社会制度、知識和教育，我們对于这个世界和未来世界的看法、我們的嗜好和滿足嗜好的方法等等就够了。原来在各方面都有一种过去的势力在統制着我們，我們自己并不觉得，而且也并不加以反对。大体說来，我們依靠着过去。即使是最急进的人們的思想，也往往不能超出他們所接受的过去的思想和习慣之上。我們一旦領会了这个眞理，我們就可以庆幸自己，我們虽然是一些可怜的智力低劣的矮人，但因能够站在巨人的肩上，能够高瞻远矚，看到我們立在地上所不能看见的东西。或者我們可以磨断自己的鎖鏈，而且像普洛米修士① 一样，要摆脫那块过去的巨石，以挽救自己在困难中的子孙。

他将法律和权利传給自己，
好像一种永远继續的疾病。

无論我們是贊美过去，或是咒駡过去，我們总是过去的子孙；而过去把我們培养起来。这就是我們的处境。无論我們怎样急进，只能沿着过去那条路走去，我們好像是在籠中跳竄的松鼠。

至于历史究竟同进步的原因和技术有什么关系，我們这里不去討論。但是我們可以說一說我們的现代眼光对于保守思想有什么影响。約翰·摩利曾經将保守派的嘴脸加以如下勾画："他对于在别人看来絕不能容忍的现象，他却具有无限的耐心；他对于不十分可信的东西和十分无用的制度却力加卫护。他抽象地贊成进步

① 据古代希腊神話，宙斯神取去人类之火。普洛密修斯乃用茴香杆向日取火。天神怒，以鏈条縛之于巨石之下，并命巨鷹一日咬其肝以苦之，卒感动天神之心，而被释放云。——譯者

和改良。但对于每个进步的建議却很冷淡而且加以反对。他的渺小希望是生活能够有一天好起来，但是他的大主见却是生活要一天坏一天!”这类人不但现在为数甚多,还受到尊敬。其中包括教士、律师、教师、新聞記者以及政界和工商界人士。其中有些人对于改良事业惶惶不安,但又不敢直言反对。他們一定想出許多理由来加以表白,或者把别人所作的改良說成是他們自己的功劳,或者挖空心思作一些无关重要的改革。他們对于一般青年发表演說时，先加以警告,称贊过去,对他們进步的斗争却加以劝阻。保守派是数千年来的产物，当时还不知道人类有可能进行有意識的改良。他們用过去的标准,为现代的状况和思想进行辯护,而不拿现在同将来作标准。他們并不明白过去曾經有过許多重大的进步，也想不到假使沒有人把他們所代表的保守精神故意培养起来，社会可以迅速地得到改善。

我們假使将保守派所借以为自己辯护的那句“人类天性”的話推翻之后,他們一定会被我們激怒起来,反过来质問我們,“究竟进步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論什么人，假使他知道我們现在文化仍是处在比較幼稚的状态,除了希望将来以外,可以安慰我們的地方实在很少,而我們四周围可以改良的机会如此之多,恐怕再沒有心思去給“进步”下一个定义。我們要問問保守派，现在究竟哪件事情不需要改良?

保守派还有一个自慰的东西，这也是他們最后引以自慰的东西了。他們可以极力贊成地說:我們已經有了許多改良,而且竭力說，他們对于我們的各种合适的进步异常滿意，不过怕进步太快了,容易向前跌倒,所以自願来做一个車閘。但是問題是，这种車閘有存在的必要么?难道急进的人們曾經有过掌握大权的机会么?恐怕保守派不见得能够在历史里举出几个例子。但是他們一定

要說法国革命的恐怖时代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这个果然是历史上最好的例子，但是，不料那个时代的牺牲者卡米叶·德莫林将法国革命那个恐怖时代的罪过很有理由地完全归到当时的保守派身上去。我也以为所有学者都要同意恐怖时代种种激烈的举动完全是被那个无能的、欺詐的路易十六世和他那班受普、奥两国君主帮助的逃亡貴族所激起来的。无論如何，德莫林曾經說过：为自由而流的血同为維持君主或教士的領土和满足他們的野心而流的血比較起来，眞是微乎其微了。

照这样看起来，就是保守派最喜欢举的这个变化最快的例子也經不起我們平心的仔細研究。而且我們可以說，进步的战車好像攀登险峻的山坡一样，保守派那种車閘不但无用，而且誤事。馬特林克曾經說过：我們切不可怕走得太远或者太快；照过去同现在看起来，实在沒有理由可以使我們生畏。不但如此，他还說："我們的周围已經有足够的人們，他們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扑灭我們所点的火。所有十字街头那几条通向将来的道路上，总有千人站在那里保护过去来反对进步的精神。我們可以不必去怕古代的好处沒有充分的保障。我們中間最胆小的人所能做得到的，至少不要再把許多重量加到过去的上面就好了。"

历史，人类的和有机世界的全部历史，实在可以使保守派羞愧得无地自容。馬特林克所著的《我們的社会責任》一书里，对将来充滿了神秘的希望。他认为过度的急进精神，或者是生活平衡上的一种必要的东西。他說："我們切不可对自己說：最好的眞理常常在溫和主义或者平均主义里面。假使大多数人的思想水平并不比实际需要更低，这句話或者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其他的人的思想和希望应該比普通人高一点的理由。今天所謂平均，所謂溫和，到了明天就可以变为不人道的东西。当年西班牙的异端裁判

所存在的时候，一班好心腸的和公道的人都說异端不可烧得太多。那时极端的、无理的主张，就是連一个也不应該烧死”。

此地我們又可以从历史里面举出几个实例来，在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看来，沒有奴隶的社会是不可思議的。亚理士多德认为奴隶这样东西是人类社会里必要的附属品。照教皇英諾森三世的眼光看来，要使教会里面沒有貪污的恶习，这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照黎賽留① 的想法，外交上沒有賄賂是一种神話。照貝卡利亚看来，审案时不用刑訊和沒有腐敗的法官，这是一种梦想。在富兰克林② 时代，假使有人說在費拉德尔非亚地方的人可以和密士失必河以西的人說話，或者花費极少的錢，就連极貧困的人也不觉得太貴，就可以将一封信送去世界各地，人家一定会說他是一个疯子。但是这些沒有希望的、奇怪的幻想居然在一百年間都实现了。

对于这些进步，保守派一向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或者因为他們的性格是如此，或者因为他們的无知，或者由于他們的絕望。但是我們应該原諒他們，因为他們实在是不懂什么。他們并不知道他們自己就是过去数千年的遺迹。但是，历史这样东西，现在好像表示我們原諒他們的时期已終止了。因为他們所主张的人类天性不能改变的想法已經破产，并且他們以事鬧自居的信仰，现在都被推翻了。

总而言之，保守派实在对过去沒有正确的理解。从前急进派往往求援于将来，到了现在，他們可以用过去的成就和现在的成功来为自己辯护。他們可以指出：哪些事情是曾經做过的；哪些事情是正在做的；什么事情是应該做而尙未做的；而且最后，他們将开始明白事情应該怎样去做。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說明那些

① 法国路易十三世时代的宰相(1585—1642年)。——譯者

② 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家(1706—1790年)。——譯者

曾經做过的事情。假使我有工夫，我很可以説一説，知識的进步和应用知識来增进幸福，在这些方面，现在都比从前快得多。不过这一点，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用不着我去証明。几年以前，有一位法国文学家布魯美提[①]宣言科学已經破产了。他説这句話的时候，正是鐳将要发明的时候，这个元素只要我們能够控制和利用它所含的力源，很可以再在人类变化史上开辟一个新的紀元。他説这句話的时候，也就是白血球的作用将要发明的时候，这个发明为医学界开辟了一个无穷的远景。所以会説科学破产的人，只有那一个可怜的气餒的文学家罢了。现在对于科学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我們对于有机的和无机的世界的理解现在不过是刚刚开端。

但丁在他的«神曲·地獄篇»的第四段里，将地獄的內容描写过一番。他听到地獄里各种长嘘短叹的声音，使地獄中永久的空气振动起来。这种声音是从一班吃苦的男女老幼的口里发出来的。他們虽然説是无辜的人，但是因为他們生在正确的宗教[②]沒有出现以前的緣故，因此就被罰入地獄了。他們住在那里都已絕望的了。但是在那黑暗之中，他看见一片征服了黑暗的半球的火光。在火光中，一片开闊、光明的高处的綠色草地上，坐着一班眼光迟緩而严肃，看来形像威严的人們，他們不大說話而且声音很低。这就是古代的哲学家、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学家。他們无忧无虑地在那里高談闊論。不管小孩子悲啼，也不觉得他們下面有可怕的地獄。他們不知道地球的那方面有一块登入淨界的高山，有一班人在那里想爬上去，但是天堂是始終走不到的。他們何必多管閑事呢？他們自己岂不是已經安然居住在那个适合于他們的天堂之上么？

---

① 法国批評家，曾任«二世界評論»主編。——譯者

② 指基督教。——譯者

至于要用我們集体的力量去实现大改革——如废除貧困、疾病和战爭，同增进幸福的、合理的生活——这些事业，假使我們沒有明白上面所举的理由，好像是无法想像的。以前人类的領袖往往把过去作为自己的标准和理想。保守派的祖先实在可以追溯到人类最初的时候。至于把将来作为根据的改革家实在是现代的产物。这种人一直到十一点五十九分半以后才出现。这种人是一个新家族，它的成員往往遭受保守派所鄙視。保守派对柯林斯派，伏尔泰派和潘恩派这些人們的名字肆意誣蔑。其实这班人的学說，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平凡得很。现在看来，把希望寄托在将来的那些改革家实在是进步力量最后产物。保守派虽然在那里反对什么在培根时代所謂“可疑的新奇”，而且痛罵改革是坏的、不能实行的，但是他們自己也不自觉地走进改良的过程之中。我們虽然不喜欢神秘，但也不能不承认我們自己有一种不可思議的不知不觉的冲动，好像是一种自然的伴侶。这种冲动好像专門在那里推翻现在的制度，隐隐之中要想推出一种較复杂的去替代现有的东西。这种生命的冲动，柏格森所謂“活力”可以代表自然界內在的維新的傾向。这种产生变化的能力——那就是广义的所謂冒险精神——已經不是詩人的或幻想者的观念了，最严格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也不能不注意它了。我們到如今才了解，尽管遭受人类的熟視无睹，甚至誹謗抗議，但是这个自然的变动力量一直在发生作用。我們可以和这种变动的力量通力合作。

我們如今才找出那个反对圣灵的罪过——那就是不願和改良的原理通力合作的罪过。总而言之，历史将要宣判保守主义的絕望的和恶毒的罪恶。

假使我們上面所申論的話是不錯的，或者大部分是正确的，那么，我們全部的敎育岂不是错了么？我們对于青年男女并沒有用一

种始終一致的方法去培养他們的进步精神，并沒有使他們明白他們所負的責任，——那种向前看和要求前进的精神。他們所受的教育大部分还是抽象的、古典的；我們如今还不敢把教育和生活結合起来。他們所讀的历史，并沒有使过去給他們一种教訓。他們从小就养成一种尊重过去，不信将来的心理。照这样看起来，我們的教育岂不是不但不能作为改进的路标，反而成为进步的重大障碍了么？假使那班負責教育青年的人們能够十分明了我这篇文章里面所說的話，岂不是都要不寒而栗么？假使在我們中学校里、高等学校里、神学研究所里、法学院的教师着重說明他們自己所教授的东西只是临时性的，而且要学生們快快去超过他們所讲的东西，你看这会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呢？上面的建議好像是讲笑話，但是可以看出，我們距离认識和接受历史的伟大教訓还很远。

我再引几句馬特林克的話：

"我們应該想一想那只大而看不见的船，它将我們人类載到无穷的目的地去。它像我們普通海洋中的大船一样；也有它的帆和压艙石。我們不能因为它离开了碇泊的地方，就怕它波蕩不定，离开航綫，就将好的白的船帆收下，把它装在黑暗的船底，急忙增加压艙石的重量。帆这样东西，并不是織来为了使它和黑暗中的圓石放在一起的。压艙石到处都有；所有海港里的圓石、海岸上的黄沙都可以作压艙之用。但是帆却是稀有之物，是价值很貴的。它們的地位并不应該在黑暗的船底，而是在高大的船桅之上，面临无限光明。在这里它可以乘风破浪，推动船只前进。"

附录　論新史学

巴恩斯

本文譯自巴恩斯:《生活在二十世紀中》(Harry Elmer Barnes, «Liv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28),第十二章(第347—381頁)。

(一)导言

本书前面各章論述了前一世紀的一些重大历史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說明有关“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許多主要問題。在最后这一章,我們将就二十世紀状况对于历史写作本身的影响进行探討。換句話說,我們将研究这样的一个問題:把历史写作同当今文明所創造的知識和观点調諧起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人們所大夸特夸的“新史学”,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写作的方向与綜合,它是用今日的知識与論点去仔細考察过去的閱历而得出来的，这种做法犹如奥罗修斯的出于迫切害怕地獄，便把基督教当作自己知識生活的軌道而撰写了《反对异教徒七部史书》一般。

现时在史学界中流行的各种术語，也許沒有一个像“新历史学”这个名詞那样容易引起尖銳的口舌爭辯,或者使人們的思想平衡受到干扰。对于旧式的历史学家来說,“新历史学”这几个字,等于請三K党的“神鷹”或“最高圣者”这些头目去吃一餐菜肉杂燴一鍋煮的爱尔兰穷人飯。对于魯宾逊教授的列陣备战的門徒們来說,这个名詞却使他們脉搏急跳、脊骨挺直,像十字架旗的张揚,激

起了中世紀十字軍人身体上的变化一般。另一些人則对这个离弃旧日叙述政治事件的历史的运动虽寄予同情，但他們却为“新历史学”这个术語感到煩恼，因为它使他們联想到好战的宣传，刺激他們敏感的神經，因为他們在汗牛充栋的图书館中作隐士式的研究工作，环境肃静，习惯于美国学院式历史家的那种传統的文雅与安静的生活的緣故。在这一章中，我們将企图对“新史学”作出一种和解性的評价，略述其主张与願望所包含的綱領，指出学习“新史学”所必須具备的条件。这样的一篇闡述尽管有缺点，但毕竟是有价值的，因为，要成功地学习“新史学”，就不能采取毫无目的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們应当明确自己要学习什么，和怎样去求得效果。

伯克教授① 評論了我的《新历史与社会科学》一书，評論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評論报》1925 年 8 月 15 日刊上。他提出的精巧而有力的第一个問題，便是关于“新史学”的实质与范围，及其自称为“新”的确切性的問題。人們一般地认为，“新史学”是一种历史写作的类型，它放弃了历史的傅利門② 对于历史的概念，即满足于把历史看成是“已往的政治”，把一大串故事組織起来而加以說明。“新史学”传統地被解释为一种表达历史的方法，它試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文明历史的总体进行重建，使它像魯宾逊教授所說那样，包括“一切我們所知道的、人类曾經做过、想过、希望过或感觉过的事情。”就新史学的范围而論，这种說法大致是适当和正确的。但比这更根本的，是新史学的发展方向和斗爭目标的胜利。

历史学范围的扩大和任务的修改，引出另一个根本性的要求或責任，即：要求有一种适宜的訓练，使得对新史学有抱負的学者

① 伯克(Carl Becker 1873—1945)，美国当代历史家。——譯者

② 见本书第 8 頁注②——譯者

們能够滿怀信心和成功地胜任对他們要求严格的职业任务。这种广博的訓练主要是要求对于人性和人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之間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了解。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去对付重新建設文化史的各个方面和分析社会制度的进化的困难問題。制度的进化記录着人类逐漸征服他們的物质环境，以及人越来越成功地組織人类集体力量的事迹。換句話說，要从事于新史学工作的人，就得彻底熟悉生物学、人类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他們还需要就自己所决定要进行研究的那些范围，接受特別訓练，掌握这些范围內所不可缺少的和密切联系着的某种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与美学部門的知識。

在本章后面的一段，我們将討論要胜任新史学的开拓工作所必須具有的預备条件。我們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事实：我們对于历史学的新概念，不仅要求我們要大力开扩历史学者的兴趣領域和負担的范围，而且对于研究新史学所必需的預备条件，只要是能激发人們的信心，或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就同样要予以大幅度的扩张。有人曾說，新史学写作所需要的只是思想上的轉变——只須把头脑轉变一下，使它能够从叙述神圣同盟的起源或輝格党的解散，轉而去分析古代阶級斗爭，或研究中世紀自然科学史，或对伏尔泰进行心理分析，或研究(拿破仑的)大陆制度的經济情况、现代法学的演变、或希波格拉底[1] 技术衰亡以后医学上的进步，这样做就行了。据說，《圣經》上有这样一句話：思想无法使人长高一尺。我們可以申辯說，单凭思想，就更难把自己从一个因袭的叙事家变成一个文化史或社会制度史学家。因为，新史学既是关于历史內容的新綱領，又是对于历史实践的新要求。

---

① 希波格拉底(Hippocrates, 公元前460?—357年)，古希腊名医，号称医学之父。——譯者

关于新史学的范围，就讲到这里。那末，关于它的那个自称为"革新"的夸张的形容詞的合法性呢？就其作为一种比政治和外交更要广泛的历史兴趣領域而論，它不能有效地自称为絕对或独特的革新。第一部綜合历史著作，即希罗多德的《波斯战爭史》，便对文化史的許多方面作出了貢献。此后每个时代总有一些著者，他們对过去的兴趣超越了軍事战爭和党派斗爭的范围，即使他們的兴趣被消耗在某一圣人的大腿骨所显现的奇迹，或是女巫的肆虐。新史学对于自己的题材范围之所以能够自称为革新的，主要在于这种观点在现时被人們接受的程度。在已往的世代里，文化史的写作者是孤单的，而且往往被人鄙視。今天，压倒多数的青年史学家大声疾呼地拥护新史学的計划，而許多旧式的传統历史写作的代表人物或者投降了，或者是意气消沉。这种情况，要比第九十九个活泼的青年改信新史学更有意义、更加可喜。进化的观点和生长的态度的胜利，乃是眞正的革新，是独特的事情，它引导历史家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說明：现时的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这便是最完善意义上的眞正新史学。

在提倡历史研究和写作需要具备一定的初步預备条件的主张上，新史学的观念也无疑地是革新的。到兰克时代为止，以前的史学家尽管有极少数人像波里比阿和馬比伦那样坚持历史学者的专門訓练和資格条件，但大家一般地都认为，无論何人，只要他有文学的志願和流暢的文笔，就有資格对历史进行严肃的工作。兰克和他的继承者主张，历史工作需要預备条件，就是說，要在文件批評和史料学上接受严格訓练。关于历史学者必須具有淵博的社会科学知識的論点，則是到了最近才流行的。社会科学只是在近时才到达这样的境界：它們的题材的可靠性，足以为历史见解和历史分析提供稳妥的基础。历史必須依靠社会科学，正如它必須依靠档

案学和古文字学一样。这种看法的确是到了晚近才出现的。人們也許終归会承认，鲁宾逊教授的具有革命性的著作《新史学》——这是新史学派的宣言——它的最有創造性和最革新的一段，是"历史的同盟者"那一章。可见新史学之成其为新，是在于多数的西方历史学者普遍地承认历史研究的兴趣应該是广闊的，而其革新，則是在于它主张发展的方向，和承认广泛的預备訓练，作为执行其計划与方法的先决条件。

(二)新史学取得胜利的若干方面

促进新史学发展的因素与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有許多作者不但对于过去饒有兴味，而且他們的眼界远远超出政治、外交和軍事战略的范围。如威廉·利尔[①]具有浪漫故事的讲說者对于中世紀的浓厚兴趣。福来塔哥[②]是个戏剧家，他把自己的創造性的见解伸入到自己国家已往的历史；博哈德[③]是个美学家，他善于欣賞意大利伟大艺术时代的艺术成就；瑞南[④]、特莱伯[⑤]、和怀特[⑥]是唯理主义者，他們对于一切有关种族智力解放的事物，莫不穷理尽性地进行研究；敏感和有修养的格林[⑦]渴望能对祖国的伟大作出适

---

① 威廉·利尔(Wilhelm Riehl, 1832—1897年)，德国历史家。——譯者

② 福来塔哥(Gustav Freytage, 1816—1895年)，德国历史家。——譯者

③ 博哈德(Jakob Burckhardt, 1817—1897年)，瑞士資产阶級历史家，以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一书著名于世。——譯者

④ 瑞南(Joseph Ernest Renan, 1823—1892年)法国資产阶級历史家，以研究初期基督教史著名。——譯者

⑤ 特莱伯见本书第41頁注①。——譯者

⑥ 怀特(Andrew D. White, 1819—1916年)，美国資产阶級历史家。——譯者

⑦ 格林(John Richard Green, 1837—1883年)英国資产阶級历史家，以著《英国人民簡史》著名。——譯者

当的解释；麦克馬斯特①用实用工程师的眼光去欣賞那以一切阶級生活和利益为基础的吸引人的美国民族进化史。

另外一个强有力的影响是来自进化論的基本假定，特别是生物学家对于生物的成长的兴趣。誠如鲁宾逊教授所經常指出，是生物学家首先用成长和发展的态度看待一切事物的方法传授給历史学家的。这是新史学的每个重要方面的基石。属于现代流派的历史学家們所以把研究事物的由来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主要是由于进化論的哲学反映在思想比較活跃的和比較易于感受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中。在过去三千年中，历史学家失去了历史观点，終于由自然科学家来把它提出，虽然休謨和图格特在十八世紀似曾預见到一点社会变迁史。

运用发生发展的态度探索事物起源的兴趣是产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科学、技术和經济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类文化的徹底变革，使得人們探溯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外交的糾纏或王朝的世系。它必須意味着这样的事物的起源，如：发电机、外科麻醉药、国际汇兑、无綫电活动、梅毒治疗、心理卫生、工厂制度、內燃引擎、柏塞麦炼鋼法、机械发明、印刷机和无数的其他发明。这些东西，从未惊扰过傅利門恬静的酣睡。換句話說，探索现时秩序起源的冲动，产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现存文明不再是以最引人注意和戏剧性的形式去表现为一小撮上等人物爭夺經济特权、政治特权、或以玩弄一班可怜傀儡的生命为乐的特权，这些傀儡构成了或多或少是开明的专制統治者的雇佣常备軍。如是，人們就被迫地必須对文明历史发生兴趣了。

探索事物成长的方法把善于思索的学者們引导到新史学演变

---

① 麦克馬斯特（John Bach Macmaster, 1821—1902年），美国历史家。——譯者

的下一阶段，亦即最后阶段。这就是致力于历史的解释，其目的在于发现那些文明的变化和社会制度的起源具有何种意义。虽然較为新式的历史学者不再希望能从过去的紀录中发现上帝的意旨或人类的最終命运，像那些习慣于把历史看成是用經驗来进行教育的哲学的人們那样做，但是，必須承认，过往的唯一有意义的事件，只是那些能够启发现代或后代人的事件。而且，历史的唯一现实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帮助我們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我們自己的文明。

在把这种种的冲动力結合在一起、去构成和建立新史学的工作中，首要人物是兰普瑞赫特[1]、柏尔[2]、魯宾逊、泰卡特[3]、和馬尔溫[4]。

兰普瑞赫特体系的产生，是基于他本人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兴趣，和馮德[5]的心理学方法，孔德关于人类进步的心理解释，以及兰普瑞赫特自己的广泛文化兴趣，从經济进化直至音乐史。无論人們如何看待兰普瑞赫特的体系和历史公式，他的著作是最先提出了爭論的，爭論的結果使新史学取得了明显的胜利。

柏尔不仅就綜合历史学的理論写出了淵博的論著，而且还計划了一部规模宏大的«人类的进化»丛书，企图眞实地完成历史綜合的工作。他的理論背景是制度进化的社会学观点。他企图对历史因果提出一个科学的解释，即把所謂历史綜合的邏輯精密化，并用世界眼光使他的历史綜合的概念眞正能和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全面研究相适应。

魯滨孙和兰普瑞赫特、柏尔、泰卡特等不同，他沒有提出任何

① 兰普瑞赫特 (Karl Lamprecht 1856—1915 年)，德国历史家。——譯者

② 柏尔(Henri Berr, 1863—1954 年)，法国資产阶級历史家。——譯者

③ 泰卡特(Frederick J. Teggart)，美国資产阶級史学理論家。——譯者

④ 馬尔溫(F. S. Marvin)，英国資产阶級历史家。——譯者

⑤ 馮德(Wilhelm Wundt, 1832—1920 年)，德国心理学家。——譯者

关于历史理論的体系。他对发展的历史观的信仰，是逐漸的、經驗的。作者认为，魯宾逊史学主张的心理起源是在于他从前是、现在仍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在学术上好提問題的人，而新史学也不过是运用思考的历史而已，魯宾逊脫离传統历史学是从他以成长的态度对待法国革命开始的。这种态度使他一步一步地追溯，直到人类的起源。根据他自己的述說，从他开始工作，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助教起以后的二十年中，他把历史一直往后推，从断头台一直回溯到史前期的拳斧。此外，他又受到生物学家和他們的进化論与成长的方法的深刻影响。当他对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較深的理解时，他就对历史进程更加重視，这就使他相信，历史資料的解释是头等重要的工作。在美国传播新史学的运动中，魯宾逊的首要地位是无可爭辯的。这是由于他的教科书的风行；由于他成功地充任了国內最大一个研究院的教授；由于在宣传历史研究的新态度时，他是如此溫雅与和藹可亲、如此有說服力；由于他的門徒人数众多，态度忠誠而坚定。

在历史新方法与新态度的重要作者中，沒有一个人像泰卡特教授那样受委屈，他的影响同他的功績是完全不相称的。无可置疑，他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新史学理論家，是把历史看作社会变迁的科学的最强有力的宣传家。然而，在寥寥无几的学生們的小圈子以外，他几乎是不被人认識和沒有影响的。这是由于他情願单干，他否认别人所作出的成績，而且对于那些担負了創立新史学工作的人們，他又拒絕同他們取得积极的联系。

馬尔溫不是个职业历史家，但是在英国喚起人們对新史学的兴趣，提倡新历史学的研究等方面，他所作出的努力比誰都要多。他极力主张进步的现实性，坚决相信科学与技术在促进社会变化和人类福利上的潛力。在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的矛盾与分裂所导

致的禍害給他极深刻的印象。为了抵銷这些禍害，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讲演和书刊，希望通过对文化的共同了解和欣賞来提倡世界統一。他自己所撰写的三部书[1]，和由他計划并担任編輯的"統一丛刊"，是英国新历史学最显著的成就。

新史学近来在意大利获得惊人的支持。它濫觴于費雷罗[2]的《罗馬的伟大与衰落》一书，該书曾引起了广泛的討論。新史学还得到了大哲学家克罗齐的大力支持。意大利的进步历史学者是以巴尔巴加罗为首。他們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Nuova Revista Storica"，1917年創刊。

(三)新史学計划书

曾經有人这样主张：任何人只須有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就可以做历史家，只要他願意到当地的一个教堂墓地里去把石碑上一些銘文抄录下来，或是預备好一篇关于克利奥佩特拉女王[3]的論文，去向当地的縫級組宣讀就行。直至今日，也仍有細心的进步历史学者，他們反对确定历史学的領域，反对給它划定界綫；他們只是鼓励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們，如果他們对历史問題发生兴趣，那么，直接钻进去，竭尽力量去钻研就是了。作者认为，很难承认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除非人們能够同意：每个調制沸騰散的人都是医生，每个拿起銳利屠刀跃跃欲試的人都应当被鼓励去当外科大夫。即使是那些旧式的、簡单得多的，只是讲些插話及軼事的政治、外

① 馬尔溫曾著(1)《活着的过去》(The Living Past)；(2)《有希望的世紀》(The Century of Hope)；(3)《西方思想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Western Mind)三书。——譯者

② 費雷罗(Guglielruo Ferrero, 1859—1909年)意大利历史家，以著有《古代罗馬的伟大与衰落》一书而馳名于世。——譯者

③ 克利奥佩特拉(Cleopatra)，古代埃及女王。——譯者

交和軍事历史，也往往因缺乏統一的和經过熟思的方法和工作綱領而陷于困难。新史学对于它的綱領和对于实现它的企图所需要的訓练若无一致的意见，就将遭受損失。新史学要求意见一致、統一和协作的程度，并不亚于医学、法律学或工程学等专門职业。

按照定义，新史学的綱領，就其兴趣范围而論应該是无所不包的。它記录过去曾經发生的一切事物。按照严格的或文字上的意义，所有过去发生的事物，沒有一項可以被指为是非历史的，而可加以排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散漫的漠不关心或是萌芽的无政府状态。新型的历史学者承认一切过去发生的事物都具有历史性质，从原始的薩曼教徒的咒語，到所罗門王第七百三十一个妃子的化妆品的化学方剂，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华盛頓从弗吉尼亚州赴麻薩諸塞州一路睡眠时所用床墊的材料及其构造。但是，这并不等于說，新型历史学者对于这一切的事物抱有同等的兴趣，或是认为这些事物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誠然，一个人很可能只是在他最有兴趣的研究范围內做出优异的成績。

如果一个人要立志作一个历史家，而且酷好研究瑞士的海軍战术的演变，他的研究工作应当受到鼓励。但他也应該知道，他所研究的問題，絕不会和英国产业革命或现代技术史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在这些地方，应該坚持一种常識的态度。历史資料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它的时代所决定的，另外一方面是由它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所决定；但是，最重要的是由历史家所抱的研究目的所决定。显然，中世紀的科学史絕不如中世紀的宗教史那样重要；而现代的宗教絕不及现代科学的发展重要。从哥伯尼以来，星象学絕沒有天文物理学那样重要；而自1800年以来，医学史比巫术史更加重要。

新史学的主要任务有二：(1)把过去重要时代的文化整体重新

复原；（2）研究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关于第一个問題，人类文化各方面的重要性应該取决于它对于我們要研究的时代的意义。在試图研究培来克理斯时代的文化，我們衡量这个时代一个事件或一个方面的重要性的标准应該是当时的标准，而不是写历史人的时代的标准。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一位天眞的、虔誠的、枯燥的、沒有审美观念的、独身的，在堪薩斯州[1]教会大学任教的历史教授在描写亚历山大或奥古斯丁时代的文化时感到极为困难。他必然对当时社会竟有飲酒的聚会，和吸引人的妓女，而感觉不滿；他必然又对这时代竟沒有主日学校[2]、反对吸烟的法律和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3]等事而感到惊奇。这就是基督教历史家对于非基督教文化大加歪曲的原因。一个建立在教育人民如何活得快乐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化很难被一个費尽心机来准备如何死得安全与成功的时代来正确地理解与欣賞。

当一个历史家从事于新史学的第二个任务，即探索现代制度与现代文化的特点时，我們必須以它对于现代生活的影响作为衡量某一方面的重要性的标准。对中世紀說来，科学显然不及宗教重要，但对现代說来，研究中世紀的科学史就比宗教史更有意义。假使一个人要对希腊文化作一个全面研究，那么星象学家应比天文学家占着更重要的地位。但是他若要探究现代文化的起源，那么亚里斯塔克斯与希巴尔卡斯的成就就要比整个古代希腊所有星象学家的全部成就更加重要。如果我們要对宗教改革时代的学术思想作出一个忠实的描写，那么我們应着重研究的問題是“通过信

① 堪薩斯州(Kansas)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州，地方蔽塞，文化水平較低。故本书作者对此州的历史教师加以譏笑。——譯者

② 基督教会用星期日为儿童宣讲教义，名为主日学校。——譯者

③ 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1920 年 1 月 26 日），禁止制造、轉运、出卖酒类。此法令在 1933 年 12 月 5 日为第二十一条修正案所取消。——譯者

仰而得救"等問題，而不是路德、喀尔文及其他領袖的經济思想。但是，从现代文化的来源的角度看来，新教領袖对天主教經济思想与經济实践的批判就比一切神学問題更加重要。从中世紀史家的角度看来，罗哲尔·培根的性格与活动，主要地是一个中世紀人物；但对一个新史学家說来，培根的现代观点，和他偶尔提到的归納法和試驗法就更加重要。

从以上几个例子看来，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文化的表现，它的重要性都不是单一的，絕对的；而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每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都是相对的：(1)对于它自己的时代的意义；(2)对于现代文化的起源的意义。凡是对于历史問題有正确理解，而且力能胜任的历史家，都是从这两方面来衡量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一般人都认为，一个历史家在一部著作中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把一旧文化复原；(2)說明这个文化对现代的影响。但是，我怀疑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因为一个历史家从两种不同角度来衡量一个历史事件的結果，他必致偏于一个角度而歪曲历史；有时两目的都沒有作到。

十分明显，如果一个人的兴趣是在探溯一个不是自己所属的文明的来源，那么評論他的史料价値的标准，应該是按照这件史料对于他所进行探溯的那个文明的重要性。例如，在探索古希腊文明的起源时，某一特种类型的埃及历史事实的重要性，必須是决定于这历史事实对古希腊文化的特殊貢献，而不是决定于这件历史事实在埃及文明中的相对地位与意义，或是它对于探索者本人的时代的重要性。

有人或者要埋怨說，这样对历史材料的重要性的测驗，是相对的和实用主义的。难道沒有絕对的和超范畴的标准嗎？显然是沒有的，除开这一事实：在最終的分析中，历史資料对于解释我們现

代文明的价值，远远超越該資料所具有的任何其他意义。

上面簡短的討論，即关于新史学工作者的眼界和兴趣的无所不包的范围，和关于历史資料重要性的双重标准，自然而然地引起另外一个問題：即如何从新概念和新态度的角度来組織历史資料。在旧日，情况很簡单。人們总是把政治和軍事历史的輪廓描繪出来，总是认为，拿它作为架子，来建立起人类的全部史詩，就足够了。新史学的概念对于旧史学这种原始的簡单純朴是起毁灭性的作用的，正如现代的天文物理学、进化生物学和圣經学批判，对于比我們老一輩的人們的簡单信仰和安慰人的教条起了毁灭性的作用。我們不但必須承认，政治舞台完全不足以建筑全部的历史大厦；而且还必須承认，任何单独一种的历史事实都不足以充当組織历史材料的基础。历史的因果律不是只用一把钥匙就能打开的。有的时候，某一个或某另一个因素可能上升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但是，沒有任何单一的"原因"或"影响"，能够貫穿全部人类历史。

粗略地和初步地說，历史因果的鏈索大致如下：历史的两个相对不变的因素是人的天性和地理环境，但是不能說它們是絕对静止的。它們是如此同其他附有条件的影响交織在一起，以致它們的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广度不断地在发生变化。人的天性对于特定形态的地理刺激的反应，就产生一种特殊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科学技术的出现与发展范围。科学技术的状况相当深刻地限制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經济生活的性质。經济制度則强有力地限制、有时乃至决定其他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即社会、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教育和文学制度等因素。

其实，这是对于历史进程的过于簡单化的陈述。因和果是继續不断地相互作用和相互反作用的。几件机械的发明，像印刷术或是传递消息新方法，就可能如此改变人类的生活，以致引起某一

时期人們的主导心理的全面轉变。又如，某些心理和文化因素，有时也可能有足够的力量阻碍經济利益和物质繁荣的明显发展。历史发展的綹束是錯綜复杂的，只有学問淵博的历史家，才能解决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因果問題，更勿論能够試图提出某种普遍有效的应用定則，对人类历史作全面的解释了。

政治的架子曾經支持着辛勤活动的历史家，但这棚架已經坍塌了。一些敏銳地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人，会企图用这样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說：如果我們不能用政治事件来作为历史工作的架子，至少我們可以依賴民族共同体，以从事于法国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等等进化史的著述。但这样做仍然是要使人失望的。因为民族史的概念，整个是同政治拜物教和政治因果的假設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的。人們只要从文化及制度进化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就能立即明显地看出民族史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朝代改换、党派政治、外交阴謀可能在定义上被說成是严格的民族事务，尽管在实践上它們很少完全是这样。但是文化和制度的发展现在不是、从来也不是、永远不会是民族的事物。关于汽車、印刷机、或显微鏡在某一国发展的历史，和法国或德国文化史一样，都是不可想像的。研究文化的一些具有国际淵源和国际条件的各个方面，在某一国家范围之內是怎样特别发展起来和受到欢迎、或是特別受到限制和譴責，这对于学者来說，可能是有趣和令人滿意的事情。但是，任何民族的文化与制度史都不能不是人为的和瑣碎的，只要拿它去和另一种研究比較，即关于制度与文化起源的研究，这种发展进程，是不受任何由朝代野心或經济貪欲所造作出来的界綫所局限的。我們可以继續研究文化的民族条件，但絕不能研究文化的民族进化。在新史学面前，民族历史一定要被人遺忘而衰落下去，如同那个被当作是組織与說明历史事实的基础的政治

历史要衰落下去一样。民族曾經被人看成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后来瑞南、曾威尔①、济姆門②等又否认民族的政治基础而把它描繪成一种文化統一体。我們或許应該再迈进一步，指出民族是一种危险的文化幻觉——一种文化的心理病态或文化的神經錯乱。对于研究历史写作和历史讲授是如何影响了民族主义、战爭与和平等問題的学者来說，上述的意见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但我們不能在本章中討論这些問題。

从前的历史家慣于以政治史为骨干，以民族史为范围。现在这种方法已經陈旧不堪了。被迫放弃这种旧式方法的历史家弄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但他至少仍可以爭辯說，他还能在传統的历史年代中間，即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中給自己掘出藏身之所。但是，无情的新史学宣传者旣然不让他躲避在政治因果論和民族主义的避难所中，更不会让他钻进年代学的防空洞中。人类学家教导我們說，从純粹的年代学排列的观点看来，旧的年代学是完全不适用的，而且它歪曲历史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就时間的距离和文化成就而論，全部有文字記載的历史，包括在旧式的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范畴之內，实际上都是极端近代的历史。其实，古代史应該是指原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阶段；中古史应指新石器时代文化；近代史应該是指从金属时代开始时，至少是公元前三千年起，至十八世紀中叶发生科学与产业革命止；现代史应該是恰当地描述由于近时科学和工业变革而产生的革新文明。

对于旧的年代学进行文化的与制度的批判的結果，其破坏性要比从人类发展的新的时間透視所进行的批評厉害得多。旧的年代学是建筑在这样的一种概念之上的，即它认为能够把人类进化

① 原文为 Zangwill.——譯者

② 原文为 Zimmern.——譯者

过程截然划分为明确的几个阶段。这是基于一系列的假設，而这些假設全都是錯誤的。划分阶段的原始基础几乎純是年代排列，是从年代上而不是从文化上考虑的。年代的划分的标志尽是在历史上居于次要地位的事件。在他們看来，战役就是战役，一个在公元前561年发生的战役，同一个在公元827年发生的战役的差异，仅是在于前者发生在公元前561年，而后者发生在公元827年。当一个文化史学者使用传統的年代学时，他就必須有意識地假定，文明在公元324年和公元326年之間、或在公元1452年和公元1454年之間，是存在着实实在在的鴻沟。他还必須假定，整个文化的复杂体是一个同一性质的共同体，如希腊伦理学同希腊科学技术一样的古老，近代伦理学同近代科学一样的新近，文化的各个方面是同时地調諧地发展起来的。旧式年代学还根据这样的一个荒謬的假設：即认为文化必須是在全世界同时发生和一律相同的——假定在公元前500年，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同一种古代异教文化，而在公元1300年，世界各地完全是属于中世紀性质的；在1850年，世界各地都变成基本上是近代的。

这样，人們可以看出，以基本年代的順序为基础的年代学沒有任何重要意义可言。历史的連續性証明时代的明确划分是徒劳无益的。不但如此，在人类学理論和文化史看来，复杂的文化的各个因素有着迥然相异的发展比例，而文化的美学方面，则是不服从任何可以表述的演变或发展规律，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眞理。如果“现代”是指社会的富裕和科学的应用，那末希腊的伦理学就要比苏姆納[①]或柯立治[②]的伦理学更要近代化。同样的，文艺复兴时期

① 苏姆納(John S. Sumner)。——譯者

② 柯立治(Calvin Coolidge, 1872—1933年)，美国第30任总統(1923—1927年)。——譯者

的艺术生活要比今日的更加丰富和广闊得多。非常明显，如果假定一切类型的文化和制度的发展比例都是一律相同的，以此作为年代学的基础，那末，年代学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了。再則，文化进化率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区域內是相差很远的。能够想像：在"古代文明"标題之下描述公元前一千年的中国、斯堪的納維亚、南美洲、高卢、美索不达米和印度的文化，或是在"现代文明"标題之下描述公元1890年的中国、英国、德国、俄国和巴西的文化嗎？看来唯一能够具有科学价値的年代学类型，只能是高度专門化的，只能是基于并且描述在一个性质相当統一的文化区域范围內的文化之某些特定方面或某一特定制度的发展。传統的历史学者或者要反駁說，那干脆不用年代学好了。他說得对啊！

那个历史学者在絕望中也許要咆哮說：这是不能容忍的混乱、无政府的复杂状态。我們必須坦率承认，目前情況就是这样的，但这不能归咎于新史学的提倡者。这只能說明，历史学者們正在开始觉醒过来，在正視着今日我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面临的状况。这只能說明，历史观是在朝向现代化轉变，在开始认識那些早已为宗教学者、哲学者、社会学者和伦理学者所认識的事物。这只能說明，那象征性的历史駝鳥，終于从中世紀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沙堆里抬起头来，对二十世紀世界重新观察一遍。我們的駝鳥所看见的，已不再是簡陋的、世世代代无甚变化的生活条件，也不再是毫无批判地信靠原始宇宙学和几条质朴的宗教教条而产生了幻觉的安全感。他所看见的，是大工业时代的动力和急剧变化的机械力的城市文明，是令人不安的大幅度的宇宙学，是关于人怎样解释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在肉体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安全感的問題，是对于这些問題的一切有关的假設提出严肃的疑問。这些历史事件和形势的惊人变化正在迫使历史概念、目的、与方法发生相应的

变化。莫怪那历史駝鳥的初次感情冲动是再一次把头插进沙堆里去。

换句話說，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問題，只是如何按照二十世紀知識与方法的要求，去执行他的职业的問題，犹如我們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应該如何按照眞正生活在现今时代的要求、去强使自己实行必要的重新調整的問題一样。在五十年前，一个有文化的美国公民只須相信(基督教)贖罪論、保护关税和共和党，就能感到十分够足和安全。在今日，那同一个美国公民就要面对困惑的疑难和伤脑筋的躊躇，由于那动人的现代天文物理学証明了我們星球的渺小，从而証明了人的自身的渺小；由于关税制度所依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經济复杂性引起了人們的疑惑；还由于人們越来越认識到，在现今时代的复杂性面前，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罢，它們都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甚至連人类本身在实际政治上也是无能的。已往五十年的变化，对于美国大学里一个活泼敏感的历史教授在方向上和方法上所激起的变化，是同等深刻、同等丰富的。

如果有人认为，仅有少数智慧超群的人才能按照以上所說的担負历史学者的新职責与义务，那末，我們可以回答：现代家庭主妇已不能再行医了，理髮匠不能再充当外科大夫了；然而自从人們承认行医人員必須加以限制并强制实施这种限制以后，医学的內科外科，却都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結束这个对于新史学的范围与綱領的討論之前，我們应研究新历史学两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一)重新研究已往各个文明，恢复其原来的面貌；(二)研究现时秩序之所由来。必須承认，后者較前者更为重要。老实說，研究已往文明，除了那些經过研究而組織起来的事实可以帮助我們更好地去說明现代文明的来源以外，便沒有其他重要性了。試使伯里克理的时代或者查士丁

尼的法庭复活，試一試我們能够这样做到什么地步，当然是很有趣的工作。但是，这种练习，就其本身孤立地来看，只能是牵强附会的历史纵横組字游戏，或者更恰切地說，是历史纵横截面游戏。去考察希腊人怎样生活，是沒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除非这項研究能帮助我們了解自己在现时怎样生活或应当怎样生活的。因此，从任何严肃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已往文化的重新研究，其重要性仅仅是在于它能促使我們更好地去理解今日的文明，其必要性則决定于其能否达到此目的。当然，要是有人感觉到，进行关于古代赫提民族生活方式的研究和推测，比任何其他娛乐都更要有乐趣的話，那末，全然应該容許他去作这样的消遣。但是，必須教导他去把这种消遣看成是和形而上学的推测、吸烟、高尔夫球、打桥牌等相类同。然而，如果这个人所以研究赫提文明是为了从它的冶鉄工业的起源去发现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城现时繁荣的遙远背景，那么这項研究就具有較高的价值。

由此可见，那些认为新史学的唯一与最終目的在于創造一种包括一切时代一切文明的宏伟历史的人們，他們对于动的和綜合的历史的根本宗旨的看法是极不全面的。奥格登教授[1]所計划和主編的«文明历史丛书»，大大扩张了柏尔[2]的«人文进化丛书»。自从希罗多德闡述上帝怎样拯救了雅典人以后，这是最高深和最有意义的一項历史計划，为其他历史計划所不及。但是，它却沒有达到新史学的最終目标。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更为宏大的丛书来补充它和利用它，来探索像这样的一些事物的起源，如熔矿炉、印刷机、私有財产、貞操概念、古典文学在儿童教学法的理論和技术中的地位、保护关税、党派政府、汽車、放射作用、精神分析、民主理

① 奥格登（C. K. Ogden）当代英国資产阶級历史家。——譯者

② 见本书第 184 頁注②。

論、工厂制度、一夫一妻制家庭、陪审制度、性病預防法、外科痲醉药、国际汇兌、现代改良公路、收割机、禁酒、以及亿万个其他用具、制度和实践，这一切，都是构成我們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所叫做“生活”的东西。作者认为，这样的一部丛书便构成有思想性的和实际有用的历史的最終目标，便要比去研究西塞罗在他猛烈攻击加达萊因的前一晚上吃了什么飯的目标高明得多。作者絲毫也不反对人們花功夫去准确而生动地刻划我們祖先的生活。作者只是要强調地指出，那些从事于这样的工作的人們应該明白，他們所进行的幷不是极端重要的学术活动，而是高級的消遣和行乐。

我們强調对现代社会起源从它的成长过程进行分析的头等重要性，因为在这里我們接触到历史給予人类的唯一眞正的教訓。对于一切善于思考的人們来說，十分明显，过去的社会与文化形势是如此不同于二十世紀，我們从遙远历史时期所吸取的經驗对我們是沒有什么价值的。然而，如果是把我們自己的文化和制度追溯到遙远历史的肇端，我們就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的时代，而且还能够破除对于过去的崇拜与輕信之心，这种崇拜与輕信，是社会与知識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对于社会的最危险威胁。

这里顺便指出，如果把历史的工作主要放在追溯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上，許多上述有关一般历史材料的組織、有关历史因果的学說爭論和有关历史年代学的复杂爭端等問題，就会自行消失，因为，这里的每一項問題，就都会变为某一制度或文化形态的起源与发展的問題，尽管它的历史会同文化的各个有关方面的历史牵連在一起。这样，人們就不必去处理整个文明的阶段問題，或者历史因果的一般問題。

也許有人要問，为什么我們沒有提及历史学的作为社会变迁的一門科学的問題，像特加特教授所极力主张和精巧闡明的那样。

作者认为，这問題与其說是属于历史的正当范围，莫如說是属于历史社会学，虽然作者并不想去向那些把它納入新史学范围的人們展开爭辯。如果人們願意把断定社会因果规律与过程看成是历史科学的最終阶段和史学家的基本目标，那么，十分明显，新史学的双重任务，即：(一)重新研究过去的文明，(二)探溯现代文明的起源——就会对研究社会因果关系或研究社会变迁科学的学者們提供参考資料，供他們进行研究与思想。

(四)新史学所需要的訓练

新史学要获得成功的話，十分明显，它就必須在这个研究范围內培养越来越多的热心工作者，使他們能够胜任研究与綜合工作。如果說，旧历史学由于它的信徒們缺乏足够的訓练而遭受了損失，那末，新史学就会更加是如此，因为新史学所要求的預修課程的范围是更要广泛得多的。当然可以这样說，特出的天才沒有經过大力培养，也許也就能够出色地完成这种工作，但这里我們所关心的不是天才人物。新史学像旧史学一样，必須从专心和热誠的学者中間来招募它的大部分队伍，虽然新兵要取得成就是更加困难的。他們需要通过徹底的技术訓练，来得到加强、支持和指导。

一定要坚持新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研究文化与制度起源的科学，而不是一种艺术。当然应当承认，新史学派的出色的史学家将是这样的人：他們既掌握科学的准确性和淵博的学識，又具备特种艺术性的創造能力；只有特种艺术性，才能精巧地使过去的文明复原，并熟练地探溯观念与制度的起源。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正如医学上的伟大診断家是超出熟练技术科学家的本領的，但要

成为一个馳名的診断家，他非首先具备熟练医学家的本领不可。我們尤其是不能把历史家的本領同文学家和辞藻混淆起来。善于写文章的聪明才子本身并不是历史家，犹如一个能画一幅酷似圣彼得或查理一世的杰出的画像的油画家并不是历史家一样。凡·戴克[①]和喀萊尔一样，不能称为历史家。霍卡瑟[②]和麦皋萊一样，才是眞正的历史家。

有人爭辯說，历史对公众生活与輿論所以沒有产生什么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近来历史写作者缺乏优美的文笔。我认为眞正的原因是在于，近时絕大部分历史作品的內容陷于神秘、无生气、文不对題和萎靡不振的境地。如果要指出有什么恶劣因素敗坏了近时历史著作的名誉的話，那就是：以陈腐的观念对待历史著作的性质、范围与目的；学究式的卖弄学問淵博；专門选择冷門題材；扶輪社[③]式的趣味观点；就是利用历史写作当做在学术界里謀求升級和拉攏著名学者的手段，而不以提倡人道主义和促进人类福利为目的。即使是桑巴特[④]或凡勃仑[⑤]，也能够吸引大群热心的讀者，只要辛苦钻研他們的晦澀的文章的結果能够令人得到收获。优美的文笔的价值和需要是无可置疑的，但好文章必須是由好的历史家来写；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的是好的历史文章，要从这个名詞的最好的意义来理解它。

---

① 凡·戴克(Van-Dyck, 1599—1641年)，著名画家。——譯者

② 霍卡瑟 (David George Hogarth, 1862—1927年)。英国考古学家。——譯者

③ 扶輪社(Rotary Club)，創立于1905年，为資产阶級的国际組織。此处所謂“扶輪社式”趣味主义謂旧式历史家选择題目，只凭个人兴趣，而不管它的重要性。——譯者

④ 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22年)，德国資产阶級經济学家，著有《資本主义发展史》。——譯者

⑤ 凡勃仑(T. B. Veblen, 1857—1929年)，美国資产阶級庸俗政治經济制度学派創始人。著有《有閑阶級論》等书。——譯者

我們特别反对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形势的独特性与神秘性的説法。所謂历史的戏剧只不过是关于一种生物化学共同体对于地球刺激的反应的記录。人类的反应比較其他动物的行为或者在試驗室里研究的有机組織与无机物质的反应，幷沒有什么更为神秘或独特的地方。法国革命时制宪会議的辯論，同布隆斯公园里跳跃着的猩猩一样，都純然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历史形势幷不比在豚鼠身上进行的特殊生物試驗更要独特，尽管前者无疑地是一种复杂得多的事物。必須特别强調指出，历史形势的那些独特的方面，都是根本上无关紧要的事情。历史现象要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必須通过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对它們进行确切的科学分析。

要准备承担历史家的任务，不能仅仅进行古董式的研究，或仅仅掌握大批陈陈相因的历史事实。一个人搜罗和編輯大量的碑文，幷不就成为历史家，不管他的工作对于学問和历史有多大的貢献，正如一个人給艺术博物館搜集古董家具和进行分类工作，幷不就成为历史家一样的道理。一个人不能单靠能背誦普乐特兹所編的《世界历史手册》的最新版，而取得历史家的資格，正如一个人熟习了阿耶历书上关于 1870 年的葡萄酒酿造期，幷不就能在紐約城貝勒維烏医院充当一个聪明的实习医生。

新史学一切培养的基础，仍然是关于档案研究技术的传統訓练。初学的历史工作者，仍然需要和从前一样，必須在档案、石刻、和碑文的研究原則受到严格的訓练。甚至在这方面需要受比从前更加广博的訓练。在今天研究古代史，不仅需要熟悉銘文的搜集，而且还需要精通史前考古学和紙草学，这些都是从前庫尔提阿斯① 和蒙森所不聞不問的。研究近代史，又比研究中古文件需要具

① 庫尔提阿斯(Georg Curtius, 1820—1885 年)，德国古文字学家。——譯者

备更淵博的专門知識。初学的中古史学者，只要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以及档案批判所需要的輔助科学，再加上一本宗教辞汇集注和一本杜•刚兹字典来指导他的中世紀用語，就可以开始工作。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却面临着多得无限量的先决条件。他需要熟习簿記学和会計学、技术学的原理、法人团体的财政，现代政治学专用术語、运輸学原理、和无数的其他关于现代文明的著作，如果他要讀通那些构成他的专业原料的文件史料的話。一个现代史学者要是不能辨别車床和揮化器的不同、苏維埃和布尔什維克的不同，那他就会走到悲慘的境地，像一个中古史学家把圣母的“清净妊娠”当作是一种卫生箴规那样。

熟习了研究档案的基本技术之后，第二步就要把握眞正的历史观点，这要通过紧紧掌握住进化的即成长的观点来获得。历史学家必須完全以发生、发展的观点作为主导思想，犹如医生从辨症診断和病症預后着手工作一样。他必須精通有关宇宙、生物、文化与制度的进化过程的基本理論，并且习慣于用进化論的术語和进化的过程来考察人。进化論对于历史家的重要性，犹如力学之于物理学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定要坚持，凡是要当历史学学者的人，一开始就要有历史头脑。

其次，历史学者需要精通人类地理学的基本事实和原理，熟习最新的区域地理家的学說，这些学說是从人类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的。像費弗尔① 所著《历史的地理导言》这样一本书，就能說明我們的意思。历史学者尤其要精通自己所希图成为专家的那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地理。新史学工作者从一开始就必須认清：以往的所謂历史地理，只不过是要熟悉政治疆界和战爭地点，其实

① 費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法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家。——譯者

并不是什么历史地理，尽管这种知識是有用的。他必須习惯于从历史地理条件的三大阶段来思考問題。这三大阶段就是:河、海和洋，如同米兹尼可夫[①]所略述的。他还需要熟悉世界范围的文化交往的伟大意义，像謝伯特教授[②]研究欧洲扩张的历史意义时所生动闡明的。

新史学者又必須透徹熟悉人和他的行为，包括正常与非正常的。他需要先精通人体化学与内分泌学的原理。不熟知人类行为的腺质基础就不能够理解和說明人的行动，已往的或现时的。必須熟悉腎上腺的活动，像熟悉坡特海斯特或伯恩海姆那样。当沙佐挪夫在 1914 年 7 月决定进行战爭时，腎素所起的作用也許并不亚于泛斯拉夫主义。同样的，要做一个通达事理和合格的历史学者，就需要了解与人类病理学有关的各种主要的比較普通的不正常行为形态。政治家、外交家和最高法院法官通常都是老年人，而人們如果不熟識与动脉硬化症和衰老神經錯乱有关的行为样式，就完全无法理解老年人的行为。很明显，人們不熟識梅毒的影响，是不能确切地解释許多的欧洲著名国王、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行为的。要解說某一人的举止，慢性腎脏炎往往比他的政治活动、教育、宗教或經济投資更能剖明問題。了解与主要的精神病和癲痫病有关的行为样式，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人类的行为，如果同其他动物、特别是同猩猩的行为严格分隔开来，就成为不可理解的。因此，必須完全掌握比較心理学的知識。对于任何試图对人类行为进行现实解释的人来說，像耶尔基斯所著«几乎是人»这本书是不可缺少的。这本书是关于猩猩心理

---

① 原文为 Leon Metchnikoff. ——譯者

② 謝伯特(William Robert Shepherd, 1881—1956)，美国資产阶級历史家，长期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譯者

学的最好和最可靠的通俗著作。初学的人們，假如他們幸而具有幽默感的話，还应該再补充学习达依的著作«这个猩猩世界»。对于一个明达的历史学者来說，“人类仅是稍微高于猿人”这个眞实事实的意义，要比认为“人类仅次于天使”这个可疑的說法的意义重大得多。行为心理学这門十分重視社会条件的科学，对于历史学者是极端重要的，只要他有意从早期生活和社会环境来說明某一个人的性格。此外，还需要增添精神分析心理学，因为这門科学深刻地說明行为的不自觉动机，并且坚持对日常生活和个人历史的深邃进行調查与了解，这是理解任何个人行为內幕根源所必需的。最后，应当适当掌握社会心理的事实，以便澄清群众心理对于个人的影响，和說明集体与个人之間的各式各样的相互反应。

必須学习人类学，不仅是因为它强調人和各种人的制度的进化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闡明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过程。关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原理，学习像奥格本[1]的«社会变迁»、威斯勒[2]的«人和文化»和克罗柏尔[3]的«人类学»这样的著作，要比去学习十几本正式的历史方法的书本更有益。人类学比任何其他新的輔助科学都更加眞正是历史的門檻，无論从年代学或是方法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

要眞正能够胜任新史学的工作，必須彻底精通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入門的基础与初阶的社会学，以及各个专門的社会科学，如經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等。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記录。因而，如果不是具备由社会学和专門社会科学所闡明的关于集体生活的事实和进程的科学知識，就不可能对这

① 奥格本(W.F. Ogburn, 1886—)，美国資产阶級社会学家。——譯者

② 原文为 Wissler. ——譯者

③ 原文为 Kroeber. ——譯者

种記录作出合理的解釋。倘若要进行某項工作，而它是要求具有某种专門社会科学的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識的，那末，就要彻底地掌握这些专門社会科学。例如，沒有在现代經济学的各个主要部門和經济統計学中受过严格訓练的人，就休想要从事于經济史的細节工作。如果要从事于科学史或美学史范围內的著作，則除了上述社会科学以外，还必具备自然科学或美术的专門知識。

关于新史学預备条件的这样宏大而苛求的一个綱領，有許多人会承认它的重要性，但却要反駁說，一个人要具备这么多的条件，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作者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似是而非的和不确切的。只要人們充分认識新史学預备条件的必要性，达到了他們认識医学和工程学的专門預备条件的程度，那末一切的預备就都会是容易做到的。我們在大学里設有医学預科課程，在修完这些的基础上再进修医学专业課程。到了适当时机，我們也会設置历史預科課程以及历史专业学院和社会科学专业学院，使上述历史教育綱領能全部实现，所需要的时間，不会超过现在各大学和学院的課程在无計划状态和教学互不通气所浪費的时間。以一个历史系学生一般用以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七年时間来用于新史学学生所必修的一切課程，便是綽有余裕的。經过这样的預备訓练之后，就可以超过一个像密歇根大学校长李德尔所指出那样的老学究、心胸狭窄、比任何活着的人都要熟悉亨利七世的吊褲带、但却不願知道任何其他事物的专家。

好爭辯的人也許会說，在目前新史学的宣揚者中間，就很少乃至无人能作到上述新史学者預备条件的要求。这种說法是正确的。无疑的，魯宾孙教授第一个就会承认，就我們描述的关于新史学者的預备条件而論，无論在那一方面，他自己只是一个願意学习的謙逊的练习生而已，但他也許还会答称，假如他能重新再活过一

生的話，那他是会进行充分預备的。魯宾孙教授还能够理直气壮地答称，他以不充分的預备条件所完成的工作质量，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証，說明将来的学者在經过严格訓练的条件下，一定能够获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五）結束語

本章所試图說明的要点如下：

（一）新史学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范围与目的的新观念。它还要求要作一个历史学者必須进行比旧历史学家远为深奧和复杂的預备工作。

（二）新史学所以新在于它較传統史学具有更广闊的历史观，承认社会科学对于历史学者訓练的重要性，运用生物学和进化論者的生长观点来征服历史。

（三）到目前为止，新史学的宣揚者一直进行强烈的宣传教育运动，这个运动，是和兰普利赫特、柏尔、魯宾孙、特卡特、和馬尔溫的名字联系着的。他們已經获得了胜利。今后，他們将集中精神，致力于完善新史学的基本概念与綱領，并为未来新史学工作者提供充分培訓的机会。

（四）新史学的两項主要任务，是尽力完整地重新研究已往的文明，和探溯现代文化及主要社会制度的各个重要方面的起源。这两項任务，后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前者。其主要、乃至唯一的历史貢献，在于它能帮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我們自身的历史时代。有人願意增添第三項任务，即建立一种社会因果学說或一般地研究社会变化，但这种探討似应納入历史社会学的范围，較为妥善。

（五）任何单独一类历史事件，都不足以构成全面組織人类文

化进化史的骨架，政治事件尤其是不适用。随着文化史与制度史的出现，不但是以前的按照政治分成段落的历史，而且連传統的民族历史和历史年代学，全都要被人遺忘。

（六）任何单一的原因，都不能决定历史事件的进程。历史学者对历史因果关系必須采取一种試探的和經驗的态度，并且要接受多元的观点。

（七）旧历史学对于事物的无知的簡单化和教条式的肯定必須擯弃，因为这些都是幻想和引人誤入于歧途的东西。今日，活跃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問題的复杂性、不肯定性、混乱性和爆炸性，只不过是当今整个时代的象征，是历史学家发现自己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八）对未来新史学工作者进行訓练时，必須从一开始就消除这样的一种观念：把历史看成是一种文学艺术或者一种玩賞古董的消遣。偶尔涉猎历史資料的文学艺术家并不就是历史学家，正如繪制历史图景的画家不是历史学家一样。历史是关于重新研究过去文明和关于现代文化起源的科学。因此，要以历史为职业的人就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識。这就要求对大学本科的課程进行詳細的规划，如同对医科和工程学科那样要求的有远见和专門化的预备条件一般。簡言之，我們不考虑人的本性和人的行动，就不能再从事于历史著作和历史教学。